

# 圣经 是怎样 写成的

The Bible I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Sacrifices

原著 (英) 肯·康诺利  
翻译 杨道

世界书局出版社





The Bible I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Sacrifices

责任编辑 吴健生

装帧设计 王冰

ISBN 7-5012-2360-2/G·936

定价 48.00 元

ISBN 7-5012-2360-2



9 787501 223602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经是怎样写成的 / (英) 康诺利著; 杨道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8

书名原文: The Indestructible Book

ISBN 7-5012-2360-2

I. 圣. . . II. ①康. . . ②杨. . . III. 圣经——研究  
IV. 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9018 号

图字: 01-2004-4156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圣经是怎样写成的

---

作 者: 肯·康诺利

译 者: (英)杨道

责任编辑: 吴健生

责任出版: 赵玥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电话: (010)65265950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2-2360-2/G·9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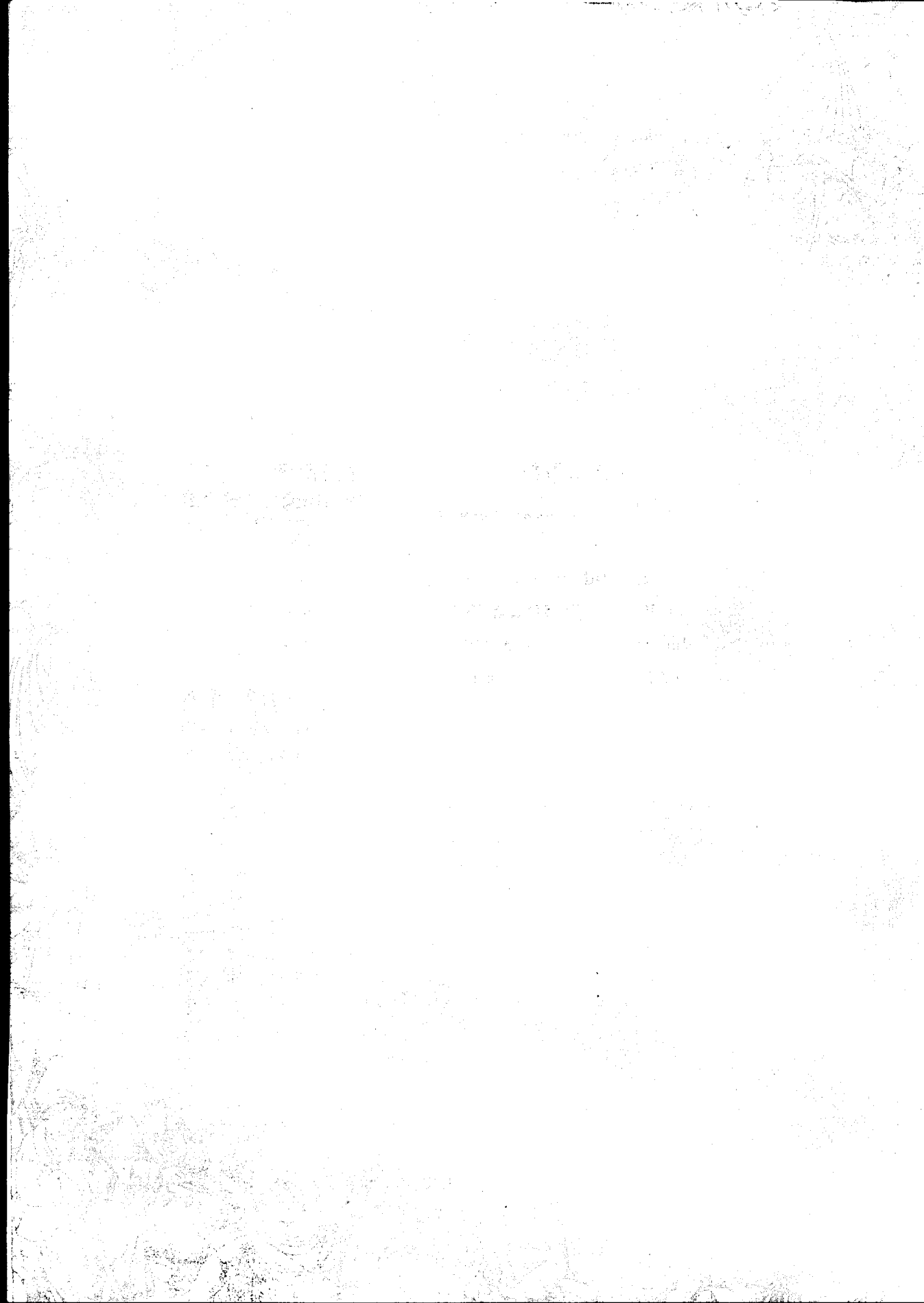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 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圣经》历史的书。

正如本书序言中所写，《圣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著作，它的销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出版物。

《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内容组成。《旧约》陆续成书于公元前5—前2世纪，1世纪末定型为39卷；《新约》共27卷，成书于公元4世纪。前者是用希伯来文写成，记述了古代犹太人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传说故事及其他宗教文学作品；后者用希腊文写成，主要记载关于耶稣的故事和教导及使徒们的故事。前后算来，成书的时间跨度上千年，内容涉及古代犹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十分广泛。

起初，它只在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一带的民间流传。公元初年，罗马帝国地跨欧洲全境，为它进入欧洲打开通道。开始时，它仍然只是在民间秘密流传，随着信仰者的增加，民间教会组织也逐渐兴起，但遭到罗马统治者的疯狂镇压。

公元64年，罗马遭遇罕见大火，暴君尼禄宣称是基督徒所为，于是大举捕杀。让他们穿上粗布衣服，再涂上沥青和硫磺，把他们的下颚挂在树桩上，半夜时点燃，尼禄称之为“城市的火炬”。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但是这种镇压并没有达到统治者的目的，相反，“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基督徒的数量越来越多。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共治者李锡尼颁布米兰敕令，规定各种宗教享有同样自由，宣布发还基督教会财产。

不久，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因为信徒众多，罗马帝国开始借助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最终建立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宗教神权统治。

起初，教会与帝国皇帝平等地统治着欧洲。公元96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为获得教皇加冕，与教皇签定“奥托特权协定”，扩大了教皇的世俗权利。到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禁止皇帝、国王任命任何教职人员。格列高利宣称：教皇对于皇帝，好比太阳对于月亮。13世纪，卜尼法斯八世宣称：惟独教皇可以被



称为“至圣的”，是神圣的君主、至尊的皇帝、万王之王-----。

期间，《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拉丁文，解释权由罗马教皇掌握。从此，罗马教皇靠了“神”的帮助，走上世俗权利的巅峰。。

而绝对权利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

教会机构由强制性的“什一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税款支持，不仅如此，还靠出售“赎罪券”，买卖教会圣职，甚至向修道士出售“姘妇许可证”，疯狂敛财。社会道德沦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仅在英格兰，全国地产有将近三分之一属于教会。梵蒂冈拿走的钱比国王拿走的多五倍。“这些圣洁的人（修道士）在英格兰供养大约10万个懒散的娼妓”。

英格兰臭名昭著的主教沃尔希住在占地270亩、有500间房子、富丽豪华的汉普顿宫，要仆人跪着侍候他，洗手时公爵给他端着脸盆，要主教给他系鞋带。俨然摆出一副帝王的样子。

另一方面，教会通过宗教法庭，残酷地消灭异己，镇压反抗，致使教会与王权、教会与普通信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既然“神”的代言人教皇不可相信，那么看一看“神”自己的教导，自然成为广大信徒合乎逻辑的要求——于是，记录着“神”的言行的《圣经》，成为反抗者的旗帜！以“神”的名义要求社会改革，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正如本书评论英格兰最早的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时所写：牛津，出了威克里夫这位战士，他的剑就是《圣经》！

教会为保住“代言人”的地位，竟然也以“神”的名义，用各种酷刑，监禁、残杀《圣经》的翻译者和出版者，采取一切极端手段禁止《圣经》的翻译和传播。

围绕这本《圣经》，中世纪欧洲上演了压迫与反抗的最为惨烈的人间悲剧。本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了解了这段历史，才能真正理解《圣经》为什么会对西方世界具有如此巨大持久深远的影响力。正如本书所写：每一个法庭上都有《圣经》，每一所医院都是《圣经》道德影响的纪念碑。

《圣经》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渊藪，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多得不可胜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丁尼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圣经》300多次。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有500多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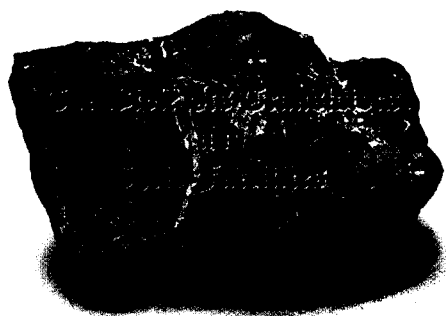
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它的词汇融入西方各国语言，特别是英语之中，可以说，不了解《圣经》，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社会，不能读懂西方文学艺术，无法欣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贝多芬等艺术巨匠的杰作，甚至和西方人平常的语言交流都会遇到障碍。

本书的作者肯·康诺利先生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囿于国别、文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书中引证的一些史料与我们所了解的有不同，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赞同。但是，作者围绕这本非同寻常的书——《圣经》，来介绍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发展史，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世界的历史，从而进一步认识现在，对中国读者可以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当然，因水平有限，在翻译和编校过程中也难免出现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4年4月21日





# 目录

## 序

### 第一章 圣经的成书

独一无二的书卷	8
这本书是活的	12
《旧约》的形成	14
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	17
《新约》的开端	18
古罗马的贡献	21
使徒的成就	24
大手笔保罗	26
危险的旋涡	29
律法主义的异端	29
哲学的异端	29
神学的异端	30
教会的分裂	30
后使徒时期的见证人	31
捍卫信仰	34
殉道者的血——教会的种子	35

### 第二章 中世纪的圣经

潘多拉盒子	40
《信经》	42
《新约》正典	44
权威	45
被偶像化的译本	47

修道院运动	49
边缘地区的生活	52
爱尔兰	52
苏格兰	53
不列颠	54
七个伟人	56
凯德蒙	56
爱尔德海姆与埃格伯特	56
比德	57
阿尔弗莱德	57
阿尔德莱德和爱尔夫立克	57
与国家联姻	58
教皇制度与传统	59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61
消灭“异端”	65
阿尔比派	65
沃尔多派	66
宗教法庭	67

### 第三章 宗教改革以前英国的《圣经》

干旱之地	68
语言	68
政治	69
晨星	70
冷战	72

政治战线	72	改革	98
神学战线	73	公开的辩论	99
威克里夫的力量	73	路德和茨温利	99
狮子笼	75	“苏黎世《圣经》”与茨温利之死	100
一本要烧掉的书	77	日内瓦强人	101
罗拉德坑	79	给我苏格兰	104
布拉格教士——胡斯	81	冬天来了……	107
黑暗中的烛光	83	臭命昭著的主教	109
经院哲学	84	短暂的呼喊	112
人文主义	84	约翰·科利特	112
文艺复兴时期	84	托马斯·摩尔爵士	113
愚昧的终结	85	优雅的安妮王后	115
约翰·古腾堡	85	短命的玛丽王朝	117
威廉·卡克斯顿	88	玛丽一世女王	118
伊拉斯谟和希腊语《圣经》	88	大迫害	119
回顾	91	史密斯菲尔德的英雄们	121
		传递接力棒	123

#### 第四章 宗教改革来到英国

概述	92
道德状况	92
教义	92
政治	93
经济	93
远方的雷声	94
单凭信心	95
《九十五条论纲》	95
沃尔姆斯会议	95
奥格斯堡会议	96
普通人的《圣经》	96
苏黎世的茨温利	97

#### 第五章 第一批英语《圣经》

献身基督的先驱	126
——托马斯·比尔尼	
主教长克兰麦	129
智者弗里思	131
演说家拉蒂默	134
建桥者——托马斯·克伦威尔	137
英语《圣经》之父	139
墨宝永存	143
埃克塞特的主教——科弗达尔	146
玛丽的第一个受害者——罗杰斯	148
带锁链的《圣经》	151



三个重要版本	153
“惠廷汉《新约》”	153
“日内瓦《圣经》”	154
“主教《圣经》”	155

## 第六章 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

伊丽莎白双刃剑	158
天主教的回应与“杜埃《圣经》”	161
王冠上的宝石	162
——牛津版和剑桥版《圣经》	
布鲁斯特的英雄故事	167
看哪，陆地！	169
绝处逢生	171
纠正先贤	174
过犹不及——英美版本之争	176
版本众多	177
几项统计	177
罗马天主教译本	178
犹太人的译本	178
一本属于全世界的书	180
印刷者的墨迹	180
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	181
联合圣经公会	181
《圣经》的出版发行	182
内在生命力	182
《圣经》为主宰	183
巨大的影响力	185
回顾	187

# 序

本书告诉我们关于《圣经》的故事，从它的产生一直到被翻译成英语。故事中有许多英雄，他们相信，没有什么比学习《圣经》更加重要的了。

约翰·威克利夫就是其中的一个英雄。这位牛津学者和牧师，把整本《圣经》翻译成英语，并最终成为英格兰国王的牧师。但威克利夫颇具争议的观点最终触犯了罗马教廷官员和宫廷权贵。

他孤军奋战，面对异端邪说的控告，自己为自己辩解。他死在教会中讲道的时候。传播他信息与信仰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信徒，被处以火刑。

本书所讲的另一个英雄是威廉·廷德尔。他研读了希腊文的《新约》之后改信基督教，在欧洲大陆印刷英语《圣经》，并将《圣经》藏在面粉袋中偷运进英国。那些违禁读《圣经》的人被抓住后在火刑柱上烧死，行刑时《圣经》挂在他们脖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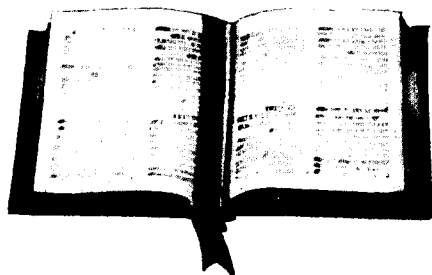
廷德尔最终被逮捕，并且被烧死了。他最后的祷告是：“求神开启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三年之后，他的祷告得到了应验。

本书充满了有关威克利夫、廷德尔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戏剧性叙述。书中有一百多张插图，几乎都是彩色的。这是一本很有珍藏价值的漂亮的书，它同时也为我们介绍了一本更有价值的书——《圣经》。

作者肯·康诺利五十年来一直在仔细研读《圣经》与基督教历史。他是英格兰人，英国著名福音布道家彼得·康诺利的儿子。肯17岁时归向基督。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曾在全国圣经学院与爱尔兰浸礼会学院学习。1950年，应美国福音布道家比利·葛培理的邀请来到美国。

到达北美以后，康诺利在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在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热衷于辩论学，以后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执教辩论术。

康诺利曾牧养几个浸礼会教会，其中一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他在洛杉矶拥有并经营一个电视台达三年之久。







# 第一章 圣经的成书

## 独一无二的书卷

这是一本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著作。

《圣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所见到的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著作。它的销售量超出其他任何出版物。与其他任何出版物相比，它已翻译成更多的语言，并已成为英语世界中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几乎在每一个洗礼、婚礼和葬礼上，你都会发现有人手中捧着《圣经》；几乎在西方的每个法庭上，法官都让人们手按《圣经》起誓。

从人的角度来说，编写《圣经》花了1500多年的时间。约40位作者参与写作，他们主要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偶尔用阿拉米语从事写作。一些作者用诗歌的形式，一些作者用历史的体裁，还有一些作者采用传记的手法。有些作者是国王，有些是农民，有些是战士，还有一些是祭司；有些作者是热忱的爱国者，而有些却是非法地下组织的成员。他们所编写、所传给我们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圣经》，共分66卷，1189章，31173节。

《圣经》是神的书。在中世纪欧洲，一些人如此献身于这个信念，以至于他们甘愿为这个信念而死。奇怪的是，另一些人却狠心将他们置于死地。对《圣经》的仇视与怨恨，是很难解释的。为了阻止《圣经》的传播，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肢刑架（以转轮牵拉四肢使关节脱离的刑具——译者）、夹舌器、拇指夹、铁靴、鞭打木架，全都用上了，试图使《圣经》的支持者背叛《圣经》。在中世纪欧洲，这些《圣经》的支持者有的被绞死、被挖心、被肢解，有的被烧死、被煮死或被斩首。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圣经》？我们每个人必须对这本非同寻常的书，作出自己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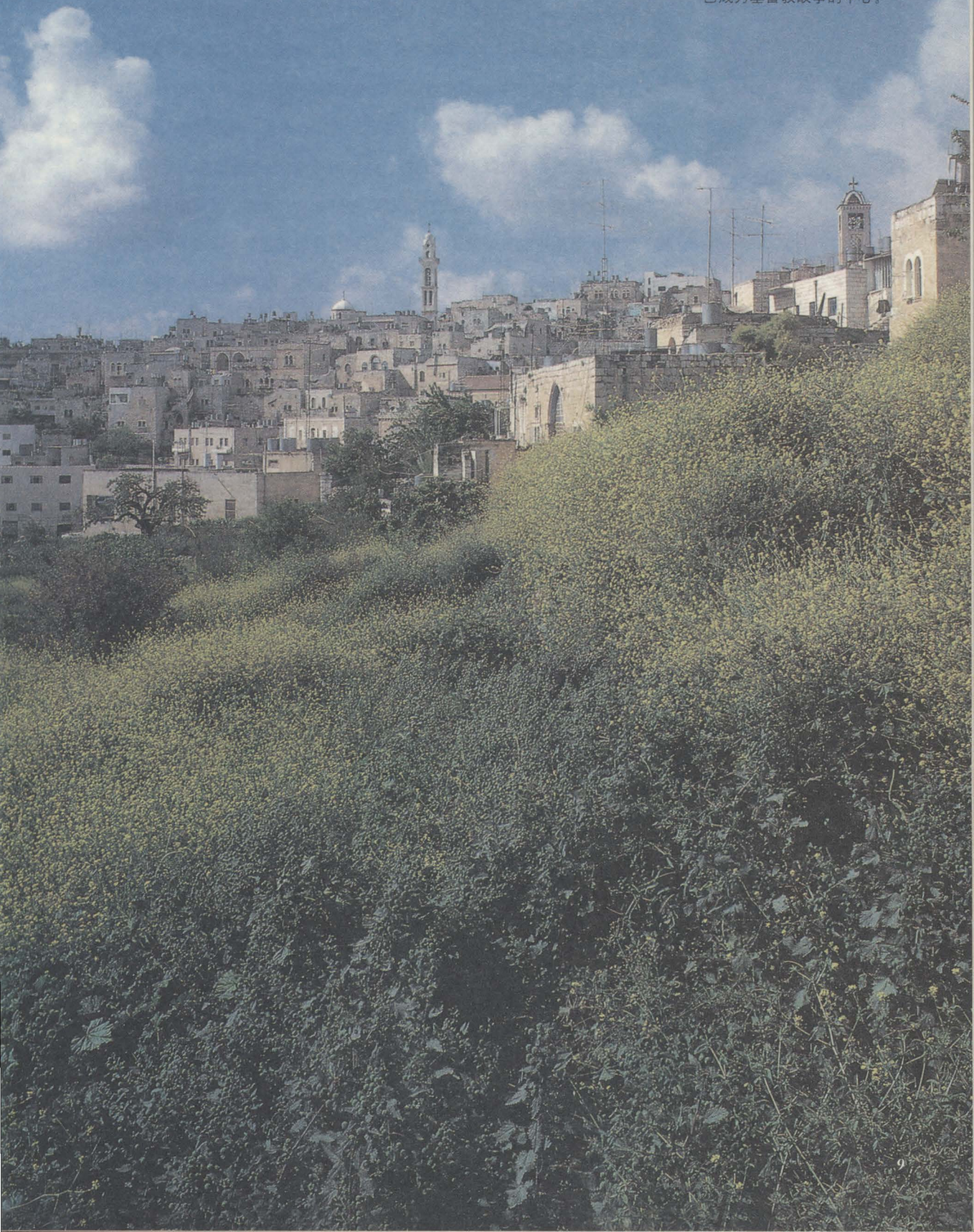
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就是：这部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旧约》就像一幅饱经风雨的古老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预表基督的一些人，如亚当、麦基洗德、约瑟、摩西、大卫等，从画面上走了过去。

同样，建筑物与宗教仪式也预表基督。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建筑物被建造起来，如帐幕，它的祭坛由幔子保护着；还有称为“方舟”的奇怪的船，它经受了世



伯利恒——犹太山地小镇，现已成为基督教故事的中心。





界上最猛烈的风暴。我们也看到了同样奇怪的宗教仪式：逾越节需要有被宰杀的羔羊，赎罪日需要有被放逐的山羊，以杀两只鸟来庆祝麻风病的洁净。还有一些典型的职分，如先知、祭司、国王的职分，所有这些职分以后都归属于耶稣。

当所有这些模模糊糊的图画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整个《旧约》可以看成是一幅有关犹太人的弥赛亚的图画。对《新约》的作者来说，这位犹太人的弥赛亚不是别人，正是拿撒勒人耶稣。对犹太会堂的领袖来说，这个拿撒勒人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因此他是一个骗子。他们并不否认他的超自然能力，但是他们断定他的“神迹”实际上是出于撒旦所赋予的能力。对罗马政府来说，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领受了“王”的称号，是以色列伟大君王大卫宝座的继承人。他关于建立国度的讲话，甚至被他的一些门徒所误解，似乎威胁着整个罗马帝国的和平。

《新约》开篇头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这个人身上。耶稣教导说，犹太人的经文只是序言而已，是为预备他来而写的。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

伯利恒城，凸出在地平线上的的是教堂的塔楼和清真寺的尖塔。





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 5:39）。甚至门徒也说，“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使徒行传 10:43）。

医生路加首先写下有关基督生平的福音书，然后写了《使徒行传》。也许可以认为，他的《使徒行传》只是他的福音书的续篇，因为路加特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从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使徒行传 1:1）。路加认为，耶稣已渗入到以后所有的历史中。他暗示，记载在《使徒行传》中的早期教会历史，只是耶稣的工作与教导的继续。

《新约》中有关基督降世的教导，已经如此普遍地被接受，以至于日历都改变了。所有在这以前的历史，现在都标以“主前”（B.C.）二字；所有以后的历史，都标以“公元”二字，Anno Domini 是拉丁语，意思是“主的年份”。

要更多地发现耶稣的重要性，让我们去伯利恒吧。



伯利恒耶稣诞生地教堂中的遗址，被尊为耶稣出生的地点。





耶路撒冷的戈登山洞，戈登将军提议这里是各各他的遗址，各各他就是“骷髅地”——因为它像一个人的骷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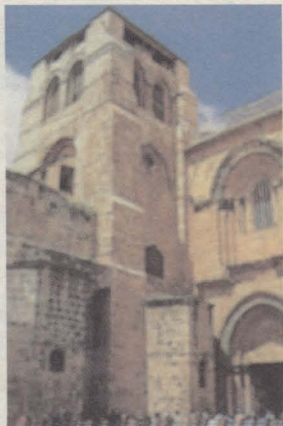
## 这本书是活的

耶稣基督就降生在这里。他不仅仅是圣诞卡片上的一幅画，或儿童故事书中的神话人物。毫无疑问，他曾经生活在这里。

伯利恒是一个宁静的小镇，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它一直与悲伤和欢乐连结在一起。就在这里，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埋葬了他的爱妻利百加。后来先知耶利米说，如果你静静地坐在她的坟墓旁，你仍然可以听见她在为她的孩子哭泣。在希律王召来哲人，让哲人告诉他弥赛亚降生在什么地方之后，或许所有悲剧性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就发生了。他们引用了《弥迦书》上的经文：“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弥迦书 5:2）。希律“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马太福音 2:16）。

然而，悲剧被胜利所取代。愉快的回忆也与伯利恒这个小镇连在一起。正是在这些山地上，路得与波阿斯之间的爱情有了完美的结局（路得记 2-4）。《圣经》中用了整整一卷书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先知撒母耳也是来到这些山地，找到了他们的曾孙，一个名叫大卫的牧童。当撒母耳用香膏膏抹他做以色列下一任王的时候，他正在这些山地上照看他的羊群。那个牧童如此热爱这块土地，以至当非利士人夺取这块土地时，他叹息道：“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撒母耳记下 23:15）。勇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将清凉的井水取来给大卫，他却将它倒出作为感恩祭献给耶和華。

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根据根深蒂固的传统，这里是耶稣钉十字架与埋葬的遗址。





后来，基督教历史中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这里。耶稣基督就降生在这里。他不仅仅是圣诞节卡片上的一幅画；也不是儿童故事书中的一个神话人物。毫无疑问，他曾经生活在这里；与他同代的犹太教及世俗的历史学家，都提到他的神迹、他的死、他的巨大影响。

耶稣曾经作过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宣告。他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说，他受天父的差遣，要带领人类进入上帝的救恩。他也宣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藉着他，没有人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约翰福音 14:6）。孔子、释迦牟尼，甚至穆罕默德都不曾作过这样的宣告。但是，耶稣最大的预言，是关于他自己作为献祭的死，以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对犹太宗教领袖来说，耶稣的宣告是荒谬的，实际上是对神的亵渎。所以，在一个苦难的早晨，他被带到形状像骷髅的岩石上，被钉在一棵“树”上，受十字架苦刑。许多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他们能确认钉十字架的确切地点。但是，这个山顶没有结束他的故事。在同一岩层中，有一个凿出来的坟墓，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曾经安放他那无生命的躯体的地方。当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人们用一块巨石堵住了坟墓的出口。坟墓被封，并派有士兵守卫。星期日早晨，妇女们来给他的身体涂抹药物与香料，却发现石头已被挪开。虽然裹尸布还在，他的身体却不见了。

为了诋毁复活的可能性，人们提出了各种想像。他的门徒被指责“偷走”了耶

墓园，在平安庇护所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之外，图中是一个岩石凿成的坟墓。





稣的身体，但他们如何能做成这件事却没人能说清，在逮捕他们时也没有签发任何逮捕令。虽然卫兵承认他们睡着了，对卫兵却没有采取任何惩戒措施。一个睡着的卫兵，又怎能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新约》的作者来说，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耶稣不仅仅是个人。他们相信，他的复活证明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是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坚持说，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传道就无用了，信也就徒然了，我们仍在自己的罪里（哥林多前书 15:14-17）。对所有真正的信徒来说，他的复活是重要的，关键性的，是信仰中最基本的。

犹太教的领袖与罗马官员认为，耶稣的死结束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宗教派别简短故事中令人不快的一章。事实却证明这是一个故事开头的一章，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种强大的，有时甚至是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他们被称为基督教教会。这一新的运动渗透到罗马帝国的权力架构之中。事实上，教会首先迫使罗马承认她，以后与她合作，再以后服从她。

要理解这一事件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分析第一批基督徒生活的时代。反过来，也需要了解在《新约》出现之前的年代。那时，犹太人已有《圣经》，耶稣十分熟悉《圣经》，常常引用《圣经》，并为《圣经》不断与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争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知道的《圣经》是什么样的呢？

## 《旧约》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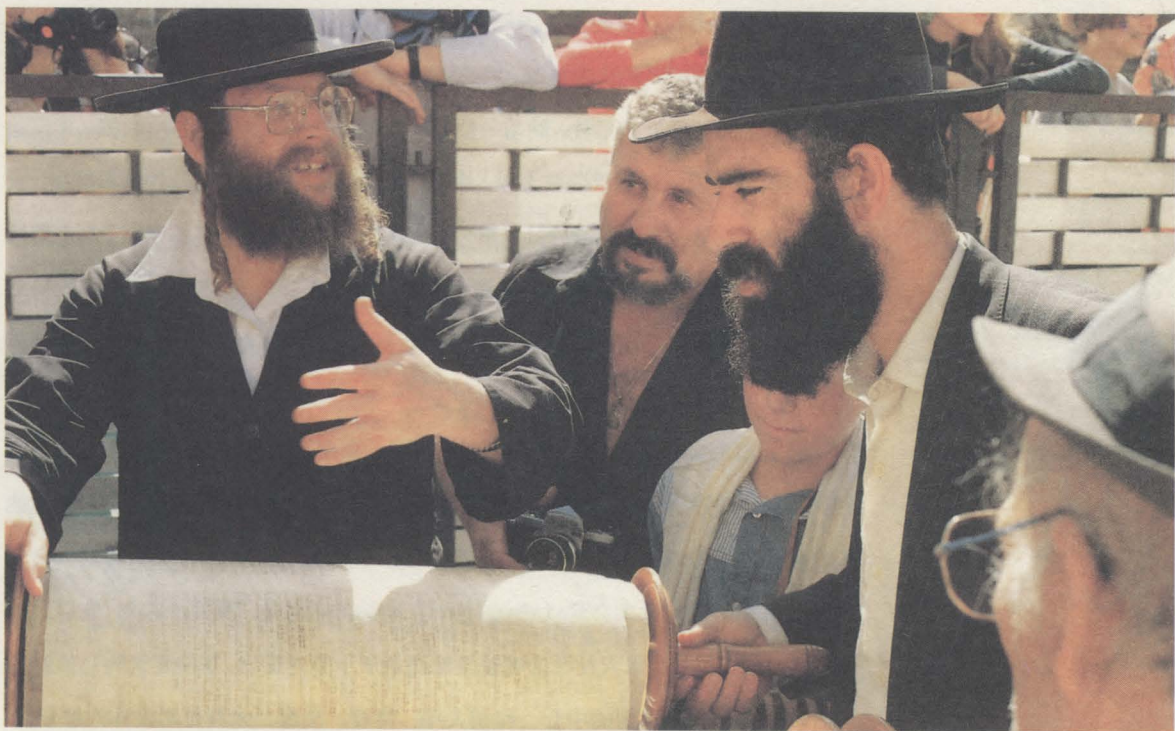
《旧约》共有 39 卷，成书于公元前 5 世纪之前。它最初用希伯来语写成。希伯来语不分字母的大写和小写，它没有元音也没有标点符号，书写是从右到左。

当你想到《圣经》的来源时，如果有一个词必须放入你的词汇表中，那就是“正典（canon）”。这个词指的是共同组成《圣经》的书卷。它们是由神通过特别的人传达给我们的，是所有著作中最有权柄、最独特的。犹太人的正典局限于《旧约》，在耶稣降生前很久就已被公认，但是，正典的最后正式确定是在公元 100 年亚姆尼亚的犹太法学博士会议上。亚姆尼亚位于现在的特拉维夫以南 13 英里的地方。写于《旧约》结束与《新约》开始之间的经书被称为《次经》，但是，犹太人认为《次经》没有一卷是出于圣灵的默示。

在耶路撒冷的西墙，犹太拉比指着律法书卷或摩西五经。







但是，任何一个犹太宗教学者都会向你解释，正典不是由人的单一行动所决定的，而是“渐渐由神”默示而来的。在耶稣的时代，《圣经》只包括“律法书”或“摩西五经”，随后又加了“先知书”，再后来又增加了“智慧书”或“著作”，即《旧约》的其余部分。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 24 章 44 节中对《圣经》的划分。

《旧约》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希伯来语不分字母的大写和小写。它没有元音也没有标点符号，书写是从右到左。在希伯来语的字母表中有 22 个字母，在犹太《圣经》中有 22 卷书。不过，它包含的内容与我们 39 卷的《旧约》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同的。我们将《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分成上、下两卷，而犹太人则不分。他们认为耶利米的《耶利米哀歌》与他的预言书是一卷书，如此等等。

《旧约》是如何被编在一起的呢？在《出埃及记》24 章 4 节中我们可以读到：“摩西将耶和華的命令都写上。”根据《申命记》31 章 26 节，这些书放在“约柜旁”。以后约书亚对它们作了补充；再以后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華面前”（撒母耳记上 10:25）。过了很久，“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華殿里得了律法书。’”（列王记下 22:8）这些经文表明这些记载是逐渐增加的，并且得到妥善保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摩西写下了律法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没有人会知道书写的方法，这种状况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在上世纪末发生了一些事，有助于

在耶路撒冷的西墙（或哭墙），犹太拉人展开律法书卷或摩西五经。

改变学者们对书写起源的想法。1887年，一位埃及农妇在泰尔爱尔阿马纳废墟中行走，要寻找一些可以卖钱的东西，她的脚踢到沙子中一个硬的物体：这是一块很硬的粘土，上面有异样的记号。她请一位朋友帮助她挖掘，他们不停地挖掘，直到他们得到满满一袋经过烧焙的黏土板。原来，绊着她脚的是古代埃及外事局档案。我们现在知道，早在摩西以前的日子里，埃及驻外大使就积极从事邮寄服务，定期从遥远的巴勒斯坦地区作述职报告。由此断定，摩西在公元前1500年就知道如何书写。一些从事古文书学研究的人，甚至认为《旧约》中的《约伯记》或许早在摩西之前400多年就有了。

公元前586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性的事件：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陷了。神殿遭到掳掠，并毁于大火，数以百计的人被带走，移居到遥远的巴比伦。在那里，他们在信徒的家中以小组的形式聚会，进行敬拜与教导。人们认为这标记着犹太会堂活动的开始——“犹太会堂 (synagogue)”一词的意思是“聚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任何有犹太人社区的城镇里都建造了小型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也被称为“会堂”，用来作为社区的中心、城镇大厅、学校、法庭，尤其是用来作为教堂。

大约70年后，当大多数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巴勒斯坦时，传统认为以斯拉将《旧约》的书卷收集在一起，这些书卷经历了被掳中的骚乱，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这些神圣著作的精确抄本，一直是由称为“文士 (scribe)”的犹太学者精心制作的。在被掳以后，文士的作用更为重要。文士也是祭司，他们对于保存、抄写、解释律法，负有重大的责任。当我们在《新约》见到他们时，我们发现，这些文士竭力反对耶稣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对他们大加赞扬：他们是十分认真和讲究的。他们对于自己作为书写员的工作作了如下规定：

1. 他们只可以使用清洁的兽皮，在清洁的兽皮上面写字，甚至用清洁的兽皮来捆书卷。
2. 书写的每一栏不少于48行，不多于60行。
3. 墨水必须是特殊配方的黑色墨水。
4. 他们写的时候，自己必须大声念出每个词。
5. 每当写“耶和華”这个词之前，他们必须将笔擦净，洗净他们整个身体。
6. 30天之内必须有“复查”，如果需要纠正的页数多达三页，整个文本必须重写。
7. 必须数点字母、词、段落；如果有两个字母连在一起，文本就作废。中间的



段落、词、字母必须与原文本相对应。

8. 所有的旧文本或损坏的文本必须以盛大的仪式“埋葬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原文本的理由。)

9. 文本只能存放在神圣的地方。

10. 因为任何含有神话语的文本都不可以销毁,它们必须存放在或埋在杰尼塞杰尼塞是希伯来语,意思是“躲藏的地方”。这些文本常常保存在会堂里,有时也保存在犹太人墓地里。

## 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

在希腊的法罗斯岛上,这72位才华出众的学者,在72间小屋里,用72天时间,完成了对希伯来语《摩西五经》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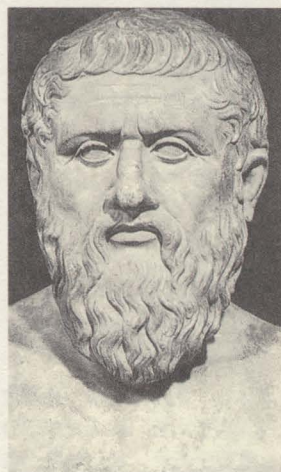
先知以赛亚盼望弥赛亚来临的日子,他说弥赛亚将“像根出于干地”(以赛亚书53:2)。这“干地”所指的,就是弥赛亚要降临的那个堕落邪恶时代的特征。使徒保罗在回顾耶稣降临世界的时间选择时,作了这样的陈述:“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拉太书4:4)。耶稣也知道他来的时机。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马可福音1:15)。

在使世界为耶稣基督的来临作好准备方面,希腊人与罗马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0年前后征服世界时,他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带到东方,也把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带到东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心探索未知的属灵世界,他们的问题向整个世界提出了挑战。他们教导人们如何提出引起他们思考的问题;但是他们不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成功地使基本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又让世界等候某一位来作出权威性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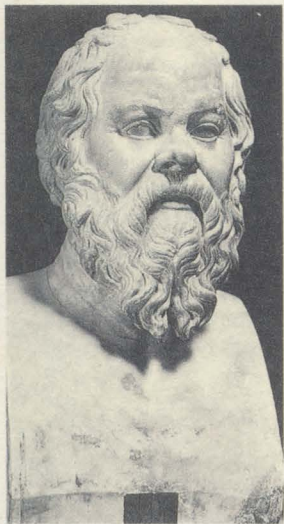
希腊人第二个主要贡献是,给予世界一个单一的语言,所谓“koine”,即“普通希腊语”。到公元前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欧洲已成为双语的世界,希腊语已是每个人使用的第二语言。这对于我们有关《圣经》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旧约》希腊语翻译的起源隐藏在传奇与猜测之中,但仍有如下的最常见的版本:公元前285年左右,法勒伦的德米特里厄斯是亚历山大世界著名图书馆的经理。当时,许多犹太人住在埃及,所以,德米特里厄斯奏请国王托勒密·费拉德

著名的希腊思想家与辩论家苏格拉底。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共和论》一书的作者

尔法斯，他是否可以安排人替图书馆将犹太人的律法翻译成希腊语。

国王释放了十万个犹太人奴隶作为一种友善的姿态，并差遣一位特使，带着贵重的礼物，去见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以利亚撒，要从12个支派的每个支派中选拔六个才华出众的学者（总共72人），来承担此项任务。学者们在亚历山大朝廷受到隆重的接待，然后被带到法劳斯（灯塔）岛上，这样他们可以安静地工作，不受任何搅扰。人们普遍地认为，他们生活在72个小屋里，在72天中完成“摩西五经”的翻译任务，并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取得一致的意见。由于学者的人数，这个译本被称为“七十士译本”，英语中称为“Septuagint”，即希腊语中“七十”的意思。

关于这部学术水平极高的著作，我有两个重要的发现。这72个人显然继续他们的翻译工作，直到他们完成整部《旧约》正经；以后他们增补了次经著作。哲罗姆与其他早期的教父们把《圣经》翻译成拉丁语，就是根据《旧约》的“七十士译本”——因此就包括了次经著作。罗马天主教的《圣经》是以这些拉丁语译本为基础的，结果罗马天主教接受了次经是默示的观念。直到16世纪，东正教教会仍在使用次经著作。在路德反对将次经编入正典的特伦特会议以后，新教徒渐渐在正典中删去次经，但是允许它用于私人教育。

其次，“七十士译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两约之间的时期，正如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所说的，逼迫使犹太人分散在“天下的各国”。犹太人说各种已知的语言，而许多人不懂得他们《圣经》中古老的希伯来语，但大家都懂希腊语。所以，“七十士译本”满足了极大的需要，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了摩西的书卷。事实上，它成为了《圣经》。被使徒称为“神的话语”的正是这本书。

## 《新约》的开端

耶稣与他的门徒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行走与休息，达三年半之久，他带领他们走过漫长的旅途。

如果我们以第一世纪为例，分析神的真理是如何传递的，我们可以作以下的划分：

公元30年以前，耶稣活在世上，所以我们称这段时间为活的真理时期，在这一时期耶稣是权柄的中心。他从不写书，他只是说：“学我的样式”，“我是真理”（马太福音11:29；约翰福音14:6）。他将自己置于属灵世界的引力中心，说：“凡劳苦担



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马太福音 11:28）。重要的是基督，而不是信条。

第二个时期一直到公元 50 年，可以称为口传的时期。耶稣死后，有关他言行的叙述，是通过口中的言语传播开的。

最后的一个时期从公元 50 年起，是书面传递的时期。使徒不能每一个地方都去，他们常常用书信教导新的教会。有些书信成了《新约》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故事中，我们的兴趣在于耶稣生活的那段日子，那时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语成了真理的化身。

耶稣在拿撒勒的市镇中长大。像所有的犹太男孩一样，每天早晨他去会堂上学，在那里他惟一的课本就是《圣经》。从 12 岁到 30 岁左右，他可能在拿撒勒，在约瑟的木工工作台旁工作。他受洗后回到拿撒勒，在会堂里他对他未来的使命作了概述。拿撒勒人被他的话所激怒。他们拒绝他，把他带到悬崖的边缘，想把他扔下去，了结他的生命。

后来，耶稣来到加利利湖滨，使迦百农古镇成为他公开服事的中心。他只是在重大的宗教节期才去耶路撒冷。

加利利湖在海平面以下 685 英尺，约 6 英里宽，16 英里长，最深处约 130 英尺。它的湖水为湖滨许多繁忙的渔村中数以百计的渔民提供了工作。“四福音”中记载了 36 件神迹，其中 19 件是行在湖中和湖的周围。就在这湖边的低洼处，彼得抓到一条鱼，在鱼的口中有一枚硬币。在俯瞰东北湖滨的山坡上，耶稣讲了他那著名的“登山宝训”。也是在那个地方，除了妇女孩子他让 5,000 人吃饱，（马太福音 14:21）。再往南一点，你可以看到陡峭的山坡与山洞，这里可能就是耶稣使一个被鬼附的人



拿撒勒，耶稣的故乡，当年天使报信处今有一巨大长方形柱廊大厅式教堂，俯瞰着全城。





停泊在加利利湖上的小船。

平静下来的地方，那些鬼的名字叫做“群”（马可福音5章）。在耶稣呼召并使其成为使徒的12个人中，有11人来自这个地区。只有一人来自犹太地，他以后是一个叛徒，十分令人失望。

耶稣正是在这个湖面上行走；另有一次，他站在船头，命令狂暴的风浪平静下来。

因为耶稣的大部分事奉是在加利利湖，这里就是撒下种子并（像《新约》一样）开花的地方。耶稣用比喻进行教导，我们要思考这些比喻的寓意。保罗所传讲的每一个真理，都早已用在耶稣的比喻中。请看他的神迹。它们是“行动中的比喻”。它们表明，他是胜过死亡、疾病、鬼魔的主。这些状况代表了人类普遍的痼疾。死亡是我们灵里的状况；麻风病是我们被罪所玷污；瞎眼是我们对属灵事情的冷漠；热病向我们表明了罪的传染和不止息的本质。

耶稣与他的门徒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行走与休息，达三年半之久。他带领他们走过漫长的旅程，承受了单调乏味的压力，度过许多焦躁不安的夜晚。他通过言行遵循了以赛亚的教训，并教导他们：“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赛亚书28:10）在他离开他们之前，他甚至许诺他们，他将为他们差遣“另一位安慰者”（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将“使你们想起一切的事”（约翰福音14:16,26）。



当保罗写信给外邦基督徒时，彼得写信给希伯来基督徒。在遭受残酷的逼迫以后，他们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西亚、庇推尼等罗马的许多省份（彼得前书 1:1），他们需要极大的鼓励。虽然彼得在《使徒行传》第 12 章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但他是至死忠心。根据传统的说法，他死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他不配像他的主那样被正着钉死。

使徒中最年轻的约翰，比所有其他的使徒活得更长久。他写了三封书信和一部“福音书”，书信鼓励过圣洁的生活，《约翰福音》则强调其他三位作者所忽略的问题。他的充满异象的著作《启示录》，是他被放逐在拔摩岛上时写的。约翰拉开幕布，让我们看到将来“主的日子”。

到第 1 世纪末，《新约》的基础已经奠定。至于下一步，我们必须来看罗马。

## 古罗马的贡献

这些来自罗马的征服者修建道路，架设桥梁，以便更容易调动军队。如果说希腊人打破语言的壁垒，罗马人则清除了地理上的疆界。

恺撒利亚马里蒂马的美丽的大理石海港，坐落在地中海的岸边，沿大路到耶路

在恺撒利亚马里蒂马的罗马剧院——海边的恺撒利亚——希律王所建造，为荣耀恺撒以恺撒的名字命名。





撒冷有65英里。它是个新建造的城市，由希律王在恺撒于公元前22年所攻占的腓尼基要塞的遗址上建造的。工程师建造了宏伟的半圆形人造港口，可以停泊300艘船。希律也建造了圆形剧院，战车竞技场，以及惊人的高架渠道，将远处的地下水送到城里。希律以恺撒的名字给城市取名，以此荣耀恺撒，罗马人很快使这个城市成为他们的行政中心。

继希律之后的王，希律·亚基帕\*常常将恺撒利亚作为他的首都。就在这里，在那政治动荡的年日里，有一天他穿着皇家的服装，作了一番讲话。据路加记载，他的讲话使听众如此折服，以至于他们高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使徒行传12:22）。路加又补充说，因为希律不归荣耀给神，他就倒在地上，在崇拜他的听众面前，被虫蛀蚀就断了气（使徒行传12:21-23）。

公元66年，犹太人背叛罗马人，但四年后最终被镇压下去。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据说可能有100万人被处死。许多人被带到恺撒利亚的圆形剧场，在竞技运动中被杀。

然而，罗马在为早期教会的扩展预备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重大贡献是在行政法律上。自从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以来，古罗马的法律一直在发展。为了明确公民的权利，“十二铜表法”将法典分级。古罗马的法律最终成为英国法律的基础；英国法律又成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大多数说英语的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基础。

古罗马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来自于他们作为工程师与建筑师的技能。希腊人打破了语言造成的壁垒，而罗马人则彻底消除了地理上的疆界。他们修建道路，架设

恺撒利亚港口罗马高大建筑物的遗迹。





桥梁，以便更容易调动军队。他们也建造了坚实的长城，作为抵御蛮族人进攻的壁垒，如在北英格兰的哈德良墙。在许多国家中，这些壁垒在两千多年以来的大劫掠和大动乱等灾难中幸存下来。

我的图书馆中有一本著名的1894年摩根讲座的抄件，演讲是詹姆士·奥尔博士在纽约奥本的神学研讨会中所作的，题目是“教会历史中被忽略的因素”。奥尔博士的目的，是想要表明基督教在恺撒的世界中惊人地快速扩展。现在，让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发现。

首先，奥尔博士探索了基督教在地理上的扩展。每个人都已听说了罗马城下的地下墓室。它们形成一个圆圈，离罗马的中心约三英里。已知有40个墓室，由隧道与秘密通道网彼此连结。它们是用作基督徒的墓地，有大量的坟墓。据奥尔博士所讲，就在最后一次大迫害爆发之前，有40个不同教区的会众在罗马聚会。在安提阿、叙利亚，估计教会信徒有10万之多；在人口总数为1900万的小亚细亚，估计有100万信徒。

其次，奥尔通过不同的社会层面研究了基督教的影响。我们知道“众人都喜欢听他”（马可福音12:37），但是，甚至在《新约》时代，许多有钱人使自己成为教会一分子，也喜欢听。耶稣曾告诫富人，依靠自己的财富是危险的；雅各也说起戴着金戒指来到会众之中的那个人；路加说到那些“拥有土地房屋的人”；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路加福音6:24；雅各书2:2；使徒行传4:34；提摩太前书6:17）。

教会供给的“寡妇”，是指没有经济来源的妇女（使徒行传6:1）。保罗提到来自“恺撒家里的人”的问候（腓立比书4:22）。哈纳克教授评论说：“在基督教传到罗马以后的五六十年之间，一位皇帝（韦斯巴芗）的女儿接受了信仰；尼禄可怕的迫害30年以后，不少王位的法定继承人是在基督徒的家中被抚养长大的。”

最后，奥尔博士探索了基督教对社会思想模式的渗透。作为证据，他提到教会领袖所写的一些书，以及早期教会主教所需要的在哲学上的专门训练。他也探索了一些皈依者为基督里的理性自由所作的挣扎。例如，殉道者查士丁在寻求真理过程中，曾涉猎柏拉图派哲学与其他流派的哲学。

这些是导致基督教信仰迅速扩张的一些外在因素。但是，什么是基督教本身？神为了他的道的传播，作了什么内在的准备呢？



恺撒利亚马里蒂马的罗马圆形剧场的入口。



## 使徒的成就

腓力在撒马利亚医治病人，司提反很会讲道，而保罗则不知疲倦地工作了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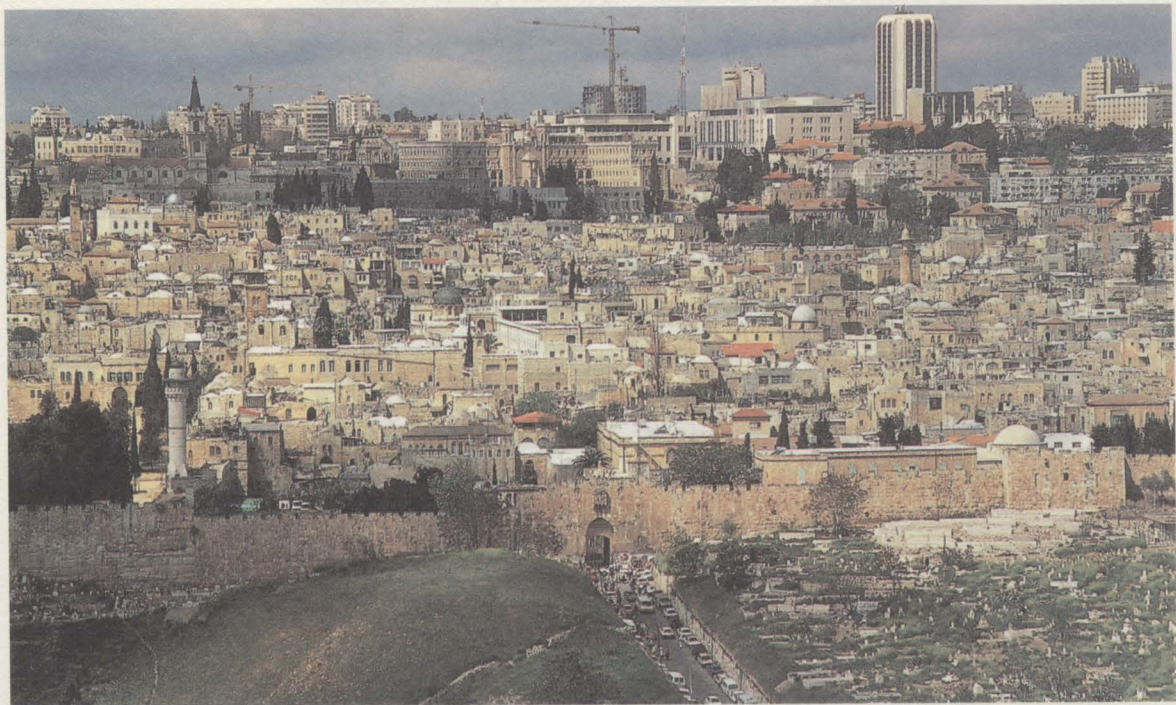
基督升天以后，耶路撒冷小小的基督教教会迅速地增长。但是伴随它的成功又遇到新问题。几年以后，为了避免教会里说希腊语的成员们可能的分离，任命了七个执事，他们都有希腊语的名字。仅有两个人的事迹片段被保存了下来：腓力与司提反。

腓力在撒马利亚讲道，医治病人，向埃及阿伯解释“福音书”（使徒行传8:27-39）。

司提反讲道很有能力，以至于他被捕入狱，在犹太人议会前受审问，在那里他谴责犹太领袖是杀害弥赛亚的凶手。他引用了以赛亚关于圣殿所作的评述，认为神不居住在地上的某一地方。作为严谨的律法主义者主要派系的法利赛人，承认《以赛亚书》是圣灵默示的，但司提反的解释激怒了他们。他们把他拉到城墙外面，用石头把他打死，司提反成了基督教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

在《使徒行传》7:58中有一个被描述为“年轻人”的法利赛人，站在一旁观看这场杀人的情景，看守凶手的衣服。他的名字叫扫罗。在扫罗的余生中，他不能躲避那天他所看见的、所听到的和所感受到的事情留给他的记忆。这是促使他转向耶

从橄榄山鸟瞰通往耶路撒冷老城的圣司提反门。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司提反殉道的遗址。







以弗所塞尔苏斯图书馆。保罗在这个繁华的城市花了两年时间，劝勉信徒。

稣的原因之一，后来这个所有迫害教会的人中最狂热的人，变成所有基督的追随者中最充满激情的人。教会应该永远感谢他，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宣教活动，而且因为他作为“保罗”写了大部分的《新约》。他是谁？

保罗的家在希腊基利家省的大数。大数是一座大学城，是哲学家、语法学家、诗人的家乡。在这样的城里长大，必定促进了他对世界并其思想的认识。然而，正如他以后告诉罗马统治者亚基帕那样，他的家庭是最严谨的犹太人。保罗与他的父亲都是法利赛人，他自己精通希伯来语。他去耶路撒冷的拉比学院接受训练，在极受人尊敬的迦玛列门下学习。

耶路撒冷圣殿发生骚乱以后，当罗马士兵给保罗铐上锁链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他是“罗马人”，意思是他有罗马国籍。士兵们立刻释放了他。他的罗马国籍救了他（使徒行传 22:25-29）。这个身份免除了保罗的奴隶地位，使他可以不受诸如鞭打与钉十字架等有辱人格的惩罚；这个身份给他向皇帝上诉的权利，而不接受低级法庭的裁决；最重要的是，它给了他漫游世界的权利。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在特权上是罗马人，在世界观上是犹太人，在思想模式上是希腊人。

保罗原本十分热衷于迫害基督徒。司提反死后，他心灵中的饥渴越来越得不到满足。他对基督徒的憎恨，使他接受去大马士革的使命，然而在途中他却戏剧般地皈依了基督。他的热心从来没有减退，只不过改变了方向。

保罗接下来在阿拉伯度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多达三年，思考与他归向基督有关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回到大马士革，在会堂里讲道。他讲道时会众大为生气，

他们出钱悬赏他的头，并把守住每个城门；但是，他在篮子中被人缒下城墙逃走了。在安提阿，一个较大省份的中心，保罗与巴拿巴一起度过了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教导基督徒。正是安提阿的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差遣保罗与巴拿巴作宣教的先驱。

保罗在世时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在三次或四次的布道行程中，在两个大陆上创建了外邦教会。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了30年。他的身体垮了，加上语言有障碍，眼睛也可能患上眼疾，所以不得不要别人代他写信。在没有现代交通便利的日子里，他在陆上与海上旅行了数千英里，可能多半是徒步旅行。他常常成为骚乱的中心，在其中的一次骚乱中，他的仇敌用石头打他，丢下他，任凭他死去。20年以后，他回顾他的经历，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过重的鞭打，屡次冒死：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哥林多后书11:23-28）。

他写这些话时，他至少还有十多年的事奉要坚持下去。当他作为囚犯被送往罗马时，他的奔波生涯得以结束。但是，他的宣教工作仍在继续。虽然他的身体被捆锁，但他的话语却不能被捆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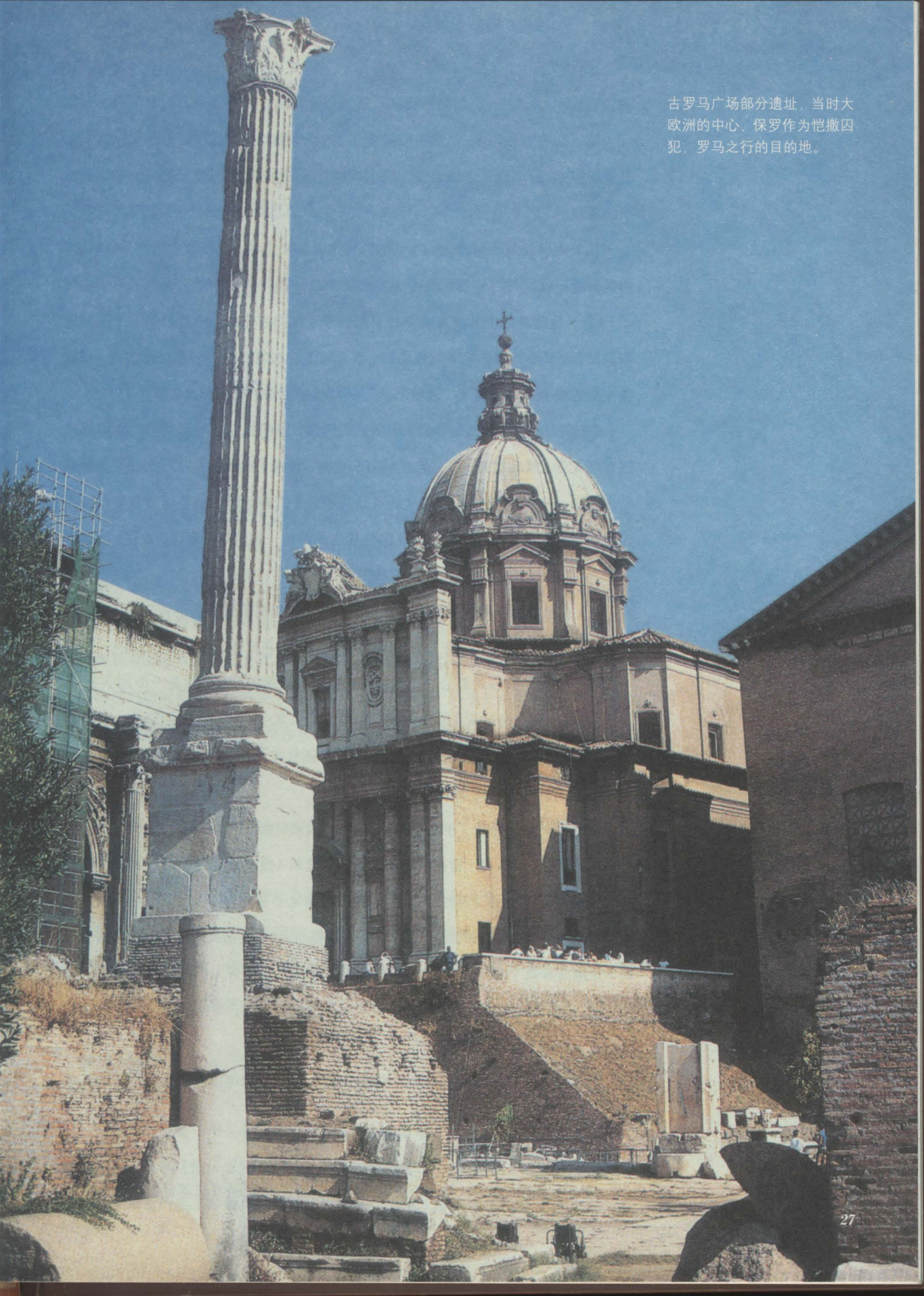
## 大手笔保罗

他是《新约》作者中作品最多的一位。

保罗是教会的栽培和建造者。在他历时两年半的第一次布道旅行中，他访问了不同的城市，行程1200英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教会。他的事奉如此显著地蒙祝福，结果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之间引起了争论。他被要求来到由主的兄弟雅各主持的大会面前。焦点集中在种族歧视问题，辩论中，区分了真理与偏见，裁定结果宣告保罗无罪。

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历时三年，行程2800英里——其中1600英里为陆路，1200英里为海路。这次布道旅行涉及欧亚16个大城市，结果在欧洲建立了许多新





古罗马广场部分遗址，当时大欧洲的中心，保罗作为恺撒囚犯，罗马之行的目的地。

的教会。

第三次布道旅行中，虽然保罗只去了三个大城市和四个省份，但行程也有1400英里。这些省份中的许多城市保罗以前曾经路过，想必保罗也曾再次访问了这些城市的教会。

犹太人曾经是上帝指定的《旧约》写作者与保管者；现在教会接任为《新约》的保管者。保罗是《新约》作者中作品最多的一位，在《新约》21篇书信中他写了13篇。他的书信中至少有两篇写于他的第二次布道旅行，三篇书信写于第三次布道旅行。其余的书信或者写于监狱，或者写于一次监禁与另一次监禁之间。将近他生命的终点，保罗写了“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

《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中所记载的事，表明保罗在罗马的第一次审判中被宣判无罪，随后被释放了，但以后再次被捕，被投入监狱，所以可能有两次被监禁。看来，公元64年，当尼禄火烧罗马并归咎于基督徒时，他不可能在罗马。因为假如他当时在罗马，那他很可能与其他基督徒一起遇难殉道了。或许，他那时在西班牙，因为他曾写过他想从罗马出发去西班牙（罗马书15:24）。罗马的克雷芒，以及克里索斯托和哲罗姆虽然没有提供详情，但都提到了他的西班牙之行。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罗马保罗结束了他在世的人生旅程。

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最后一个监狱，可能是马默泰因监狱。这是一个地下24英尺深的洞，罗马人通过天花板上的洞口将犯人投入其中——在中世纪以前一直没有楼梯。罗马元老院离这个地方仅50码。在那里还有古罗马的广场与恺撒的宫殿。庞大的帝国政权在他的囚室上面处理事务。

当他到达时，他是“年事已高的保罗”，因锁链捆锁步履艰难，四周有士兵包围。他感到冷，要人把“留在特罗亚的外衣”带来（提摩太后书4:13）。他提到“底马已经离弃我”（提摩太后书4:10），他激励提摩太不要因保罗是个囚徒而羞愧。他甚至在这个囚室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里告诉提摩太，“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提摩太后书4:16）。最后，他凭直觉告诉人们他在世的日子快要结束：“我现在被浇奠（译者注：指像水洒在祭坛上一样，奉献或牺牲在神面前），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4:6）

当你读保罗在阴暗的洞中所写的最后两封书信时，你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看保罗。问问他，然后听他的回答。

“保罗，你好吗？”

“保罗，奉神的旨意（没有因不利的环境重新评价），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

应许，作了基督耶稣的使徒（在帝国的恺撒面前没有惧怕）。”（提摩太后书 1:1）

“你是否知道你快要死了？”

“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 1:12; 4:7）

让保罗继续写他的最后那封信，我们往前走吧。在公元1世纪后，《新约》著作发生了什么呢？

## 危险的旋涡

旋涡是由交叉的水流产生的。在公元2—3世纪，当对立的观念相遇并发生冲突时，属灵的旋涡就发生在基督徒之中。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背景中脱颖而出的，因而带有律法主义，这种律法主义想要影响它以后的发展。同时，它的皈依者来自希腊背景，如果没有足够的教导，就会将他们的神秘哲学引入基督教的会众中来。这两种思潮都与真正的福音在目的上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一个异端的时期与痛苦冲突的时期。这些神学上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枯燥无味的，然而，我看这些问题时并不是这样，因为它们对初生的教会锻炼肌肉并牢牢抓住自己的信仰的途径。异端有四类：

### 律法主义的异端

律法主义的罪魁祸首是埃比恩派的人（埃比恩派的意思是“穷人”），这个派别的人存在于公元最初的四个世纪里。埃比恩派的人虽然承认基督是先知和弥赛亚，但是否定基督的神性。他们教导说，只有通过割礼与遵守摩西的律法才有可能得救。这个异端迫使初期教会态度鲜明地集中攻击“因信靠恩典得救”的教义。

### 哲学的异端

对初期教会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威胁，是被称为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的。根据伊雷尼乌斯（他从公元130年一直活到约公元200年）所说，这种异端开始于彼得曾经责备的巫师西门（使徒行传 8章），公元150年达到顶峰。“诺斯底”这



个词来自一个希腊语词语，意思是“知识”。诺斯底主义相信，得救是通过对自己真正本质的深奥认识才得以实现，只有信徒中的核心人群才能得到救恩。

诺斯底主义的基本信条是，“灵”是圣洁的，而“物质”是邪恶的。这一信条的必然结果是提出这样的教导：基督不可能有物质的身体。这一异端的支持者被称为“幻影说者（Decetist）”（源自希腊语 dices，意思是“似乎”）。幻影说者们或者主张耶稣的身体是个幻影，这个幻影看起来是人的身体，实际上却不是人的身体；或者主张耶稣在受洗与被钉十字架之间使用了一个人的躯壳，但是他与这个躯壳却是分离的。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结论都是基督本身没有经历身体上的苦难。

在马西昂的领导下，产生了这种异端的叙利亚流派。这种流派有别于埃及的流派，也有别于小亚细亚的另一种流派。马西昂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他拒绝《旧约》，并收集了所知的最早的基督教正典，其中包括《路加福音》简略本和保罗的十封书信。这样就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问题：哪些书卷属于《圣经》正典呢？

## 神学的异端

主要的神学异端有孟他努主义（出现于公元170年左右）和神格惟一论（出现于公元3世纪）。孟他努是一个极有性格魅力的预言家，他反对正在潜入教会的形式主义。他教导说，圣灵今天在向他的教会说话，正如当年圣灵通过保罗与其他使徒向人们说话一样，并且有新的启示要赐予人。孟他努的追随者接受了他的过分出格的教导，说是耶稣将要回到他的地方来，要把自己将来国度里的一个显要的位置赐给他。

神格惟一论就是古代上帝一位论（Unitarianism）的一种形式。它起源于狂热地捍卫上帝的独一性。神格惟一论者主张：神不是三个位格，而是一位神。因此，他们教导说，基督不是神，仅仅是个好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教会进行了被称为阿里乌辩论的第一场重大争战。

神格惟一论的狂热支持者是萨摩萨塔的保罗；他是公元262~272年安提阿的主教，在棕榈女王芝诺比阿政府中担任政治上很重要的职务。他以激烈的姿态讲道，要求人们鼓掌，挥舞手帕。公元268年他被安提阿的教会会议谴责为异端。

## 教会的分裂

就在教会初具规模，羽翼初丰，仍然面对强敌威胁，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威胁的时候，其成员居然能在他们自己中间找到一些东西来争论，这是教会历史中的一个奇怪现象。例如，有些基督徒一直在争论应该在什么时候庆祝复活节。基督是在星期日，在尼散月14日复活的。当尼散月14日不是星期日时，应该将尼散月14日当作复活节来庆祝，还是在离这一天最近的星期日来庆祝呢？这个争论竟然一直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结束。

一场更加严重的争论导致了多纳图派的分裂活动，这场争论发生在大迫害过去以后的北非。问题是公元312年西西廉由费利克斯授以迦太基主教之职。费利克斯是一个主教，十年之前戴克里先实行迫害时他交出了《圣经》，让《圣经》被烧掉。西西廉的主教之职是由一个在迫害之下跌倒的人来授予，他能被大家接受吗？许多北非基督徒不承认这样的圣职，并选举多纳图取代西西廉为主教。多纳图派——多纳图的追随者——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的教会，基督教教会不得不对他们的错误做法作出决定。

看起来似乎很矛盾，所有这些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冲突，却带来了益处。正如细菌导致了抗体的产生，而抗体使人的身体更加健康，异端同样使基督教教会更加坚强。与假神的冲突促使了具有权威性的信条的形成，同样，也产生了要有《圣经》正典的愿望。

## 后使徒时期的见证人

这三个人我们不应当忘记：帕皮亚斯、波利卡普和革利免。

当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是惟一有权柄的声音。在他离世以后，使徒成为权柄。他们的事奉为神的圣灵所赐的外在特征所证实。寻找人替代犹太，表明了使徒的资格：使徒是见证人。他们是在耶稣全部的事奉中与他在一起，并目睹了耶稣复活的人（使徒行传 1:22）。这是使徒时期。

当这些使徒都死去时，就进入了后使徒时期。算得上使徒的人就是那些曾经“认识”使徒的人。在后使徒时期，教会的合一、教义的纯洁性、《圣经》的权柄，都面临着威胁。有三个人顶住了这些攻击。第一个人是帕皮亚斯，公元130年左右他是弗里吉亚地区希勒波利斯城的主教。他认识使徒约翰，以及腓力的四个女儿。



小亚细亚希勒波利斯古剧院废墟  
希勒波利斯的第二任主教  
帕皮亚斯以天使约翰





波利卡普，86岁的殉道者，他拒绝声明背叛他的教主。



虽然他的著作已经遗失，但是，他同时代的人引用了他的著作，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使徒与“四福音书”起源的有用信息。例如，我们知道马可是彼得旅行时的同伴与翻译，并且“虽然没有按照严格的顺序，但却准确地写下了彼得有关主的全部言行”。

第二个见证人是波利卡普，他是帕皮亚斯同时代的人。波利卡普是使徒约翰的门徒，被任命为士每拿教会的主教。他写了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信中充满了《新约》书卷的语言。他引用了大多数《新约》书信，也引用了“四福音书”——这表明《新约》书信和“四福音书”是2世纪中叶写成的，并且在当时就被承认是具有权威性的。波利卡普因为拒绝诅咒基督而被挂在火刑柱上处死。他的话令人难以忘怀：“我已服事他86年了，他从来没有对我做错事，我怎么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



主呢？”

见证人中的第三位是罗马的革利免，他是公元1世纪末罗马教会的主教。他认识许多使徒，可能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3节中提到的革利免。根据革利免约在公元96年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罗马的基督徒已开始收集流散的《新约》书卷。革利免引用了“福音书”，保罗的《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保罗其他的一两卷书信，《彼得前书》和《希伯来书》。

## 捍卫信仰

假如《圣经》真的被罗马帝国的皇帝成功销毁，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护教者和辩论者的著作重现《圣经》呢？

大约公元150年，当这些见证人都死去时，另一些人又为领导与权柄的问题再起争端。他们在以后的150年中，分成两大类：护教者与辩论者。护教者关心的是古罗马帝国的非基督徒，而辩论者关心的则是教会；护教者为基督徒的品行辩护，辩论者为基督教的教义辩护。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护教者有两个任务。从消极意义上讲，他们驳斥诸如吃人肉、乱伦、反社会行为等莫须有的指控。从积极意义上讲，他们将基督教与犹太教、异教、帝国的国家宗教进行比较，肯定了基督教。列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殉道者查士丁可能是2世纪最杰出的护教者。大约公元100年，他出生在撒马利亚的尼亚波利，后来成为一名漫游哲学家，涉猎斯多葛派哲学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一天，他在海滨散步时，一位老人劝他仔细阅读使徒的著作，这些著作带领他归向了基督。殉道者查士丁写了两部主要的著作，他把其中的第一部给了皇帝及王子马可·奥勒利乌斯。大约公元165年，他为他的信仰在罗马被斩首。

第二个重要的护教者是德尔图良，大约公元150年出生在迦太基。他精通古典语言，当他作为律师在罗马开业的时候，他归向了基督。他在给他那个省的罗马总督的《护教文》一书中，为加在基督徒身上的各种罪名辩白，维护了基督徒的清白，并且指出逼迫是失败的，因为每当迫害加剧时，基督徒人数反而迅速增加。德尔图良因他的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而享有盛誉，并被认为是拉丁神学之父。

辩论者反对神秘主义的默想神学，捍卫基督教。他们与他们皈依耶稣前原来的信仰，作坚决的斗争。他们维护正统的信仰，拯救教会脱离灾难。这些人中包括反

上图：殉道者查士丁（公元100-165年）

下图：德尔图良（公元150-222年）。





对诺斯底异端的伊里奈乌斯（公元130-200年），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公元150-215年）（不要与罗马的克雷芒相混淆）。克雷芒在他受迫害而退休之前曾是亚历山大一所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他博览希腊的异教文献，据说他引述了多达500个不同的文献。

我们不能遗漏奥利金（公元185-254年），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与学者之一，他既是护教者，又是辩论者。16岁时，他的父亲在亚历山大殉道，让他来支撑一个六口之家。奥利金下决心要与他的父亲一起去死，以至他的母亲不得不把他的衣服藏了起来，阻止他离开家。他不但是一位神学家，而且是一个有很好灵性与信心的人。

这些人《圣经》有什么贡献呢？据说有个故事，在公元18世纪的时候，一群英国学者在聚餐会上以提问题来自娱自乐。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像皇帝所图谋的那样，《新约圣经》被成功地销毁了，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能不能通过护教者与辩论者的著作重现《新约圣经》呢？”两个月后，曾参加那次聚餐的大卫·道林普尔爵士在自己家中召集了一个聚会。在桌子上放着一大堆有霉味的书卷，他指着这些书卷说：“这是一些2~3世纪的著作。我已仔细查阅了这些书卷，到现在为止，除了11节经文外，我已经重现了整本《新约》。”



奥利金 (c185-254), 学者与教义辩护者

## 殉道者的血——教会的种子

这种外衣由粗布做成，涂上沥青、蜡、硫磺。罗马士兵强迫基督徒穿上这种衣服，把他们的下巴挂在树桩上，然后点燃，当作“城市的火炬”。

臭名昭著的古罗马圆形剧场，于公元72年由韦斯巴芗开始建造。公元80年由他的儿子提多完工。1084年诺曼人洗劫罗马以前，它一直巍然屹立着。而现在，剩下的只是它的骨架。在它里面，一群高贵的基督徒殉道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以满足罗马暴民嗜血的欲望。在罗马假日，大批的人群将汇聚在角斗场上，渴望得到刺激。当假日结束时，看门人镇定地将饱食后心满意足的狮子锁上，带它们回地窖，清除大屠杀后人的尸体。古罗马圆形剧场象征冲突与牺牲，人类历史黑暗的一页，早期的基督徒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狂暴。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如此的仇视呢？这有许多理由。





古罗马圆形剧场，许多基督徒先后在这里殉道，以满足迫害狂嗜血的欲望。

第一个理由是政治上的。罗马帝国有着众多的民族与众多的宗教，要维系它的统一，一个办法就是崇拜皇帝。除了犹太人，每个人必须向皇帝的守护神烧香。不这样做就是叛国。长期以来基督徒被认为是犹太教派的成员。罗马当局最终认识到，犹太人憎恨基督徒。当基督徒拒绝归荣耀给皇帝，并在晚上偷偷地聚会时，他们被怀疑在策划阴谋。

第二个理由是宗教上的。古罗马人信仰多神，所以只要一个偶像能屈从于罗马国家宗教，他们就很乐意将它放在罗马万神庙其他偶像的中间。但是，基督徒的神是不适合放在偶像的搁架上的。此外，罗马人对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耿耿于怀，并怀疑这种排他性的宗教仪式是邪恶的。

基督教也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宣传人人平等的概念，这个概念将皇帝与奴隶放在同一水平上。显而易见，在一个半数人口是奴隶的帝国里，这会使统治者感到多么不安。

最后，对教会的敌意也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使徒行传》19章可以看到。以弗所城中制作狄安娜黑色小偶像的工匠，在销售量下降时就失去了收入。他们发动骚乱不是因为道德上或属灵的义愤，而是因为他们的口袋空空如也。综观整个帝国的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到对基督徒威胁的程度。



起初，疯狂的迫害还限于局部性的，但是公元250年以后，迫害遍及整个帝国的范围。有时，迫害由某一个皇帝领导，直到这个皇帝死时才出现缓和。帝国君主第一次攻击基督徒，是在公元64年罗马大火之后。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报道说：“因为罗马被纵火焚烧，尼禄宣称这是基督徒所为，于是严刑拷打许许多多基督徒，然后将他们处死。”另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到统治者让人专门制作让基督徒穿的“折磨人的外衣”。这种外衣是由粗布做成，涂上沥青、蜡、硫磺。强迫基督徒穿上这种衣服，把他们的下巴挂在很尖的树桩上。尼禄命令在半夜把他们焚烧，当作“城市的火炬”。

在这些迫害中，基督徒被用各种残酷与痛苦的方式处决。据史料记载，当局在一些房子里面关满基督徒，然后焚毁，夷为平地。每50个人一组，用绳索绑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入海中。刀剑、烧红的链条、拉伸人身体的轮子、撕裂人身体的铁爪，都被异教的罗马用来扑灭那位“心里柔和谦卑”者所产生的影响。



罗马皇帝尼禄（公元37-68年），他的残忍成为传奇文学的素材。



皇帝戴克里先 (245-313), 又一个迫害基督徒臣民的逼迫者。



最后一个迫害浪潮出现在公元303年的3月, 皇帝戴克里先在他颁布的敕令中, 宣布终止所有基督徒的聚会, 拆毁所有教会的建筑物, 销毁所有神圣的著作。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斯写道, 接着公元304年又颁布了敕令, 命令基督徒向异教的神献祭, 否则就被处死。他还写道, 当时的监狱是如此的拥挤, 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容纳犯人。在许多地方, 官员们对于不肯在祭坛上面献香的基督徒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然而, 在埃及与巴勒斯坦迫害尤为严重。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以后, 那里的迫害越来越残忍。最后,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临终时颁布敕令, 容忍基督教; 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 给予基督教敬拜的自由, 同样把这样的自由给了其他的宗教。

纵观公元64年到公元305年这个时期的历史,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基督教不但在迫害中存留下来, 而且兴旺发达了。1世纪中叶, 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很兴盛, 其中心在耶路撒冷。到1世纪末, 它已经扎根整个罗马帝国。到3世纪末, 基督教已经渗透到帝国最遥远的

角落，更有甚者，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甚至已成为多数。

第二，迫害使人们在教会的观念上更加敏感。那些妥协的人们引发了十分痛苦的思考：他们是不是配与那些忠贞不渝的人一起敬拜？当基督徒面对将要来临的酷刑与殉道，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生命中哪些更重要的问题：生命是不是比真理更加重要？家庭的关系与神家的关系相比，是不是第二位的？

第三，迫害的焦点集中在神话语的权柄上。哪些书卷应该作为神的默示而被接受，还没有取得最终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 第二章

# 中世纪的圣经

(大约公元500-1500年)

### 潘多拉的盒子

君士坦丁认为富裕是神赞许的标志,他给了教堂大量钱财,用来帮助穷人。于是,开始了基督到金钱的转变。

摄政王的儿子君士坦丁,在宫廷中长大成人。他和父亲一起,与皮克特人作战。当时他的父亲负责分管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公元306年他父亲去世时,他们在约克郡。君士坦丁被军队拥戴为皇帝,但是,罗马只承认他是恺撒(副帝)。公元312年,在罗马城墙附近的米尔维亚桥之战中,君士坦丁打败了西罗马皇帝马克森蒂尤斯,成为西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恺撒。在这场战斗的前夕,一个晴朗的下午,他

君士坦丁大帝,他的宽容赦令标志着官方对教会逼迫的结束。



宣称他看见天上有十字架的记号，上有铭文“靠着这个记号征战”。他宣称在随后的晚上，梦中主来到他面前，命令他用基督名字的前两个希腊字母作他士兵盾牌的标记，用这两个字母以及十字架作为他的旗帜。君士坦丁就是这样皈依的，这在很多年后由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报道的。

公元313年1月，君士坦丁颁布了值得纪念的“敕令”，根据这个敕令，所有的宗教派别都要得到宽容。敕令还要求归还基督徒所有被没收的财产，并给基督徒担任公职的机会。这个敕令没有使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宗教——但是，它标志着异教衰落的开始。

君士坦丁直到公元337年病倒时方才受洗，同年去世。罗马的元老院将他列入诸神之中，时至今日，希腊与俄国的东正教教会在5月21日举行活动来纪念他。

君士坦丁将教会与国家联姻，但是，国家是君，教会却为臣。这个有害的联姻持续了一千多年。

君士坦丁的个人生活与他的信仰表白不相符合。他非常狂妄自大，聚集在他周围的都是那些助长他自负的人。他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认为神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向他启示神自己，似乎神作了特别的努力使他改变信仰。甚至宫廷的主教们常常忘记，哪一个统治者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中有一个人告诉君士坦丁，他被神任命作全世界的统治者，并被指定与神的儿子一起统治将来的世界。对于这位主教的赞扬，君士坦丁提醒主教约束自己的言语，并为他祷告。

君士坦丁也是他突发的嫉妒与愤怒的牺牲品。因为他怀疑第二个妻子法乌斯塔与他的继子克里斯帕斯有染，就将他们处死。然而，他的决定是根据错误的消息，他后来非常后悔。

他对教会的做法也是本末倒置的。他认为富裕是神赞许的标志，为此更加看重财富的力量。他把因迫害一直穷困潦倒、心灵备受创伤、茫然不知所措的主教们，带到光彩夺目、香气扑鼻的宫中。又把位于希琉坡立（太阳城）的异教神庙拆毁，废除那些可憎与放荡的礼仪。虽然那个地区没有基督徒，但他建造了一个教堂来取代异教的神庙，并为该教堂配备了教牧人员与主教。然后，又给了教堂大量钱财，用来帮助穷人，认为这会使人回转变主。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转变的开端，就是从基督转变到金钱，从讲道转变到购买，这种状况以后支配了中世纪的许多教会。

君士坦丁几乎不懂什么神学。他竭力要将自己从对鬼的极端恐惧中解脱出来。当他的良心因他杀死继子而使他十分不安时，他回过来首先求助于一位柏拉图哲学家，然后是一些异教的祭司。他得知信仰基督教能除去一切罪，这已是后来的事。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教会联合，带来了一个好处。公元331年，皇帝要求优西比乌斯准备50本《圣经》，用于君士坦丁堡的教堂。结果，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些书卷构成了《圣经》？

## 《信经》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召集所有基督教教会代表在尼西亚举行会议，调停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歧，并确立《信经》为合法、正统的信条。

在教会历史中有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一般大公会议想要规定教义。第一个时期从公元325年到公元787年，在这期间举行了七次普世大公会议；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期。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领利西尼乌斯（又译李锡尼），于是从君士坦丁堡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帝国。他下决心要让他的臣民在敬拜神中统一起来，但是他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務。基督教教会正因痛苦的神学争论而动荡不安。深刻的分裂与深深的裂痕使得统一看来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为了解决分歧，他召开了会议。第一次公会议与最后一次公会议是在尼西亚城举行的，所有七次会议都是讨论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的分歧。下面是发生在第一次基督教公会议期间的事。

亚历山大是公元318年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他作了一篇有关三位一体的讲道。在讲道中说，“基督”是根据天父在地上的作用而给他取的名字。有一个名叫阿里乌的神甫，是当地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位讲道人。他听了这篇讲道，坚决不同意这位主教未能区分基督与天父的理由。阿里乌认为，基督虽然比人大，但比神小。冲突越来越尖锐，结果亚历山大使阿里乌受到教会会议的谴责，并被逐出教会。

亚历山大非常固执，不让阿里乌的追随者领受主的圣餐，甚至不与否定基督神性的人一起擘饼。

这场争论发展成为有关救恩的问题：一个比神小的人能不能拯救罪人脱离灭亡？

阿里乌逃亡到东方，在优西比乌斯那里避难。这个优西比乌斯不是那个恺撒利亚的主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斯。他是阿里乌的老朋友。在东方，他的观点颇被人

接受：安提阿教会长期强调基督的人性，竭力抵制把基督仅仅当成是天父所显示出的美德的这样一种异端。争论在不断继续，产生了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的分裂。皇帝认为这会导致严重的教会分裂，试图从中调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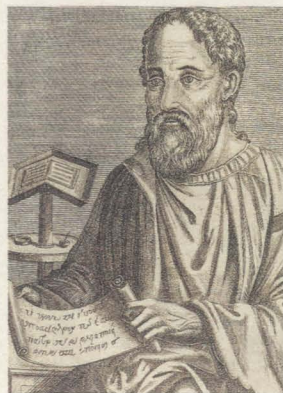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给双方写了封信，指责他们轻率地在一些纯理论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不影响基督教的本质。但是，争论过于深刻，这样简单的方式解决不了。因此，皇帝召开由所有基督教教会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公元325年第一次基督教公会议在小亚细亚西北的尼西亚举行。

将近三百个主教出席了会议，有些人来自罗马帝国以外的东方教会，只有少数人来自西方教会。罗马的主教差派了两位长老代替他。皇帝主持了会议，承担了全部费用。会上有三种突出的声音，表达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阿利乌的观点。他强调说基督不是永恒的，而是由神提前创造的。基督不是与天父“相互等同，永久并存”，不是与天父“同为一体的”。第二种声音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年轻人，刚刚30岁出头，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在亚历山大学院里受教育。他的名字叫亚大纳西。当时，他只是一个执事，作为主教的助手。他有力地维护了我们所认为的正统的观点，即基督是永恒的，具有与天父相同的本质。

第三个声音是历史学家、恺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斯的声音，他所代表的是多数派。他试图采取折中的立场，努力将阿利乌与亚大纳西二人观点中为他看好的结合起来。优西比乌斯带来一本他在恺撒利亚教会的施洗告白，上面有他所在地区的主教们的签名。这个告白完全是正统的，但是并没有回答所争论的问题。因为它留下某些含糊的地方，这样不同的派别可以按照各自的观点来解释。如果对阿利乌派加以谴责，它就能为亚历山大学院所接受。在简短的争论以后，它被通过了。在优西比乌斯《信经》中增加了四项对所有支持阿利乌立场的人的强烈谴责。优西比乌斯起初反对作这样的添加，但是，为了和睦随后就妥协了。然而，休战只是暂时的。

仇敌原来想用迫害来消灭教会，在遭到失败以后，现在采用不同的策略：他企图通过内部的分裂来拆毁基督教。

尼西亚公会议解决教会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君士坦丁前来支持阿利乌，他认为阿利乌是正统的。亚大纳西拒绝赞同阿利乌派，对此君士坦丁不能理解。辩论导致教会长达50年之久的极大痛苦，直到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二次基督教公会议。大会作出决定，公元325年主教们表决通过的内容，“将不再搁置于一旁”。这个决定以后在公元451年的加尔西顿大会上被通过了。于是，尼西亚的《信经》成为合法的、正统的信条。



上图：阿里乌，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讨论了他关于神的有争议的观点。

下图：优西比乌斯，尼西亚的主教，第一个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



尼西亚公会议强调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据优西比乌斯记载，皇帝召集会议，支付费用，主持评议，决定会议的结果，还指定一位主教代表皇帝，统管一切民事和圣工的事务。

不过，大会还是产生了好的结果。它强调了《圣经》与《信经》是彼此互补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保罗写到“真理的腰带”与“圣灵的宝剑”。前者就是《信经》，后者就是道。如果没有后者，前者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是危险的。这些初期教会的神学家所面对的困难之一是，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在《圣经》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圣父、圣子、圣灵在神性中的关系，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他们所争论的是《圣经》的意思。使徒的著作构成所有信仰与行为的最高准则。

## 《新约》正典

当我们提到“canon”时（译者注：canon 一般解释为“标准”，在基督教信仰中表示“正典”的意思），我们只是讲到秤，铅垂线或砝码。这个词初次应用在《圣经》上是在公元4世纪。但是，《新约圣经》不是一位作者一蹴而就的。它的成书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于耶稣死后约30年，持续了约400年。

什么使一卷书具有“正典的权威性”呢？这有许多因素。首先，这卷书是由使徒所写，或由使徒授权写的。其次，它的教导荣耀基督，且与使徒的教导相一致。第三，从教会产生以来就一直为基督徒所承认并使用。

正典的形成经历过许多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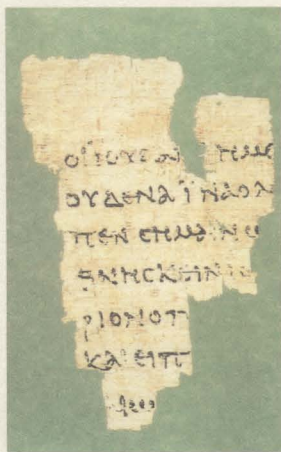
1. 早期的教会相信，时间不会长，耶稣“很快”会来。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去写，只要讲道就可以了。

2.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写下信息的要点（就是带领人归向基督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的要点）。准确的词语、时态、句法，在这阶段都是不必要的。

3. 公元303年出现戴克里先的迫害，号召烧掉所有属灵的书籍。我们不知道在这期间销毁了多少册书；想必有数千册。这使人们更加明白了《新约》著作的重要性。

4. 替代被销毁的书籍，以及满足教会在人数上与地理上扩展的需要，带来了书籍的大量流通。例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君士坦丁要求将50本《圣经》送到君

约翰·赖兰兹片段，公认的最古老的福音书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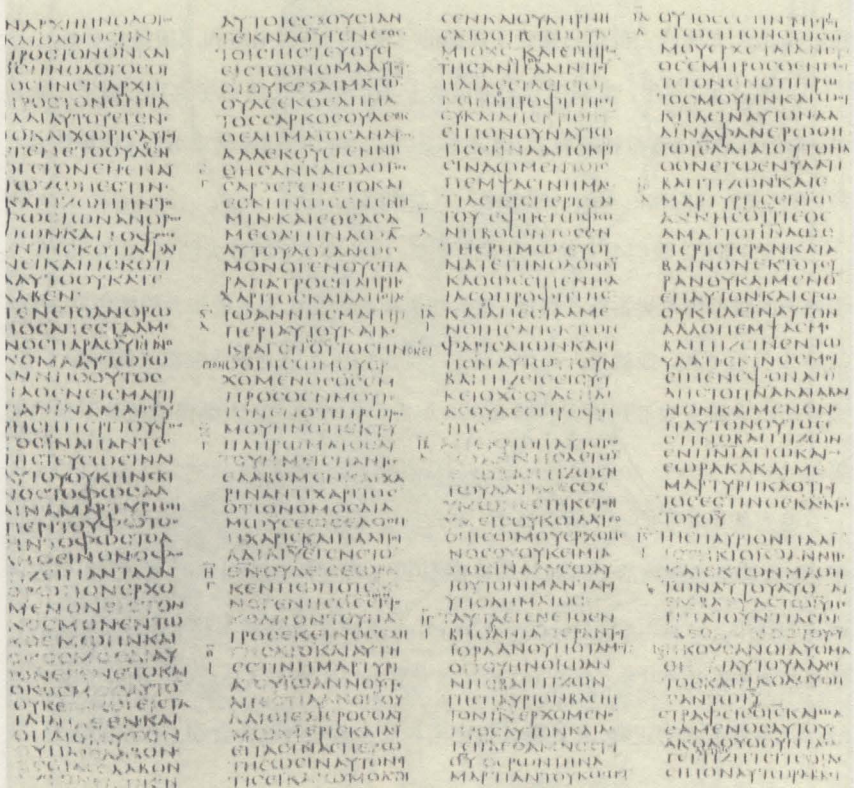
士坦丁堡的各教堂。据估计，现在还有 13000 件尚存的文献，这些文献自称是属灵的书卷，其中 8000 件是用拉丁语写的，5000 件是用希腊语写的。

5. 有争议的神学只能用权威性的著作来检验。使徒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教皇权威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只有这些著作有权威调停争论。

## 权 威

公元 397 年在迦太基举行的第八次公会议上，一致确认由 27 卷组成的《新约》为正典。从此，教会的声音达成一致，并树立起权威。

《新约》最前面的五卷书，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普遍地被接受了。因为基督教就是基督，除了揭示基督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必要的呢？到 1 世纪末，“四福音书”已经被收集在一起，里面还有保罗的书信。公



西奈手抄本的一页，对于今天确定圣经的准确文本，西奈手抄本是最重要的文件。





亚大纳西 (293-373), 阿利乌在尼西亚会议上的主要反对者。

元2世纪初手抄本(相对古卷而言,意思是现代形式的书本)的出现,使得这些合订本可以包含在一卷书之内——将这么多的材料写进一卷古卷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公元4世纪以前《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彼得后书》、《犹大书》和《启示录》,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即使在那时,因为对《希伯来书》的权威性有怀疑,也没有将它包括在内。随着东西方的日渐分离,在还有哪些书卷应该包括在内这一问题上也产生了不一致:一些人主张把《克雷芒书信》包括在内,另一些人则主张收入《巴拿巴书信》和《牧人黑马》。

大约公元160年,异教徒马西昂第一个试图给《新约》的著作开列一个名单。我们知道,这激发了教会要为自己规定正统的正典。我们从德尔图良的著作中得知,大约公元150年,一本《新约》著作的文集在罗马已经作为权威被接受,这本文集与我们今天的《新约》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所拥有的第一个《新约》正统书名目录,也来自罗马,时间大约在公元170年至公元210年之间,被称为《穆拉托里残本》。我们拥有的抄本是用拉丁语写的,由于它很古老,因而是一个重要的文件。它遗漏了《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书信”、一封“约翰书信”。它也拒绝了当时流传的两个文稿——给老底嘉人的信和给亚历山大人的信,但是它接受了次经的《所罗门智慧书》和《彼得启示录》。

大约公元230年,奥利金对无争议属于《新约圣经》的书卷给我们写了一张目录,他的目录与《穆拉托里残本》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希伯来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雅各书》、《犹大书》。

公元4世纪,我们今天的27卷书的目录,已经被东方的亚大纳西(公元367年),和西方的哲罗姆与奥古斯丁引证。亚大纳西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在他20岁生日后不久,他就投入写作,留下一部值得纪念的有关救赎教义的神学专著。当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在公元328年去世的时候,亚大纳西就接替了他的职位。

迦太基是北非的一个著名城市,在政治上是罗马的主要竞争对手。到公元4世纪,迦太基虽然在政治上不如罗马重要,但是,那里的教会在非洲的教会中仍起着领头的作用。公元218年至公元418年,有14次大会是在迦太基举行的,争论的问题多是关于洗礼。但是,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举行的第八次公会议,确认了由27卷《新约》书卷组成的正典,正式通过四年前在北非希坡的教会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认可了已被接受的天主教教会惯例。

当时,教会的声音有了权威,这权威相当于耶稣在世时的权威。对于这一权威,

每一次大会或秘密会议，每一个祭司或教皇，每一个审慎的团体或教派，都要向它屈膝。神的道是至高无上的！

## 被偶像化的译本

哲罗姆以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为基础，翻译修订拉丁语《圣经》，成为典范，以至他以后几代统治者禁止任何人用任何语言翻译《圣经》，并且拉丁语成了宗教的“官方语言”。

公元331年，优西比乌斯·哈伊罗尼穆斯，对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的是其简称哲



教皇达马苏斯(304-384)在哲罗姆帮助下颁布了圣经正典，并授命哲罗姆翻译拉丁文标准圣经(Vulgate)。



罗姆，出生在达尔马提亚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他早年的教育是在他父亲监管之下，后来他父亲送他去罗马，在著名教师多纳图斯门下，学习修辞学和哲学。当他在罗马的时候，他接受了洗礼，并严守刻板的禁欲生活。

公元373年，哲罗姆与三个朋友出发去巴勒斯坦，中途停留在安提阿。他在那里得了很厉害的热病。在生病时，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基督对他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使他清醒过来，于是他放弃研究属世的学问，进到旷野里约四年时间。在那里，他在希腊语上大有进步，并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这是一种只有很少西方神学家懂得的语言。以后，他回到安提阿，公元378年他在安提阿被任命为牧师。公元379年，他去君士坦丁堡，在格列高利·纳西昂曾门下学习，与他结为亲密的朋友。哲罗姆受格列高利反对阿里乌教义的训诫的影响，成为反对谬误，维护真理的忠诚斗士。他翻译了一些优西比乌斯与奥利金的希腊语著作。两年以后，他回到罗马，那时罗马的主教是达马苏斯。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就结成了真诚与持久的友谊，哲罗姆成为达马苏斯的秘书。哲罗姆憎恨许多罗马基督徒舒适放纵的生活方式与放荡的行为，并公开批评罗马教会——批评得那么多，以至于达马苏斯死后，哲罗姆被勒令离开罗马。

哲罗姆的三年罗马之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直到公元3世纪中叶，西方教会一直在说希腊语，只有北非在正式地使用拉丁语。然而，到公元4世纪，拉丁语成了教会与帝国进行交流的语言。到了哲罗姆的时候，《新约》的不同部分有了许多拉丁语译本，然而，靠得住的却寥寥无几。所以，达马苏斯要求哲罗姆修订拉丁语《新约》。公元384年，出版了他的“福音书”译本，随后即出版了《新约》的其余部分。他的修订本尽管很杰出，却受到许多批评——人们看到自己所喜爱的经文被改变了，因而十分痛恨——这是他被勒令离开罗马的另一个原因。

他离开罗马，前往伯利恒，过着隐居的生活，专心致志于修订拉丁语《旧约》这一艰巨的工作。他所面对的是一项毫无希望的工作。在北非，现有的拉丁语译本不是以希伯来语原文作为基础，而是以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作为基础，这个译本有许多缺点。例如，它是许多不同的人的作品，结果相同的希伯来语词语被翻译得不一致。过了一个时期，哲罗姆放弃修订这个拉丁语译本，转而直接翻译希伯来语文本。那时东方的教会已经出版了另一本《圣经》：“奥利金六合本”。它包括《旧约》，写成六栏，第一栏是希伯来语，其他五栏是各种希腊语译文。哲罗姆的工作是以奥利金的希伯来语文本为原本，把它直接翻译成拉丁语。

公元405年，他完成了使命，在伯利恒度过余下的光阴，专心从事捍卫正统信

哲罗姆，他的新旧约译文被认为是拉丁文标准文本（Vulgate）。



仰的写作。当他与贝拉基主义者论战时，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逃离伯利恒。两年后，公元418年他回到伯利恒。又过了两年，他就去世了。

有些人认为，哲罗姆修改“七十士译本”，因而是在批评翻译这一译本的72位学者。他们反对他们认为是哲罗姆胆大妄为修改的地方。但是，哲罗姆的新旧约译本远超过当时所有的拉丁语译本，奥古斯丁等学者都接受了它，并且很快就被推荐到所有西方的教会。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作品是“流芳百世的贡献”，这使得他“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到16世纪，在他以后的人也没有超过他的。哲罗姆因他的语言学知识、他的东方之旅、他的整个文化背景，成为承担并成功地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的最佳人选和唯一人选。”

他的译本被称为“拉丁文《圣经》”，或“通行本《圣经》”，但是，好像是很矛盾的，它反倒成了堵塞其他普通文本通道的工具。拉丁文《圣经》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以至于他以后的几代人决定禁止任何人翻译任何其他的译本，并且拉丁语成了宗教的官方语言。任何一个神甫，不管他的母语是什么，都要用拉丁语接受教育。于是，“好的”成了“最好的”的敌人，不懂拉丁语和普通百姓被剥夺了《圣经》。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使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因为大众没有《圣经》与《圣经》的教导，使这种黑暗成为黑暗中的黑暗。

## 修道院运动

修道士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单独生活的人”。隐修生活出现于公元3世纪，到中世纪形成修道院运动。

虽然在基督的时代以前犹太有苦行主义者社团，但耶稣并不是一个苦行主义者。就我们所知，基督教早期没有修道士。最初的修道士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修道士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单独生活的人”），就我们所知，隐修生活方式直到公元3世纪中叶才开始形成。从安东尼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在上埃及的旷野里过了20年孤独的生活。其他的基督徒渐渐效仿他的榜样，来到同一个地区生活。虽然他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是安东尼充当着他们的心灵指导者。

第一个隐修社团是由帕科米乌斯在尼罗河流域的塔宾尼西建立的，一群隐居者在那里一起生活，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则”。巴西勒（公元329—389年）在西亚的卡帕多西亚鼓励并发展了这种做法。



早期沙漠中的隱居者，是其他  
修道士的指導者。



那时修道院成为自给自足的社会团体，在教会的保护伞下，献身于维护某些教义或实践。耶稣关于财富分配的话，以及从保罗教导中得出的有关婚姻的守独身的推论，是为维护隐修生活方式所常见的争论。

巴勒斯坦的隐修方式大约始于公元315年，是希拉里翁在那里推行的，他曾经在埃及受安东尼的影响。安东尼的朋友与支持者亚大纳西，在公元340年访问罗马时，向那里的基督徒介绍了这种思想。我们知道，当哲罗姆于公元382年来到罗马时，世俗生活对教会的影响，极大地搅扰着他。一方面是极度的富裕，另一方面是独裁式的领导，这导致了对敬虔与道德完美的偏离。哲罗姆成了隐修生活方式的鼓吹者，以及提倡圣洁与禁欲的人。他遭到神职人员的反对，尽管他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皈依者的赞助，其中大多数人是有钱人的寡妇和女儿。著名的皈依者波拉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她将这笔财产分发给穷人。她的女婿是元老院的一位议员，他也转而接受了哲罗姆的教导。当哲罗姆去伯利恒时，波拉跟随他去，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修道院，三个为修女院，一个为修道院。她将这四个修道院都置于哲罗姆的管辖之下。按教会历史学家腓力·沙弗的说法，哲罗姆是古罗马修道生活方式之父。从小亚细亚到不列颠，这种做法很快盛行起来。

公元6世纪初，本尼迪克特建立了隐修制度，这个制度成了西方隐修生活的模式。他的本笃会修道院，要成为“侍奉主的学校”。因为这种隐修制度没有实行严格死板的集中控制，而是由在院长管辖下的各独立的修道院组成的宽松联盟，所以有几个支系，每个支系在某些事上各不相同，从而形成新的制度。此后，各种隐修制度，像新教中的教派那样涌现出来，每一种制度在神学与实践上都有不同之处。

到公元1100年，隐修制度处于守势。捐赠给修道院的有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而被吸引来过隐修生活的不再仅仅是那些虔诚的人们：在神圣的外衣下，世俗的贪婪开始攫取财富。

在中世纪末，出现了另一个改革。应运而生的有托钵（词意是“弟兄”）修会修士——加尔默罗会修士（创建于1154年）、方济各会修士和多明我会修士（创建于13世纪初），以及各种不同的奥斯丁会修士。当修道士在修道院范围内隐修时，托钵修会修士走了出来，将宗教带到社区。托钵修会修士没有财产，他们或者做工，或者乞讨以维持生活。在13世纪20年代，两位伟大的缔造者，多明我（公元1170—1221年）和方济各（公元1182-1226年）先后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影响传播开来，迅速而且深远，将新的生命注入隐修制度。

修道院成了世俗世界的“盐”。本笃为隐修社团所有成员的工作制订了详细的



说明。修道士要日以继夜地祷告和赞美，但是他们也要做世俗的工作，如同做神圣的工作一样。他们的世俗工作使他们得以不依赖封建领主，维持他们对修道院的委身。

修道院也是教育中心，修道士与托钵修会修士也从事写作或抄写哲学和文学经典的工作。只是到了中世纪末，当天主教学校与大学兴起时，修道院在教育上的优势才失去。

但是，修道院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与抄写经文。修道院使神的道保持生命力，他们是一个黑暗世界中光明的中心。

虽然修道院是重要的，但是，修道士却像教士一样，站在农民与他们的神之间。基督徒认为，《圣经》不能到达普通人的手中，普通人认识真理必须通过教士和修道士这个中介。

## 边缘地区的生活

对罗马帝国而言，爱尔兰、苏格兰、甚至不列颠，都只是边缘地区而已，因为偶然的机，基督教才被传播到这里……

基督教传到帝国边缘地区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有许多故事与传说一直流传至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一位来自蒂尔（即推罗——译者注），名叫梅罗皮乌斯的哲学家，他航海出去去印度。他们的船在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译者注）海岸失事，他与他的同伴都被当地人处死。仅有的幸存者是两个男孩，他们因年幼而被赦免。但作为奴隶被送到国王身边。他们因为服侍得非常好，成了国王的侍酒者。当国王去世时，他们获得了自由，国王的遗孀王后要求他们照看她的儿子。他们借助这种特殊身份，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基督教。他们中的一人以后回到亚历山大城，请求亚大纳西差遣主教去阿比西尼亚。这样，基督教在这个遥远的国家获得了立足之地。

### 爱尔兰

虽然我们对于圣帕特里克的了解很多都是推测性的，但是我们知道公元389年他出生于不列颠西海岸的某一地方。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执事。帕特

圣帕特里，来自爱尔兰的著名修道士。





里克受到了基督徒应当受到的良好教育和训练，但当时他本人并不是基督徒。当他16岁时，一帮爱尔兰强盗洗劫他的家乡，帕特里克和他父亲的男女仆人，以及其他数千一起，被掳到爱尔兰。爱尔兰从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们被卖为奴隶，帕特里克作为酋长的牧人，度过他后来的六年时光。他写道，正是在那个时候，“主除去了我的不信……使我转而归向主，我的神。”他的信仰让他活着。最后，他顺从内心中神的声音，逃走了。他找到了通向海边的路，与一群出口爱尔兰狼犬到海外的商人一起，乘船离开爱尔兰。三天以后，他们在法国登陆，然后飘荡了两个月，最后他离开那些人到了莱林的修道院，在那里他成了一名修道士。几年以后，他离开地中海地区，回到不列颠。有一次他做梦，梦中看见一位名叫维克多里纳斯的人，拿着一些羊皮纸文稿，他把其中的一卷递到帕特里克面前。在羊皮卷的开头之处写着：“爱尔兰的声音。”他听见有人在喊：“帕特里克，圣洁的孩子，再到我们中间来吧。”

他不顾朋友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去了爱尔兰，在奥克瑟勒度过了以后的14年时间，为他的宣教使命作准备。他被委任为执事，最后任主教，并被允许出海。他的业绩有许许多多，是许多神话故事的主题。他主要的工作似乎是在北部，担任阿尔马的主教，他于公元461年退休。在帕特里克开展宣教工作之前，福音已经传到爱尔兰，但是，由于帕特里克，爱尔兰基督教的信息才得以传遍整个国家。因为他，爱尔兰成为“圣徒与学者”之地，宣教士们从爱尔兰出来，走向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

## 苏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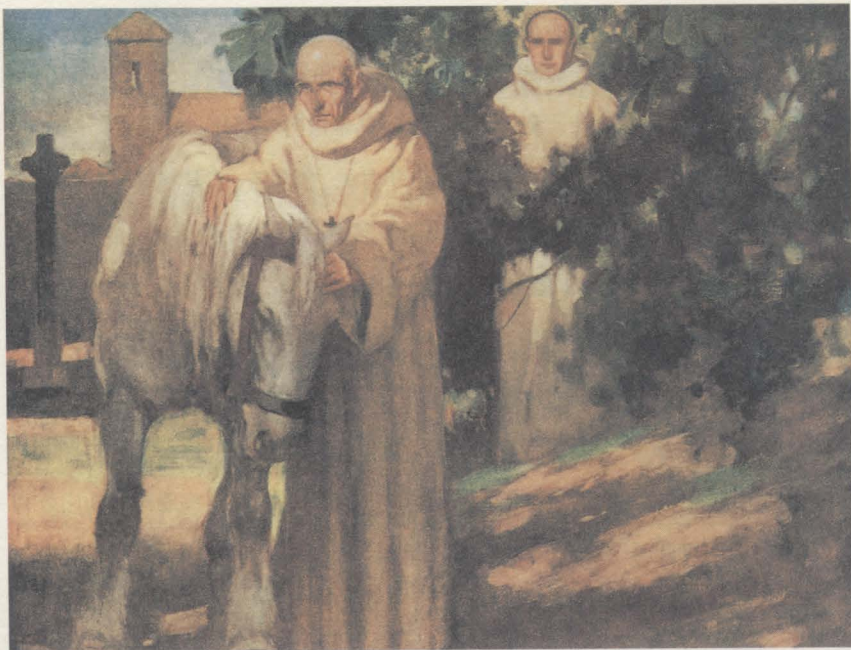
公元521年，科伦巴出生在爱尔兰。公元544年，他被任命为教士，据说是他建立了伦敦德里的各修道院。公元563年，他42岁时，和12个同伴乘坐一只用柳



马尔岛上古代凯尔特教堂，6世纪时，科伦巴在那里建造了他的修道院。



艺术家笔下的爱尔兰传教士科伦巴。



条编成、用兽皮覆盖的小船，出海航行。他们在西苏格兰马尔岛外的爱奥纳小岛上登陆。这个岛只有三英里长，一英里半宽，即使在今天也只有不到300个居民。科伦巴在岛上建造了修道院，从那里向皮特克人宣讲福音。据说，他于公元597年6月9日去世。于是，福音传到苏格兰，就像传到爱尔兰一样，没有得到来自罗马教会的任何帮助。

## 不列颠

恺撒于公元前55年曾征服了不列颠，基督教最初的踪迹可以追溯到罗马基督徒士兵的影响。欣顿基督头像——一幅公元四世纪的罗马马赛克镶嵌画（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与鲁林斯顿的罗马别墅，留下了罗马占领期间在不列颠就有了基督教信仰的确凿证据。公元325年，大不列颠的主教们就应邀参加了尼西亚会议，但是，英国灵性生活的记录已经遗失。公元410年，最后一批古罗马军团撤离了大不列颠海岸。公元449年撒克森人的入侵实际上切断了不列颠与罗马帝国其他部分的联系。数百年来这个岛一直处在不断的骚乱之中，但是历史很少有记载。

有个故事至今在流传，说罗马人离开近200年以后，两个金头发、蓝眼睛的男孩子在罗马的奴隶市场出售。以后成为罗马教皇的格列高利，问他们是谁。人们回答说：“他们是盎格鲁人。”“不是盎格鲁人，是天使，”他说，“他们应该是与天上的天使一起作继承人的。”（“盎格鲁人”与“天使”在英语中的拼写几乎相同，只是“盎格鲁人”的第一个字母为大写。——译者注。）当他当了教皇时，他没有忘





教皇格列高利发现在罗马作为奴隶出售的盎格鲁人。



肯特郡坎特伯雷大教堂。

记这些男孩子。公元596年，格列高利委派奥古斯丁和40个修道士去大不列颠传福音。第二年，在科伦巴死于苏格兰的前几个月，他们到达肯特郡。国王埃塞尔伯特让他们使用在坎特伯雷的一座旧罗马—不列颠教堂，国王的基督徒妻子就在这座教堂里做礼拜。埃塞尔伯特与他的百姓很快都成为基督徒，奥古斯丁被任命为主教，并且有权按立其他主教。宣教没有到达整个国家，当时国家分裂成七个王国。不过，它有着显著的影响，甚至远达像诺森布里亚这样的北方，它的国王埃德温于公元627年和他的许多百姓一起在约克郡受洗。直到今日，坎特伯雷仍然是英国教会的宗教首都。



## 七个伟人

我们这里暂停一下，特向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七个伟人表示敬意。在一个地方，基督教的信息是用不再使用的语言书写、宣讲，又被各种礼仪弄得模糊不清，这个信息绝不能满足人们心灵的渴求。这七个人想用原始的方法把《圣经》翻成本国的语言。他们之中，地位低的有马厩里的雇工，也有贵为王者。

### 凯德蒙

凯德蒙死于公元680年。他开始时是一个仆人，在英格兰北部惠特比的一个修道院的马厩里工作。乍看之下，将他列在《圣经》翻译者之中，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他从来没有翻译过《圣经》！然而，他以一种令人惊讶和难忘的方法，把《圣经》搞得普通男女都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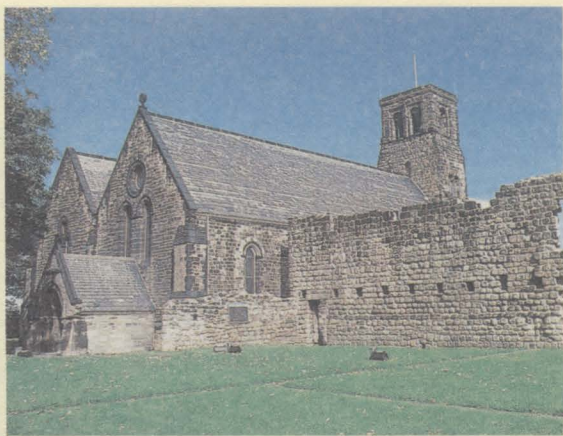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修道院的每一个人按照惯

常的做法，聚集在大厅里用餐。他们围坐在熊熊的火堆旁，每个人随着竖琴轮流唱歌，自娱自乐。每天晚上，每当轮到凯德蒙的时候，他就起身离开，喃喃说着马需要些什么，牛需要些什么。有一天晚上，他正在马厩里慢条斯理地干活，一位“天上的来访者”来到他面前说：“凯德蒙，唱歌给我听！”

他说：“我不会唱歌，因为这个原因，我离开了饭桌。”

那声音又说：“唱歌给我听。”

凯德蒙问道：“我唱



诺森布兰德·贾罗的教堂，德高望重的比德在这里翻译了《约翰福音》

什么呢？”

来访者说：“歌唱万物创造的开始。”凯德蒙就开始唱，他十分惊讶自己所唱的歌如此美妙，并突然明白了一切。第二天，来访者离去，恩赐却留下了。女修道院长希尔

德看见他现在得到作诗歌的恩赐，就劝他离开世俗的工作，加入隐修的生活。一位修道士给他读拉丁语《圣经》，并翻译它的意思。然后，凯德蒙将它改变成诗歌，每当他唱《圣经》时，他的听众都听得出神。凯德蒙是英国最早的诗人之一，他的歌成了百姓的《圣经》。

### 爱尔德海姆与埃格伯特

凯德蒙以后的两位《圣经》翻译者是爱尔德海姆（公元640-709年）和埃格伯特（死于公元766年）。爱尔德海姆当时是西撒克逊马姆斯伯里的修道院

德高望重的比德（674-735）





长，他翻译了《诗篇》，主教埃格伯特翻译了“福音书”。

## 比德

还有一位是德高望重的比德（公元674-735年），他是一位修道士、学者、历史学家、神学家，著有《英格兰教会史》，这本书使他获得“英格兰历史之父”的称号。他也生活在英格兰北部的贾罗。他最后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约翰福音》的译本，他是将译文口授给一个抄写员。那个抄写员很担心在完成翻译以前，比德的健康就会垮掉。一天早晨，他看见比德非常虚弱，就说：“亲爱的先生，现在还剩下一章，但是看来你讲话很困难了。”

“不，”比德回答说，“拿起你的笔，快点写。”

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抄写员说：“还有一节就可以完成了。”

“快点写，”这位圣徒说。最后，他背靠在枕头上，叹了口气：“啊，完成



撒克逊国王阿尔弗莱德（849-899）

了！”然后停止了呼吸，留下他脆弱的躯壳，进入了神的同在。把他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用在《圣经》的翻译上。

## 阿尔弗莱德

再下一位《圣经》翻译者是撒克逊国王阿尔弗莱德（公元849-899年）。阿尔弗莱德在位期间，丹麦人入侵英格兰北部，毁坏修道院与图书馆。阿尔弗莱德奋战保卫他的王国，最终保住了英

格兰的南半部。他的母亲是位敬虔的妇人，因为她的影响，阿尔弗莱德酷爱读书，尤其是《圣经》。他是教师、作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了“十诫”，将它们放在英格兰法律之首。他也翻译了《诗篇》与部分“福音书”。他的愿望是，“他的王国里所有生来就自由的青年，都应当首先能够阅读好英语《圣经》，然后才从事别的工作。”

## 阿尔德莱德和

## 爱尔弗立克

最后两位是阿尔德莱德和爱尔弗立克，前者是北诺森布里亚的一位教士，后者是埃因沙姆的修道院院长。在诺曼征服之前的那个世纪前后，他们两人都翻译了《圣经》。阿尔德莱德找了一本拉丁语“福音书”的手稿，在行间加入他所在地区公元10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方言的意译。爱尔弗立克于公元1000年前后翻译了《旧约》的前七卷和《约伯记》。

这七个人在向我们说什么？一个婴孩哭喊，是因为他受了伤害，或者他需要什么东西。如果从人们那里把神的话夺走，他们必会寻遍全世界要得到它。如果把神的话用外语写成，并且编成密码，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来破译密码。直到与神的话直接接触，他们的心才得到满足。



## 与国家联姻

在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对于皇帝，就好比太阳对于月亮。亨利四世曾赤着脚，穿着破衣服，站在卡诺萨教皇宫殿外的雪地上表示悔改。这件事的寓意是：与国家的联合导致教会世俗化，并最终走向腐败。

很难说，罗马帝国由于是什么原因开始衰落与灭亡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从而使这两个帝国都削弱了，而公元535-553年与哥特人的战争导致在意大利可怕的杀戮与破坏。公元568-572年，日耳曼另一部落伦巴底人的入侵，使得状况更加恶化，除了罗马城之外，其他地方全部沦陷，当地的居民沦为奴隶。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大格列高利”，公元540-604年）的即位，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卓越的领导扭转了他所面对的悲剧性局面。他用教会所获得的财富，收买了伦巴底人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一直没有得到军饷。于是，他使教会获得了恺撒王国教主的美名。

公元8世纪初出现了新的威胁——比哥特人与伦巴底人更可怕的威胁，哥特人与伦巴底人至少在名义上是基督徒。这个新的威胁就是被伊斯兰征服的恐惧笼罩了西方世界。穆斯林军队已经越过北非，穿过西班牙进入法国南部，从而对整个欧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旦他们到达罗马，欧洲就会落入伊斯兰教手中；所幸，公元732年他们被德意志统治者查尔斯·马特打败。

当伦巴底人最后的一位国王再次威胁罗马时，教皇转而请求查尔斯的帮助。公元771年查尔斯打败了伦巴底人，使他的统治从汉堡扩展到罗马。德意志的军队继续支撑着帝国，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将帝国的皇冠放在查尔斯·马特的孙子——查理曼的头上。（这个名字是卡罗勒斯·马格纳斯的缩写，意思是“查理大帝”。）从那时起，德意志的国王使用“Kaiser”这个称号，这个德意志词语相当于希腊词语中的“恺撒”。他们称他们的帝国为“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它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甚至不是一个帝国，仅仅是德国与北意大利的一个联盟。然而，有时这个帝国宣称，它在东方控制了波兰与匈牙利，在西方控制了西班牙、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联盟给了教皇空前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教皇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像钟摆一样地摇摆不定。起初，教会与皇帝平等地统治欧洲联邦。公元1024年，皇帝奥托去世时，教皇的职位落在皇帝的控

制之下。公元1046年，皇帝废黜了三个教皇，用他自己的候选人填补了教皇皇位的空缺。以后，公元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禁止皇帝、国王或王子任命任何教职人员，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中也是如此。至此，教皇开始任命皇帝。格列高利（也称希尔德布兰德）宣称，教皇对于皇帝来说，就好比太阳对于月亮。这一点，在皇帝亨利四世被逐出教会这一著名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当时，亨利四世赤着脚，穿着破衣服，站在卡诺萨教皇宫殿大门外的雪地中表示悔改。这件事的寓意是，教会与国家的联合从来不是以教会的基督化，而是以教会世俗化而告终。

愚昧无知是这种联姻的一个结果。蹂躏意大利的哥特人几乎是未开化的人。甚至包括查理曼在内的最高贵的领袖，是否能读和写，也是很有疑问的。哈勒姆在他的《中世纪》一书中说，“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中，神职人员的愚昧无知都成为嘲讽的对象。……可以肯定，公元992年召开的会议中，在罗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人认识字母表中第一个字母。”

伴随无知而来的是迷信。女巫、术士、占星家的生意很兴隆，人们很轻易相信荒诞的、不符合《圣经》的故事。例如，据说童贞女马利亚曾显形托住一个因在大路上抢劫而正要被吊死的人的双脚。她坐在他的脚下，直到他被取下，并被释放。据说，有一个修女与人私奔，过着罪恶的生活，她装扮成那个修女的模样，在那个修女的地方工作了十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直到这个任性的修女回到自己的修道院里。

专制的控制取代了思想的自由，在封建社会中这种控制是很容易强行实施的。伽利略在拷打的威胁之下，被迫否定自己天文计算的结果。罗格贝康发明了火药时，他不敢公布这一事实，只将这秘密放在字谜游戏中就心满意足了。

神学在教会与国家的联合中也深受其苦。教会不再以神为中心，不再从圣灵获得能力，教会变得毫无生气。当时，大型神学讨论只是涉及诸如早晨和晚上天使的心态这样的问题。在教会的公告与会议中缺乏神学的内容，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这意味着与持不同观点的基督徒讨论神学问题已不可能。因而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等团体，就离开了教会。

总之，教会卷入这一千年的政治，削弱了自己，落到了堕落与叛教的地步。

## 教皇制度与传统

卜尼法斯八世说：惟独教皇可以被称为至圣的，即神圣的



君主、至尊的皇帝、万王之王……

对中世纪黑暗的指责中，多数应当归咎于教会，尤其是应当归咎于腐败的教皇制度。

在“新约”时代，基督教的教职人员有“牧师”（牧养群羊的牧者）、“长老”（审议会议的主席）、“监督”（在工作中有影响的人；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是 episcopos，从这个词我们引申出了“bishop”主教这个词）。《使徒行传》20章17,28节等章节表明，这三个词是同义词：“长老”被任命作为一群人的“监督”，他们得到鼓励去牧养这群人。犹太人的教会强调长老的作用，而希腊人的教会则强调主教或监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称呼被用来指不同的职位，“主教”（bishop）这一词就表示负有更高的责任。起初，每个教会由一群监督/长老来治理，但是，可能是为了确保教会的合一，渐渐形成由一位主教来带领一个教会的做法。在一个地区，常常因为某个教会是建在该地区的主要城镇里，因而要比其他教会更大，更有影响，这时这个教会的主教就变得更加重要。

使徒们去世以后，《圣经》正典被一致确认以前，教会因异端与冲突而分裂。当西方人期盼得到罗马授权时，罗马的主教们的影响就渐渐地更加扩大了。公元440年，利奥一世对《马太福音》16章作出正式的解释；他说，“钥匙”指的是使徒的继承权。公元607年，卜尼法斯三世强迫皇帝授予他“普世主教”这一称号。到公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他宣告了教皇的权利。

元12世纪，在世俗的事务上英诺森三世对诸如英国的约翰等国王行使权力。又过了100年，卜尼法斯八世能够说：“惟独教皇可以被称为至圣的，即神圣的君主、至尊的皇帝、万王之王……此外，我们申明，断言，规定，宣告，每一个人都要臣服罗马教皇，这对于教恩来说是必需的。”

同时，教会传统的重要性逐渐加强。起初，有一些有关耶稣教导的传闻，这些教导没有写下来，而是通过内部享有特权的信徒传出来的。以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传闻，说某些东西是使徒们的教导。在第三个阶段，发现了一些尊敬的教父未曾发表的信件，这些信件也加入到了这些口头传闻之中。这些传闻以后得到教会会议宣言和教皇敕令的支持，并且，所有这些传说汇集起来成为有约束力的圣传。根据1546年特伦特会议的决议，神的话包括书面的《圣经》和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

有一个公元9世纪的文献汇编，据称是一个名叫伊西多尔·墨卡托的人编纂的，强烈支持罗马主教至高无上的权柄。这个汇编后来被称为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这些文献的来源和原作者至今仍在探疑。只有几篇文献是可靠的，绝大多数是逼真的赝品。汇编中有94篇伪造的敕令，但当时人们仍对它们怀着极大的敬意，直到公元15世纪才第一次有人提出疑问。这些信件对教皇制度的思想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公元12世纪，意大利本笃会修士格拉提安，做了完善的工作，他将这些文献分类，还作了评注，在这之前已经有人试图作分类与编纂的工作。他的文集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立法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法律的实际应用，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礼拜仪式。三个世纪以来，除了格拉提安的《教令集》，实际上没有其他的教令，他的著作成了所有神学院的教科书。到宗教改革爆发的时候，大多数毕业于牛津与剑桥的教士都是主修教会法典的。

使中世纪教会更加黑暗的，不是《教令集》，而是无意之中将神圣的《圣经》封闭起来。教士不学习《圣经》，而是学习教会法典；神的话被人为的障碍和教会传统所禁锢；普通人没有一本用他们日常的语言写的《圣经》，他们必须依赖教士的帮助，而这些教士常常是道德败坏的。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教会的黑暗。

##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在英格兰，为十字军东征筹措经费，耗尽了国王与封建领主的财力，结果削弱了整个封建体系。在欧洲，十字军东征的直接结果，是人们对教皇独裁专横的统治越来越怨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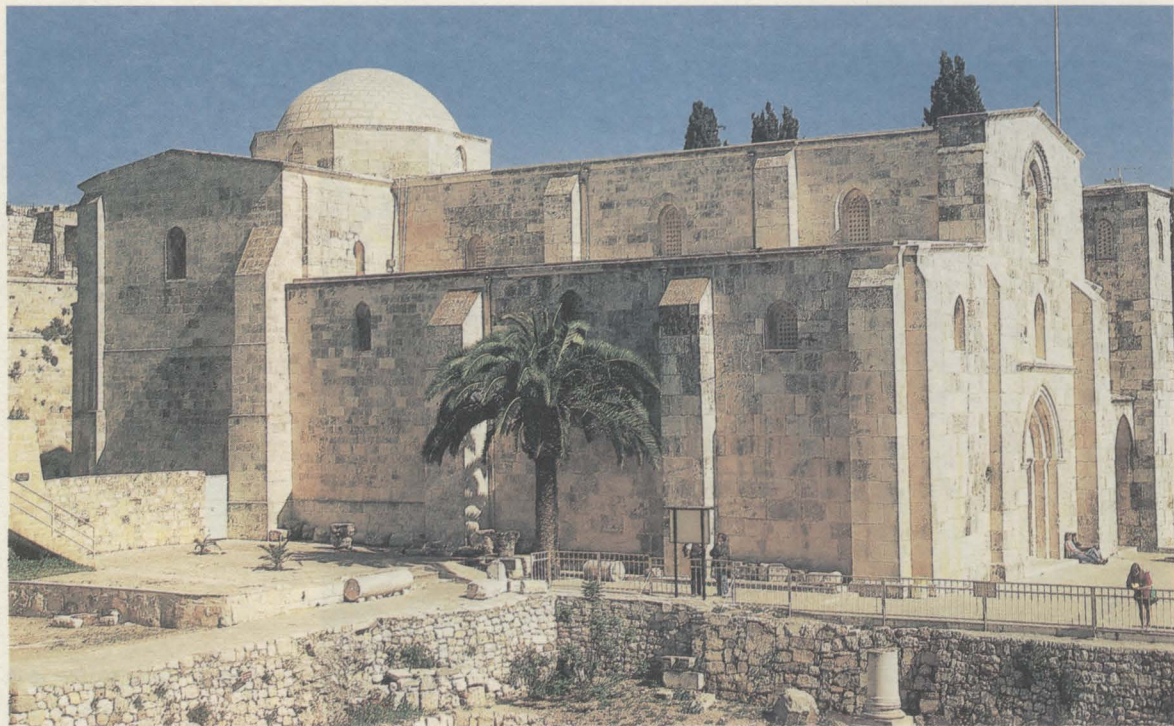


公元570年，穆罕默德生于麦加。他是一个商人，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为他生了四个女儿。据说他得到异象，在异象中天使迦百列向他传达了穆斯林宗教，他成为该宗教的大先知。这个宗教被称为“伊斯兰”，意思是“顺服”。它很快传入了其他的国家，从印度到西班牙，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宗教。

公元1100年至1300年之间，教会在中东发动了针对伊斯兰的军事行动。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塞受到穆斯林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他呼吁教皇组建“基督教的军队”来帮助他，战争的序幕拉开了。西方基督徒对此非常关注，因为塞尔柱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耶路撒冷。他们是一支凶悍的军队，因此必须加以遏止。公元1095年，在克勒门特的教会会议上，乌尔班二世敦促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参加十字军对抗异教徒。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想象力被激发了起来。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第一次，卷入的人数超过100万。一些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参与。当时西方正面临饥荒，威尼斯人看到了东方新市场的潜力。另一些人应召可能因爱好军事冒险，或者为逃避本国无聊的生活，或者因为犯了罪而为了逃避惩罚。不管是什么理由，十字架作为纹章装饰在所有的盔甲上，附在各国的旗帜上。它成了神圣战争与血腥杀戮的象征。

因为发起十字军运动的乌尔班二世是法国人，所以大多数响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是法国人。一大群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聚集在君士坦丁堡，出发迎敌。他

耶路撒冷的圣安妮教堂，十字军攻占圣城后所建。





BERNARDUS: ABBAS: CLARAV

明睿的贝尔纳，他的讲道促成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英诺森三世，收复圣地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



们或者被屠杀，或者被送到监狱，在埃及被卖为奴隶。这使得法国、比利时、北意大利的贵族又作了一次努力。他们也是在君士坦丁堡相遇，这一次是公元1097年的春天；到公元1099年的6月，他们攻占了耶路撒冷。他们立刻将征服的省份并入耶路撒冷王国，按封建制的原则实行管理。

当穆斯林以后威胁到他们的东北侧翼时，他们要求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147年，明谷的伯尔纳在讲道中呼吁对穆斯林作又一次的军事打击。法国的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两支军队联合起来，但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了，公元1187年穆斯林再度攻占耶路撒冷。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被称为“国王的十字军东征”，战争从公元1189年持续到公元1192年。英格兰首次卷入其中。英格兰的理查、法国的腓力与帝国皇帝腓特烈，开始了他们的冒险。腓特烈意外地在途中溺死，理查与腓力彼此争吵，于是腓力也撤兵，独自留下理查。虽然理查不能攻占耶路撒冷，但是他实现了“撒拉丁和平”，允许未来的朝圣者进入耶路撒冷。

教皇英诺森三世认为，埃及是解决伊斯兰占领圣地这一问题的关键。他号召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提出占领埃及，以埃及作为以后进攻巴勒斯坦的基地。这次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性，在于公元1024年希腊教会被迫臣服于教皇的权力。这削弱了东方的帝国，孕育了希腊基督徒与拉丁基督徒之间的苦毒。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是由腓特烈二世领导的。公元1229年，他成功地将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以及直通海边的狭长通道，置于基督徒的控制之下。这是通过与埃及王苏丹之间的一项条约得以实现的。根据这个条约，穆斯林可以保留他们在

圣城中的奥马尔清真寺，腓特烈加冕为耶路撒冷的王。除此之外，公元13世纪还有三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1212年的童子军使十字军东征陷入了最低谷。这支童子军是由名叫司徒反和尼古拉的两个男孩带领的。孩子们相信，他们父辈的罪使他们输掉了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并且认为他们自己纯正的动机，将使他们的敌人像苍蝇一样在他们面前倒下。法国与德国的儿童集合在他们的周围，他们越过南欧和意大利北部，那些没有在中途倒毙的人，都在埃及被卖为奴隶。

这些事件与我们的英语《圣经》有什么关系呢？所有这些事情都为推翻教会一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作了间接的准备。在英格兰，为十字军东征筹措经费，耗尽了国王与他的许多封建领主的财力，结果削弱了整个封建体系，这个封建体系原本控制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正是在这个时期，签署了大宪章，承认国家对个人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在欧洲，君士坦丁堡在政治上的削弱，最终导致了它在1453年的陷落。那些积极从事经典学识研究的学者与思想家逃到了西方，随身携带着许多书籍，我们将可以看到，这给宗教改革者提供了许多他们所要的工具。但是，十字军东征的直接结果，是人们对教皇独裁专横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怨恨。

## 消灭“异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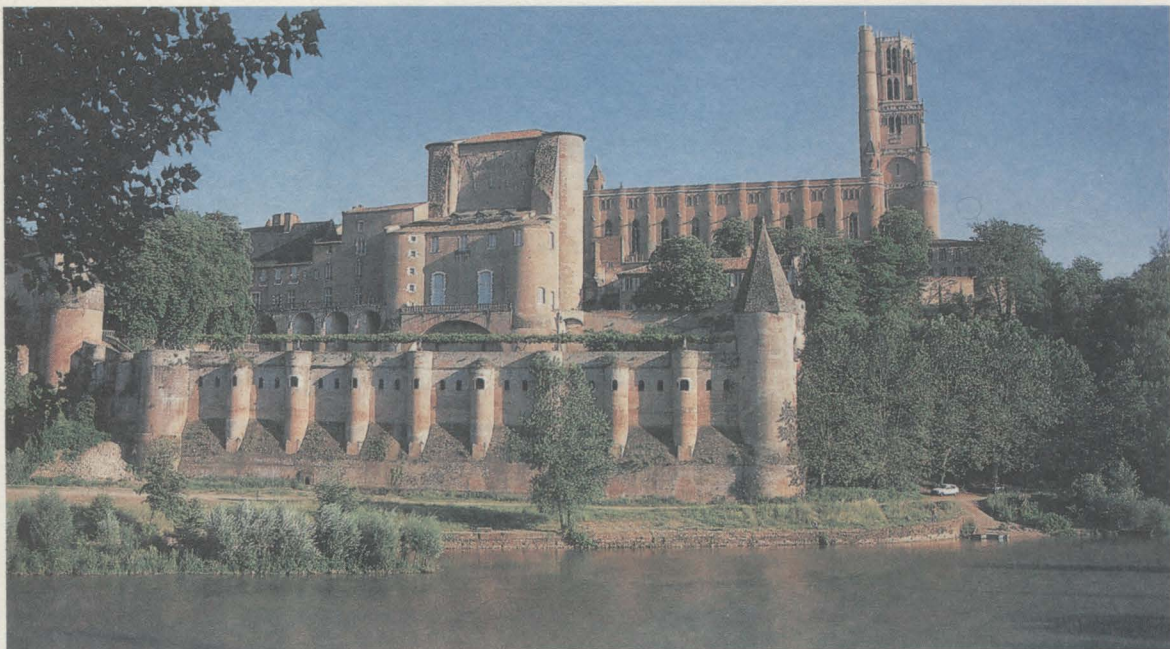
从这时起，罗马教皇开始使用极端手段铲除教会内部的异己派别，阿尔比派和沃尔多派都有数以百计的教徒被残杀……

### 阿尔比派

阿尔比派这一名称来自阿尔比，一个与阿尔比派密切相关的城镇。阿尔比派认为，当撒旦犯罪时，神就给他一个身体，然后把他赶出天堂。撒旦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结果，所有的物质从本质上讲都是邪恶的。他们宣称，人类崇高的使命就是将灵从其肉体的囚禁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只有通过严厉的强制性的苦行主义约束才能得以实现。这些约束包括不结婚，严格规定的饮食，不参与战争也不参加政府机构，摒弃敬拜中的“对象”。垂死的人必须接受“安慰”的圣礼；否则，这人的灵魂就只好被赋予另一个形体。

我们之中很少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信条，但是，我们能限制别人持有这样的信条





在阿尔比的要塞式大教堂，此教堂用来保护阿尔比派教徒，抵御敌人。

的权利吗？公元1119年，图鲁兹会议要求世俗的力量来帮助铲除这一异端，但是，贵族们保护阿尔比派，普通百姓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0年以后，当英诺森二世登上教皇的宝座时，他命令十字军攻打这些卡特里教徒（阿尔比派又被称为卡特里派）。这样，在法国北部与南部的王子之间突然爆发了战争，摧毁了南部贵族的独立。偶尔会有反抗，但是遭到残酷的镇压。在一天之中，有200个卡特里派教徒被烧死，甚至那些同情者也受到了严厉的报复。

## 沃尔多派

彼得·沃尔多，沃尔多教派的创始人。



彼得·沃尔多是住在里昂市的一名富商。公元1173年，在经历了一次很深的宗教体验之后，他决定将他的财富分发给穷人，仅留下足以维持他家庭生活的部分。其他的人效法他的榜样，这一群体就被称为“里昂穷人”。他们信仰的主要宗旨是，《圣经》是他们至高的权威，而彼得·沃尔多已经将拉丁语《新约》翻译成了本地语。他们的信仰是正统的。他们相信耶稣的神性，并且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得到救恩。传福音是他们信仰生活的中心。他们认为教会领袖应该抛弃世俗的生活，以乞讨为生，最好是守独身，然后“传道”。

公元1174年，教皇差遣宣教士来改变沃尔多追随者（即所谓的沃尔多派教徒）的信仰。当劝说失败时，火、柴、剑都用上了。一位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布佐维乌斯谈到了从公元1206年开始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反对沃尔多派的战役。教皇任命多

明我（多明我托钵修会的缔造者）负责这次远征。他们占领了一个营地，发现里面有“180人，他们宁可活活被烧死，也不愿接受一个虚伪的信条”。在另一城镇，“芒特劳依尔的领主被绞死，另有80人倒在绞刑架旁，也被十字军战士杀死……无数的异教徒被烧死。”又在另一个城镇，1215人被俘，“其中450人被魔鬼弄得心地刚硬，顽固不化。他们中400人被烧死，其余的人被绞死。”

这些逼迫，就像古代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一样，手段虽然残酷，却不能扑灭这个运动。公元1532年，沃尔多派与宗教改革者联合，成为新教徒派。尽管有不断的，常常是骇人的逼迫，例如，1655年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镇中对信徒的大屠杀，但是，这一团体继续发展，今天他们的人数约有2万人。

## 宗教法庭

根据1184年在维罗纳会议上通过的方案，1232年设立的宗教法庭，是教会肃清异端的正式手段。凡是罗马统治的地方，都使用了宗教法庭。据波伊特纳记载，在西班牙三个宗教法庭的法官掌权期间，191285人被处死（其中31912人被烧死）。另有291450人被囚禁。

所有这些野蛮行为的实施，仅仅是因为人们拒绝服从官方教会的观点。当中世纪的黑暗消失时，寻常百姓开始自己读《圣经》，暴行越演越烈，而且后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参与实施这种罪行的，并不只是罗马教会本身。不过，我们现在要转而谈谈曙光和宗教改革的“晨星”。







## 第三章 宗教改革以前英国的《圣经》

### 干旱之地

以赛亚预言，弥赛亚将降临，“像根出于干地”（赛 53:2）。许多跟从主的宗教改革者，尤其是威克里夫，也可以用这话来描述。威克里夫是英国第一个大改革家，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虽然他不是第一个抨击教会中腐败行为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对当时那种基本教义进行谴责的人。公元 1330 年左右，他出生在一个叫做威克里夫的村庄，离约克郡的里奇蒙六英里，但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牛津度过的。他是一个具有杰出的智力与勇气，魅力超群的人。在一所最看重辩论术的大学里，他可以与一组特地挑选的杰出学者们辩论，并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当他在政治与宗教的问题上采取与众不同的立场时，他不仅面对来自国王、国会、大学学术权威的威吓，最难以忍受和最痛苦的是，他甚至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教会的威吓，然而，他无所畏惧。青年人热心支持他的事业，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仍然坚信他是正确的。

为了表彰他的崇高品德，有必要了解一下有关中世纪“干旱之地”的一些情况。上一章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下当时的宗教环境，现在我们要看看中世纪生活中其他两个重要的方面：语言和政治。

### 语言

威克里夫时代的人说的是“中古英语”，虽然今天的人很难听懂“中古英语”，但这种语言与现代英语基本上相同。英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英语，它开始于公元 3 世纪以来入侵英格兰的部落。请记住，英格兰只是一个小岛。从英格兰最南端的地端岬到苏格兰北部的约翰奥格罗茨只有约 800 英里。岛上没有一个地方离大海超过 100 英里。外国的掠夺者一次又一次地入侵，占据了国家的不同部分，同时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朱特人定居在东南部，撒克逊人定居

在南部，盎格鲁人定居在不列颠的中部，从苏格兰的边界到泰晤士河。结果，岛上的居民说三种不同的古英语方言。盎格鲁人说麦西亚方言，当时伦敦人也说这种方言。

征服者威廉仅仅于威克里夫出生前260年在英格兰登陆，随之发生的是古英语向中古英语的过渡。他的部队说的是诺曼的法语，这种语言成了法律与政府的语言。但是，普通老百姓和商人继续说英语，只是从法语中借用了许多词汇。因此，现代英语常常有两个词来表示相同的事物，例如，农奴使用的词“lamb（羔羊）”与来自他们法国主人的“mutton（羊肉）”。前者指的是田野中的羊，后者指的是餐桌上的羊肉。

历史上，有两位中古英语的作家是十分杰出的：杰弗里·乔叟（公元1340-1400年）至今仍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人都知道他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但是，很少有人熟悉乔叟的朋友——约翰·威克里夫和他所写的那些优秀散文体作品。

## 政治

政治上也处于同样的变化状态。当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夺取这个岛屿时，他通过男爵们实施统治。男爵们为他治理各个地区，收税，统率军队。他们渐渐强大起来，致使国王不得不依靠他们。在150年里，他们如果在国家事务中得不到更大的发言权，就顽固地拒绝与国王合作。国王约翰（公元1199年至1216年在位）继承了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巨大的债务，又为准备与法国的战争增添了债务。他不可能得到来自教皇的支持，因为他任命了他自己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赶走了教皇所任命的人。但是他极需要钱，以至于他不得不屈服，甚至将他的王冠放在教皇使节的脚前——这一举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使王冠屈从于教皇的权柄之下，使王位屈居于教会之下。

约翰如果没有男爵们的财政支持，就无法生存。作为回报，公元1215年男爵们迫使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承认男爵、教会、自由民的权利。他后来企图废除这个文件，但是当他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修道院住宿时，一个修道士在他的酒中掺了毒药。这样，这个文件存在的时间比他本人更长久。从这些政治冲突中产生了英国国会，英国国会是美国以及全世界许多其他立法机构的前驱。



在指引英国走出政治困境、摆脱政府与教会相互冲突的进程中，威克里夫无疑起了主导作用，他惟一的工具就是《圣经》。

## 晨 星

牛津，出了威克里夫这位战士，他的剑就是《圣经》。

对于威克里夫的童年，我们一无所知。作为一名大学本科生，他在牛津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1356年他成为默顿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以后的16年中他还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在他人生的最后12年中，他继续保持与牛津的联系。虽然他有时也外出为王国政府工作，但是牛津是他的基地。他大部分教学和写作是在牛津进行的：他是真正的牛津市民。他在拉特沃思度过了他最后的两年时光，公元1384年在那里去世。

威克里夫到牛津时，牛津是什么样子呢？1167年法国驱逐巴黎大学所有的英国学生以后，这些学生在牛津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大学。市镇居民对这些穿礼服的读



约翰·威克里夫 (1330-1384)

书人并不友善，因而发生了市民与学生之间的争吵。在争吵中对立的双方有时还动手打起来。结果，1209年一些学生逃到剑桥，在那里建立了另一所大学。这两所大学很快成为欧洲的重点大学。威克里夫毕业的前一年，在圣学院节的一次暴乱中，有62位学生被市民杀害。在以后的468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市民将62枚便士放在圣马利亚的祭坛上，为他们的过错赎罪。

威克里夫做学生时，可怕的黑死病（即鼠疫——译者注）传入英国。这种病残酷无情，富人和穷人，老人和小孩都在劫难逃。伦敦的市民把位于史密斯菲尔德的几英亩空地用作公共坟场，不久，他们每天要埋葬200个死难者。这种状况一直在继续，直到这场瘟疫夺走了十万多条生命。

在这场可怕的瘟疫中，威克里夫经历了灵里深刻的复兴，达到了他灵魂的最深处。对神的敬畏使他不再把作为人的教皇与君主放在心里：他似乎与这位看不见的世界的公民有着心灵的交流。他重新安排了他做事的次序，更加热衷于神学研究。这个转变是心灵的重生，并证明是永久性的。

1356年，威克里夫毕业于默顿学院。五年以后，1361年他获得了文科硕士学位。八年以后，1369年他40多岁的时候，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37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那时，他已被认为是牛津杰出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这意味着他可能是英格兰最著名的神学家。他在神学辩论中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演讲时，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

1361年，他被授予牧师的职位，开始了在林肯郡菲林罕姆的牧师生涯。他一直在那里服事，直到他被任命为拉特沃思的教区长。然而，他没有住在这两个地方，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退休来到拉特沃思，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不在牛津他上下班的范围之内，他最喜爱的还是教学。（“教区牧师缺席”在当时是被人接受的一种做法，不过，寻找一个人取代他在教区中的位置，是教区牧师的责任。）在牛津的辩论使威克里夫的立场更加鲜明，他看重真理胜过传统。他研究的时间越长，越是能识别真理与谬误，分清黑白。他可以清楚地分辨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行为，即使这些腐败的东西是在上层神职人员红色与紫色外袍的遮盖之下。不管问题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是政治的还是教会的。

他说：“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正确的终究会得胜。怀疑就是不忠，犹豫就是犯罪。”

牛津，出了威克里夫这位战士，而首要的是，他的剑就是《圣经》。



## 冷 战

在这一时期，罗马与牛津展开一场冷战，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

### 政治战线

在威克里夫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职位都被神职人员所占据，他们影响力很大，做事大胆。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它有害于被呼召接受上层职位的神职人员，也损害了国家，因为这些人只接受来自罗马的命令。很明显，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政治。

此外，主要的宗教职位也全都被教皇提名的人占据，其中许多人是外国人，他们甚至从未踏上英国的土地，但是有丰厚的薪水送到他们手中。威克里夫认识到了这种政策在政治上的危害，更敏锐地感到其在宗教上的危害。神职人员被买卖，被交易，以讨好他们上层的宗教官员。事奉基督这一神圣的意识，已从讲坛上消失。在国会向国王递交一份有关结束罗马对英格兰控制的请愿书之前，威克里夫也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正是这本小册子为国王后来的一系列举措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义支持。这一点已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当中。

法国的教士被授予英国教会的职位，这对英国来说是最大的侮辱。这是罗马方面的愚蠢举动。当时英国正在和法国进行百年战争，这些任命只能激起更多的愤怒，增加敌意。这最终导致英国国会通过了两条重要的法令：

第一条法令是1351年的委任神职人员的法令。法令明文规定，当在外国土地中所作的任命被认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侮辱时，任何人都无权作这样的任命。法令也规定，外国在不列颠王国中的任命，必须首先得到国王的批准。

第二条法令是1353年通过的蔑视王权罪的法令。这条法令禁止任何外国法庭先于英国法庭向英国人提出传讯，或强行惩罚。它也废除了所有要求英国人到外国法庭受审的现有法令。以后，这样的法令需要得到英国国会的批准。

这些法令很快受到考验。当国王约翰将他的王冠放在教皇使节前时，教皇英诺森三世一年征收666英镑的不列颠王冠税。公元1320年以前，王冠税的上交是不稳定的。1365年，教皇要求重新得到这项税款的权利，并要求立刻支付欠款。为了给伤口上再抹上一把盐，教皇布尔第二年颁布命令，要求国王来罗马出庭，为自己辩护。罗马方面的这些决定，完全践踏了英国国会蔑视王权罪的法令。

六年以后，1372年，即威克里夫接受其博士学位那年，罗马方面差遣一名使者来英国为教皇在米兰的战争筹款。这位使者的随从过分奢侈浮华，他的外袍十分昂贵，大批会计人员需要许多房间。与其说他是一个教会的代表，不如说是一个国家的大臣。教皇的使者向国会作出承诺，他不会做任何有损国王利益的事。但是，威克里夫却看出，他所承诺的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于是威克里夫立刻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指出这位代理人使命的实质与他对国会的承诺是不相符的；事实上，他的承诺使他成为一个说谎者。

两年以后，威克里夫被委任参加国王的使团，受差遣到布鲁日，试图缓解伦敦与罗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项任务占用了一生中两年的时间，非常单调乏味，浪费时间。当他们的外国上级作出给予肥缺的应许以后，使团中许多英国主教就让步了，但是，威克里夫不接受贿赂，也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反对支付贡税。虽然他不能左右谈判，但是他的态度使他在国会中赢得尊敬，也赢得了冈特的约翰的友谊。冈特的约翰是国王的第四子，颇有权势。威克里夫以后成了王室牧师。

## 神学战线

冷战的第二条战线，集中在威克里夫摒弃圣餐变体论的教义上。这一教义的历史不算长，仅能上溯到公元1215年。该教义试图解释耶稣的话：“这是我的身体。”教会声称，虽然“非主要特性”或“外形”（即由人的感官所看到的面包与酒）保持不变，它们的本质确实神秘地转变成实实在在的基督的身体与血。威克里夫看出这种解释中的严重问题，认为这种解释没有《圣经》根据。公元1372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这表明他在当时没有被教会认为是异端。但是，公元1381年他出版了《论圣餐》一书以后，便失去了在宫廷、国会、教会里的大多数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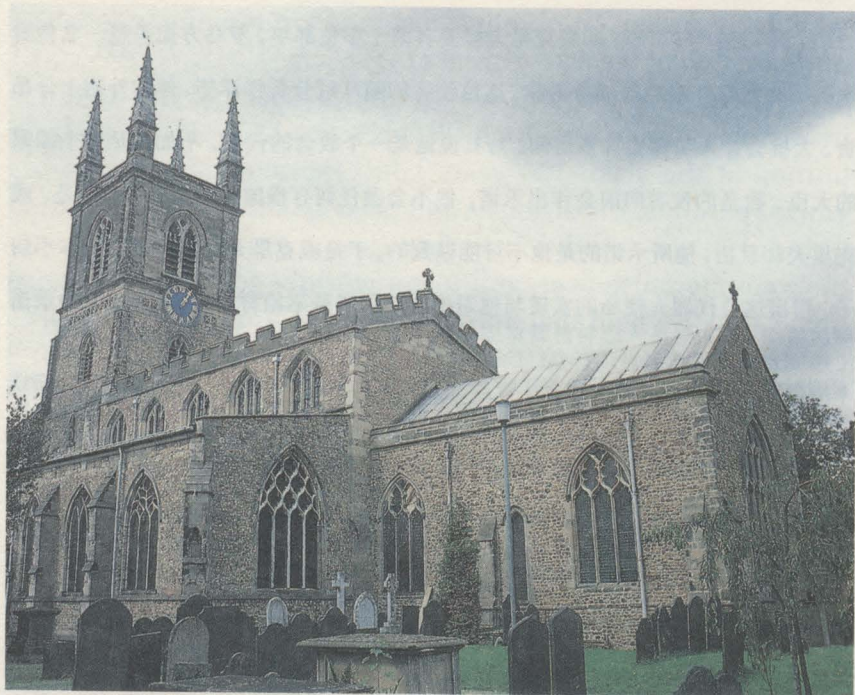
## 威克里夫的力量

威克里夫的力量在于他的笔。

威克里夫经常教导他的学生，谈论教会的世俗化和道德败坏。但是，他的笔比他的演讲更有力量。当时还没有印刷机，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须用手写，再经过手工吃力地抄写后发行。但是，笔仍然是传播革命思想最有影响力的工具。



拉特沃思牧区教堂，约翰·威克里夫是那儿的教区长，他促成了将圣经翻译成英语。



威克里夫最早的著作是写于公元1360年的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反对托钵修会》。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谴责托钵会修士破坏学校纪律和家庭关系，并称他们是瘟疫。他说他们犯了愚昧无知和改变信仰的罪，对于教会与大学都是极大的麻烦。关于这本小册子有两个重要的事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不是攻击教会，而是攻击教会中托钵会修士的堕落。其次，它使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他的巨著《论世俗统治权》写于公元1376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他宣称，“英格兰不属于教皇。教皇不过是人，受罪的辖制；只有基督才是万主之主，这个国家只能由基督直接掌管。”约翰·威克里夫认为，罗马与伦敦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甚至提出“每一个在英格兰的教皇的侨民，每一个生活在罗马朝廷中的英格兰人，都应该处死。”

公元1378年，他写了《圣经的真理》。在这本书中，他清楚地阐明了他对《圣经》中真理的观点。他说，《圣经》毫无错误，并包含了神的全部启示。来自任何其他方面的教训都是没有必要的，所有其他的教训都必须根据《圣经》来检验。

他的《论圣餐》一书出版于公元1381年，随后出版了《十二论点》。他反对他认为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东西，这种勇敢的行为使他失去了许多朋友的友谊与支持。

在威克里夫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到了宗教改革的全部萌芽。150年后在对宗教改革暴虐的镇压中，许多他的敬虔的支持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谴责依靠个人的著作、个人的饶恕、个人的特赦以及神职人员的赦罪。他称特赦是“敌基督的神职人员为了夸大其虚假的权力，为了得到属世的益处，使人害怕罪，而兜售的诡秘的商品。”他认为《圣经》是“出自神的口”：《圣经》是真理——超越教皇、教会、教父的教训，并告诉了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威克里夫摆好桌子，写下了伟大的宗教改革的菜单，这场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

他晚期的一本小册子是《三方谈》，这本小册子采用了真理、谬误、理解之间对话这样一种形式。“教会已经堕落，”他论证道，“因为她放弃了福音，宁可要教皇的教规。即使同时有一百个教皇（当时有争斗的两方），即使所有活着的托钵会修士都成为红衣主教，我们也必须在信仰上撤回我们对他们的信任，除非他们的教训是《圣经》的教训。”

威克里夫的著作深刻有力，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它最伟大的产物还没有出现——用英国普通老百姓的语言写的《圣经》（见下一节）。然而，他触犯了教会，必须首先面对教会的狂怒。

## 狮子笼

威克里夫在当时完全不被理解。“人们期望他被吞吃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很多人认为他应该被扔进狮子笼里”。

在威克里夫写了《论世俗统治权》以后，反对派决定，必须以某种方法使威克里夫沉默。这样，恐吓转变为行动。

1377年2月19日，威克里夫被传唤到圣保罗教堂的主教大会前回答指控。审讯引来盲目顺服教会的狂热人群。同威克里夫一起到达的，只有很少一些支持帮助他的人。但支持者中包括英格兰两位最有权势的人：英国最高军事长官珀西勋爵和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冈特的约翰在爱德华三世病危期间掌管着整个王国。这两个大人物走在威克里夫的前面。在他的后面是四个神学博士，他们是他的顾问。他们勇敢地穿越拥挤在教会门口充满敌意的人群。一跨入门槛，就面对喝倒彩的人群组成的坚实人墙。这些人前后涌动，愤怒地挥着手。王子向威克里夫保证他们会在那里保护他。珀西与伦敦主教科蒂内之间的对话尖锐而又充满火药味。珀西注意





巴利奥尔学院中约翰·威克里夫的画像。

到在他们论战时威克里夫仍然站着，就转过来对威克里夫说：“坐下，休息一会儿。”这一越权的举动激怒了担任主席的科蒂内。他喊道：“一个被传唤到主教面前的人，在回答问题时坐着，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必须站起来。”于是，人群骚动起来，审问无法继续。威克里夫和他的护送者幸运地逃脱了巨大的危险。

那年以后，教皇颁布了五道针对威克里夫的通谕，本笃会审查了他的著作，对18个论点表示异议，国王爱德华三世也得到命令，要他将威克里夫投入监狱，等候教皇发落。然而，国王是一个垂死的病人，没有采取任何针对威克里夫的行动。

公元1378年初，年仅十岁的理查二世登上王位，威克里夫再次出现在主教面前。这次传讯是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发出的；国王与大学都保持沉默。审判地点被狡猾地改变了，从圣保罗教堂转移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住所兰贝思宫。这一次又出现了愤怒的人群。“人们期望他被吞吃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很多人认为他应该被扔进狮子笼里。”但是，在王宫方面也有其不便之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条法律已经通过了，如果不经过国会与国王的同意，教皇的通谕在英格兰就不能生效。审讯开始后不久，就被路易斯·克利福德爵士打断，他给审讯带来老国王遗孀的口信，主要的意思是要他们不可对这位宗教改革者作出任何裁定。主教受到打击，惊惶失措。他们立刻来个180度的转变，企图安抚威克里夫，只是对他说，他不应该在牛津大学为他有争议的观点进行辩论，或在讲坛上宣讲这些观点。

公元1380—1381年的冬天，由12位牛津博士组成的委员会调查了威克里夫有关弥撒的教导，以七比五的多数得出结论，威克里夫是错误的。大法官警告，任何持有传播这种观点，或为之辩护的人，都将被囚禁，开除出大学，逐出教会。威克里夫对此作出回应，声称大法官不可能使他改变他的观点；公元1381年5月，他发表了辩护书，为自己受到谴责的观点进行辩解。

那一年是历史上被称为“农民造反”的一年，在瓦特·泰勒与约翰·波尔的领导下，农民向伦敦进军，为自己鸣不平，国王被迫躲进伦敦塔。当局提出，威克里夫的观点鼓动了这次造反。1382年，伦敦布莱克法列斯的神学家大会裁定，他的著作含有异端与错误。正当会议进行之中，地震摇晃了整幢房子，于是，威克里夫的支持者与诋毁者都声称，这表明神支持他们。威克里夫的敌人煽动国会通过谴责威克里夫教导的法案，这个法案甚至未经下院辩论就提交国王批准。

威克里夫在牛津的学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们中许多人被迫在公众面前认错。威克里夫本人恰好不在布莱克法列斯，逃过了这场厄运。1382年，他离开牛津，退休来到拉特沃思，尽管因中风造成不便，在那里他仍继续写作。1384年12

月28日，他在牧区教堂里聚会时，发生第二次中风，颓然倒在椅子上。四个人上前，抬起椅子，静静地出去，穿过教堂的边门去他的住所。这位老人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直到那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众天使的同在中向他的教主说话。

## 一本要烧掉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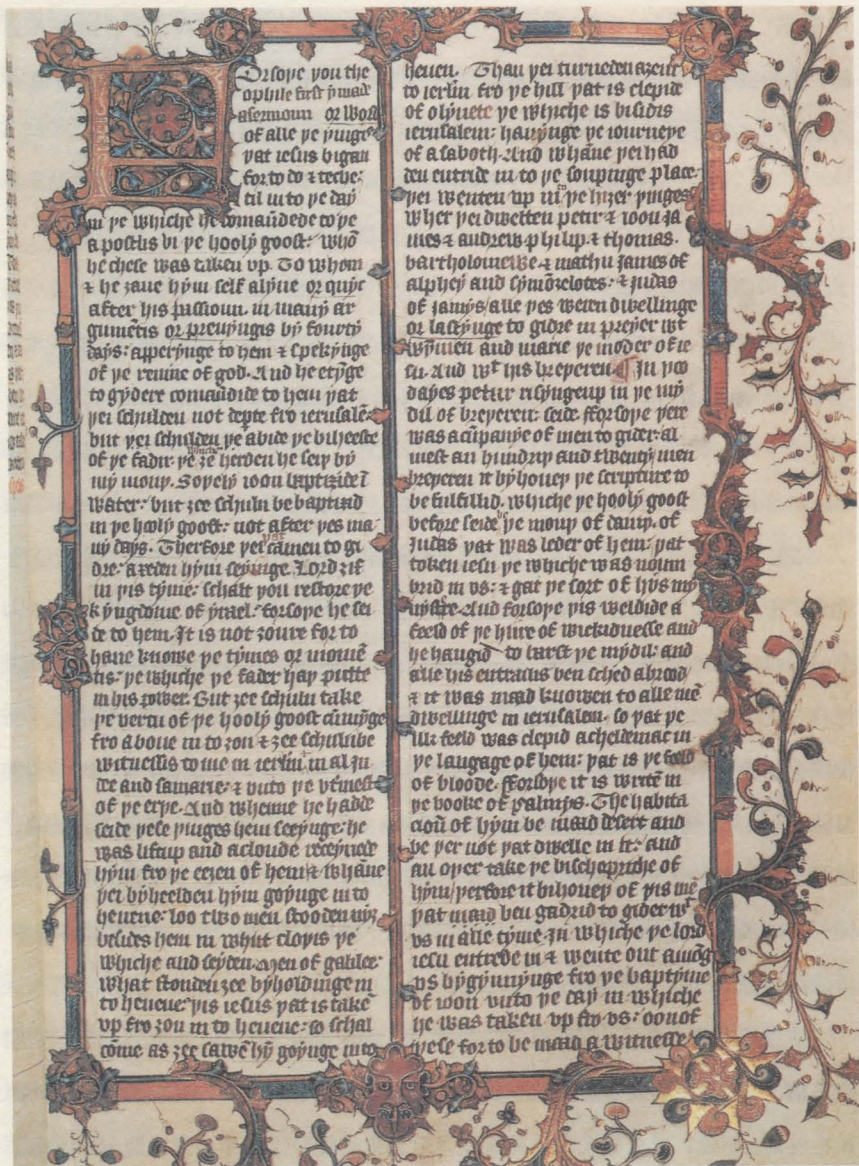
提供第一本完整的英语《圣经》的人，是威克里夫和他的追随者，当时还没有印刷机，重抄一本《圣经》要花十个月的时间，还要冒着遭受“火刑”的风险。

在威克里夫之前，其他人已经将《圣经》好几个部分翻译成了英语。我们已经看到“七个伟人”的工作（见上一章）。另外，公元1200年左右，奥古斯丁派的一个修士奥姆将部分的“福音书”作了韵律的意译。在他之后，肖罕姆的威廉，一位住在肯特郡的教士，于1320年翻译了《诗篇》。第三个翻译者是理查德·罗勒，一位来自约克郡的独居修道士，也在1340年翻译了《诗篇》，并增加了逐节的评注。但是，提供第一本完整的以英语写成的《圣经》的人，则是威克里夫和他的追随者。威克里夫执着地认为，《圣经》不需要特别的说明，即使平信徒（指没有圣职的信徒——译者注）也看得懂，但是，因为普通人不懂得拉丁语，所以《圣经》必须翻译成英语。

威克里夫的《圣经》不是原文的译文，这是因为两个理由：第一，以后能得到手稿，当时还没有发现原义的手稿；第二，当时在英格兰很少有人懂得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是，威克里夫和他的追随者是很优秀的拉丁语学者，他们《圣经》翻译的底本是公元405年哲罗姆的拉丁语《圣经》。由于教会已接受了次经的权威性，威克里夫的《圣经》也将它们包括在内。

尚不清楚威克里夫夫人是否也从事了一些翻译工作，但是，他肯定鼓励促进甚至可能指导过这项工作。完全有理由相信，《旧约》中一直到《巴录书》3章20节，是由尼古拉·赫里福德翻译的，或在他的指导下翻译的，尼古拉·赫里福德是威克里夫的一个学生与同工。在《巴录书》3章20节前后的译文风格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前一部分是学者风格，拘谨且过多地按字面翻译——它可能主要准备用作“对照本”，供那些在领会拉丁语《圣经》时需要帮助的神职人员之用——而其余的部分较为倾向于普通百姓的语言。我们知道，尼古拉·赫里福德曾被传唤，作为异端





在伦敦接受审讯，并被逐出教会。我们不能肯定，其余的翻译工作由谁负责，但是，按传统的说法，威克里夫从事了部分或全部的《新约》翻译工作。

直到威克里夫去世后12年，即公元1396年，才有英语的《圣经》，那是约翰·珀维所作的修订本。约翰·珀维是威克里夫这位宗教改革者在拉特沃思隐退时的亲密助手和秘书。珀维对原《旧约》译文的文字以及晦涩的文体作了修改，使它读起来要容易得多，并与《新约》的风格保持一致。被当作威克里夫《圣经》而流通的，正是珀维的修订本，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及其影响，都不会过分。

请记住，那时还没有印刷机。重抄一本《圣经》要花费十个月的时间，一个抄



本的成本在30英镑和40英镑之间。据说，当时两个便士可以买一只鸡，四个便士可以买一只一岁的小家畜。40英镑是9600便士——一笔很大的钱。福克斯提到一些人，他们为了得到读一天《新约》的权利，要付出一车干草。一些人为了购买一页《圣经》，就要省吃俭用一个月。不久，人们就不得不偷偷地抄写《圣经》并发行，因为1408年的阿伦德尔法令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书的形式或专著的形式，擅自将任何《圣经》文本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凡是在约翰·威克里夫生前、死后，或者今后所编辑整理的任何这类书籍或专著，不论是其全文还是部分，都不准公开或私下阅读，违者将受到比逐出教会更重的惩处。……即使是今后违反本条令的，也同样要作为异端与错误的支持者而受到惩处。”所讲的“惩处”包括火刑。然而，许多抄本还是出现了，甚至在今天还有200本这种《圣经》的手抄本。威克里夫在英格兰所开创的工作，是不可能阻止的。他释放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力量驱散了黑暗，解放了教会，改变了人类未来世代的社会境况。

## 罗拉德坑

在诺利奇，主教疯狂地逼迫罗拉德派，许多人被杀。公开处决犯人的地方被称为“罗拉德坑”，遍布整个英格兰。

在威克里夫去世的时候，他的追随者，也称为罗拉德派，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



兰贝思宫，坎特布雷夫主教在伦敦的住所。



的教会，以《圣经》为惟一准则，独立于罗马。他们主张信徒皆祭司，让主教不曾任命的人来管理圣餐。威克里夫派过着贫困生活，他们坚持不用拉丁语而用百姓的语言讲道，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们的观点家喻户晓，以至于威克里夫派言辞激烈的标语被张贴在圣保罗大教堂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墙上。1395年，一张宣言被钉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门上，要求国会“废除立誓不婚、圣餐变体论、为死人祷告、在偶像前献祭、神父听忏悔的告解礼、涂圣油的做法”等等。

当威克里夫的支持者将早期罗拉德派教导的《十二结论》钉在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门上时，约克郡的大主教阿伦德尔和伦敦的主教布雷布鲁克十分愤怒，气冲冲地去见当时正在爱尔兰的理查二世。那时，国王的妻子，波希米亚的安妮已经去世。没有她的良好影响，国王很容易被这些人左右摆弄。国王回到英格兰以后命令国会对此类问题不予考虑，并且威胁要惩罚坚持为威克里夫追随者辩护的任何人。此时，局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理查曾与他的堂兄亨利·博林布鲁克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并将他逐出英国。亨利·博林布鲁克正是威克里夫的保护人冈特的约翰的儿子。趁理查在爱尔兰的时候，博林布鲁克已经在约克郡登陆，召聚了一支反叛的军队。1399年，他废黜了理查，成了英国的新国王，亨利四世。

托马斯·阿伦德尔是当时坎特布雷的大主教，曾见过墙上威克里夫追随者所写的激烈标语，并且已抛弃理查，与亨利结盟。正是他，将王冠放在亨利的头上。他在加冕时对亨利说：“巩固王位，安抚神职人员，牺牲罗拉德派。”亨利回答说：“我将是教会的保护人。”两年以后，1409年，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De Haeretico Comburendo”，即烧死异端分子的法令。在它通过以后的八天之中，史密斯菲尔德的火焰在熊熊地燃烧，威廉·索特是第一个为威克里夫的教义殉道的人。他被定罪是因为他说，“我不敬拜基督在其上受难的十字架，我敬拜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他被拖到圣保罗教堂的园内，在那里按惯例剃去了他的头发。一顶平信徒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然后移交当局作“宽大处理”。

罗拉德派不仅在阿伦德尔法令中受到谴责，一座关押罗拉德派的监狱还建在了兰贝斯宫——坎特布雷大主教在伦敦的住所。这是一间12英尺见方的房间，七英尺高；房间至今仍然还在，有相隔几英尺的铁环固定在墙上。你还能看见囚犯铭刻在墙上的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耶稣是我所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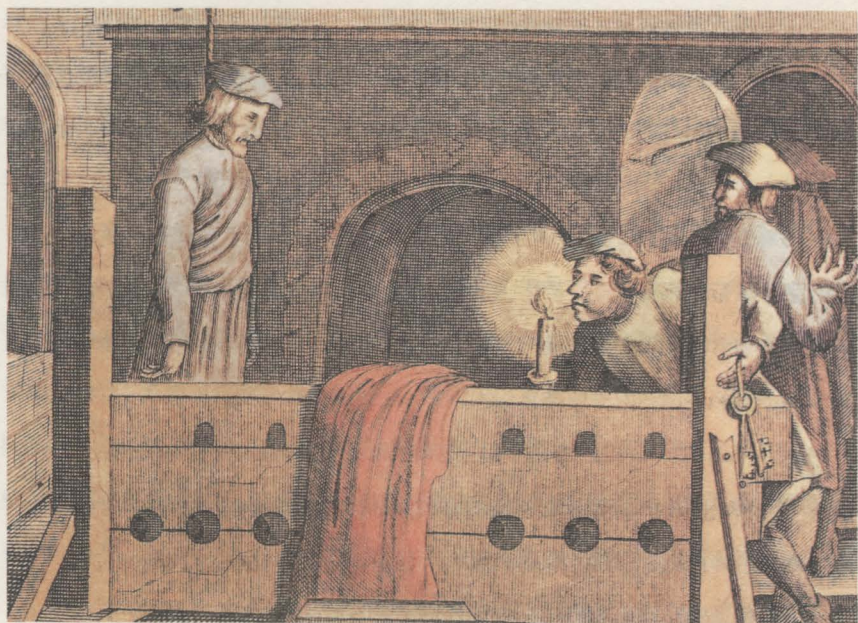
在诺利奇，主教疯狂地逼迫罗拉德派，许多人被杀。公开处决人的地方被称为罗拉德坑，遍布整个英格兰，见证了许许多多罗拉德人甘愿为他们的信仰而死。

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是这些为信仰而死者的典型。他通过他第三个妻子得

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考布罕姆勋爵），威克里夫派信徒，他为了他的信仰被烧死。







古代的版画，描绘在伦敦塔中的罗拉德塔杀害威克里夫派信徒理查·亨内。

到考布罕姆勋爵的头衔。后来他成为威克里夫神学的门徒，参与罗拉德派教士的讲道会，协助提供英文的宣传品给他们去分发。1413年9月23日，他被带到圣保罗教堂受审。当他被审问时，大声咆哮的教士们命令道：“你必须接受！”约翰爵士回答：“我愿意相信神要我相信的一切，但是我决不能相信——教皇有权柄作违背《圣经》的教导。”他因此被带回伦敦塔。两天以后，他受到教士、律修会修士、托钵会修士、赎罪券销售商最恶毒、最粗鲁语言的攻击，但是，他坚定不移。他告诉他们：“我不要求你们的赦免，我只需要神的赦免。”

他们给了他40天时间，让他在心灵上做好死的准备，希望他在死刑执行前公开认错，以此来削弱罗拉德运动。他却奇迹般地从塔中逃走，逃到了威尔斯，在那里领导了罗拉德人起义。三年后，1417年12月他再次被捕，坐在囚车上被拖到圣伊莱斯菲尔德，用铁链捆在烤肉叉上，放在文火上，像烤猪似的被慢慢地烤死。

威克里夫的追随者没有被逼迫所消灭。125年以后，威克里夫的追随者依然人数众多，十分活跃。当时宗教改革蓬勃开展，并弄得整个欧洲天翻地覆。

## 布拉格教士——胡斯

1415年7月6日，他被强迫戴上一顶圆锥形高帽子，帽子上写明他是异教徒，在城门口，被浸湿的绳子捆住，然后被烧死。





约翰·胡斯，捷克的宗教改革者，由武装的士兵护道。

在英国点燃的改革之火，也燃烧在波希米亚（今天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1360年，波希米亚国王邀请瓦尔德豪森的康拉德来讲道，抨击在教会中盛行的腐败堕落现象。这是一场民族改革运动的开始，后来这场运动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名叫约翰·胡斯的人身上。

胡斯生于1372年。他12岁上小学。五年以后，他考上了布拉格大学，以后作为学生与教授在那里度过了一生。1396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来应聘执教。他利用这个机会，攻读神学学士学位，并在1404年获得学位。当时，他已经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位杰出领袖。

1400年他被委任为教士，两年后，他又被授予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的教区长和讲道人这一重要职务。这座教堂是一位富商修建的，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每天有两场讲道。约翰·威克里夫的激进思想也传进了这个环境。

与威克里夫的联系是通过波希米亚公主安妮进行的，她1382年嫁给英国的理查二世。安妮在英国偶然读到威克里夫的著作，并且成为他的热情支持者。她不仅能左右国王，还带来一群在灵里对英国宫廷有很大影响的女侍从。同样因为这位波希米亚王后，使得几个学生能远从波希米亚来英格兰学习。其中一个学生回到布拉格，带回去几本颇具改革思想的威克里夫著作。安妮于1394年去世，她的女侍从们失去主人，返回波希米亚，她们的旅行袋里也带了威克里夫的著作。这些著作传遍整个波希米亚国家。

虽然胡斯不同意威克里夫在圣餐变体上的观点，但是他还是能接受威克里夫的某些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胡斯赞同威克里夫的观点，认为教皇与教士是多余的，这种观点是罗马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布拉格有许多拥有表决权的保守的德国人，由于他们的影响，大学在45个问题上谴责威克里夫，论战升级，甚至导致波希米亚王国面临分裂。国王不得不取消了德国人在大学里的表决权。于是，德国人收拾行李，离开布拉格，任凭胡斯在这个城市及大学中发挥其极大的影响。

罗马的教会狂怒了。1411年2月，大主教得到教皇的禁令，禁止在布拉格伯利恒教堂里的所有讲道。胡斯拒绝服从，他因此被逐出教会。大主教烧毁了200本威克里夫的著作，而胡斯则作出反应，公开为威克里夫辩护。为此，他得到命令，要他去罗马答辩。他再次拒绝服从教皇的命令。

1412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动了对那不勒斯国王的十字军征讨，作为给所有参战士兵支持的回报，他赦免他们全部的罪。胡斯对这种未经授权的属灵上的特许

感到无比愤慨，他更加公开地抨击出售赎罪券的全部想法。结果是整个布拉格城市都置于教皇的禁令之下，这意味着不可以进行任何宗教活动，甚至不可以进行施洗和葬礼。在这种压力下，胡斯离开布拉格，去南波希米亚，将时间投入两本重要书的写作，一本书是论述教会，另一本是论述教会中买卖职位的问题。

正当这个时候，三个互相竞争的教皇同时企图统治教会：罗马的格里高利十二世，珀皮南的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法国阿维尼翁的约翰二十三世。他们彼此互相谴责，互相诅咒，并最终导致教会的分裂。1414年—1418年，在瑞士的康士坦茨召开宗教会议，希望可以解决分裂的问题，重新统一教皇职位。皇帝西吉斯蒙德想同时解决胡斯/威克里夫的问题，邀请胡斯到康士坦茨，许诺不论争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都可以安全往来。胡斯犹豫再三，最终接受了皇帝的邀请。会议确实修复了教皇的分裂，却背信弃义地对待胡斯。

在他到达后的一个月以内，根据教皇的命令他被逮捕了，被投入监狱，当作异端，等候审判。当波希米亚人听到这一消息时，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教皇坚持逮捕胡斯是符合教会法规的，并认为欺骗异教徒是虔诚的行为。未经审讯，在监狱中受了八个月的折磨以后，胡斯从地牢中被带到康士坦茨的大教堂。1415年7月6日，他在公开的场合下蒙受羞辱，他教士衣服上的物件一件一件地被摘除，每摘除一件就伴随着一阵诅咒。然后，强迫他戴上一顶圆锥形高帽子，帽子上写的字表明他是异教徒。在城门口，他被浸湿的绳子捆住，然后被烧死。他的殉道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象征。

## 黑暗中的烛光

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希腊人纷纷逃往西欧，也带去了希腊语言和人文主义思想，研读希腊语《圣经》不再被人反对。

如果我们要在政治上划分出中世纪的年代，可以说它是始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的灭亡，止于1492年美洲的发现。从宗教上考虑，这一时期是从312年君士坦丁归向基督开始，一直到1516年伊拉兹马斯的希腊语《新约圣经》问世。从学者的观点来看，中世纪始于罗马帝国的灭亡，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1454年印刷机的出现后不久。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前期的“黑暗





弗兰切斯科·佩特拉奇，意大利诗人与人文主义者。

世纪”与后期学术上的复苏。这一学术观点上的革命性改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经院哲学

当罗马帝国所有的世俗学校被野蛮的游牧部落一扫而光时，惟一留下的文化设施就是教会。公元800年，查理曼当了皇帝，他为培训教士逐渐建立教会学校，为培训修道士建立修道院学校。他为自己的和贵族的孩子建立了宫廷学校，他也常常和他们一起学习。他下令极其仔细地抄写各种文稿，尤其是《圣经》文稿。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教会是教育的保卫者。知识开始增加，思想开始开放。虽然神学是学习的惟一学科，但方法却是哲学的。人们曾作出各种努力要使基督教教义具有科学性，并使理性与神学协调起来。因为教师都是学者，所以这场从11世纪到14世纪曾经兴旺的运动被称为经院哲学。其中一些讨论是无足轻重的、荒谬的。经院哲学受到了罗杰·培根的严厉批判。罗杰·培根约在威克里夫出生前30年去世。事实上，威克里夫被认为是最后一位经院哲学家。

## 人文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彼特拉克开始。他是与威克里夫同时代的一位意大利诗人。他研究艺术、社会学，尤其是文学，非常关注人类的成就。在他的影响下，经院哲学让位于人文主义，为“具有真情实感的”人的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些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价值与理性的思想，研究自由主义的学科，如历史、诗词、哲学、修辞学等。这一阶段在16世纪初达到其顶峰，产生了诸如约翰·科利特、托马斯·摩尔、伊拉斯谟等学者。

## 文艺复兴时期

第三阶段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开始。古城拜占庭由君士坦丁扩建并重新命名，于公元330年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政府所在地。它存在了1100多年，然后落在土耳其人的手中。土耳其人把它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希腊人逃离君士坦丁堡，来到西欧，带来了他们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和文化。东西方文化的混合在西欧带来了学术上的复兴，这种复兴影响了许多领域。在艺术方面，当拉斐尔或列奥纳多·达芬奇将颜料涂在画布上时，他们所表达的人文主义

思想，倾倒了整个欧洲。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对待绘画。画人物肖像，甚至是画裸体画时，都注重表现的精确性。同样，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也表明了对人体的兴趣。在建筑上，建筑师富有想象力与创造性，将新的概念引进了空间、装饰的艺术风格之中。东方的圆屋顶也开始见于许多西方的建筑中。

对各种艺术全新的鉴赏，也波及到音乐。音乐家与作曲家受到尊敬，成为重要的人，拥有自己的权利，创造性得到展现。音乐也世俗化了。作曲家变成了抒情诗人，牧歌也就诞生了。

在学术界，所谓的经典教育，又重新出现了。学者不但探索新的学科，而且也采用了新的工具，如古典希腊语。这导致了对希腊语和拉丁语作者的研究，需要收集、印刷、评注和翻译希腊与罗马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

对新观念的探索以及对希腊语知识的兴趣，导致了对《新约》原文的兴趣。研究希腊语《新约》，不再被人反对，因为它与学术的复兴连在一起。中世纪的黑暗里已经出现了黎明的曙光。

## 愚昧的终结

约翰·古腾堡生产出英语字母的钢制字模，威廉·卡克斯顿开办第一家印书馆。他们的成功激发了宗教改革者的想像力——印刷一本英语《圣经》。

### 约翰·古腾堡

大约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第一本印刷的《圣经》在准备出版之中。三年以后，即1456年8月15日，它问世了。它的印刷者约翰·古腾堡卓有远见，却属于那种在银行里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到银行去取钱时却不肯乘出租马车的人。

大约1398年，约翰生于德国的美因茨。他的父亲弗里莱聪·根斯弗利施是一个很富裕的绅士，是该城的主要官员之一。（古腾堡的名字取自他母亲的出生地。）我们不知他的父亲如何发迹。有些历史学家说，他父亲是细心抄写文稿的文士，正是这种单调乏味、令人厌倦的工作，促使他儿子发明了印刷机。毫无疑问，这位父亲失去了他的财富——约翰以后在经济上的困境证明了这一点——据推测，他在1428年工匠暴动时失去了家产。1434年，全家被迫离开美因茨，在以后的十年中







他们住在斯特拉斯堡。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因为美因茨镇的文书欠债不还，就要求市政当局将这个文书送入监狱。但是，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和议员否决了他的要求，他不得不撤回指控，从而失去了讨债的权利。

据说，约翰小时候在他父亲的工场里独自玩耍，将自己名字字母分别刻在各软木块上。他在父亲的桌子上把这些软木块排成一排时，写着字母“H”的那块落入紫色染料桶中。他很快捞起软木块，放在一张纸上晾干。那留在纸上的印记也同时留在了他的脑海中。这就成为活字印刷机构想的由来。如果这故事是真的，那么将这种构想变成现实花了40年左右的时间。

古腾堡最后生产了英语各字母的钢制印章或冲头，当这些印章或冲头冲压在一块诸如铜等较软的金属上时，就会形成一个字模，熔化的金属可以浇注其中，铸各种各样的铸件。但是，这一过程非常昂贵：不仅要制造活字和压模，还要生产特殊的印刷油墨。当时的纸张是用破布做的，也是很贵的。古腾堡想用纸张印刷200本《圣经》。每页排两栏，42行，每本《圣经》共有1282页。他也想生产30本犊皮纸的《圣经》，这种犊皮纸是用牛犊的皮制成的；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万头牛犊。所有这些都需要钱，而他就是没有钱，不得不去弄钱。

1450年，一位名叫约翰·福斯特的律师，贷款800荷兰盾给古腾堡，帮助古腾堡开展工作，除了要求这笔钱必须用于制造工具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保证。福斯特还每年提供300盾作为业务费，然而，这件事今天没有任何记载。1452年，福斯特不得不再提供800盾，以避免古腾堡的事业全面崩溃。1455年11月前不久，福斯特起诉古腾堡，并且显然赢得了诉讼，将所有的工具搬到自己在美因茨的家中。在那里，在彼得·舍费尔的帮助下，他们出版了各种书籍。在这场诉讼之前《圣经》是否已经印刷，现在无从知道。如果已经印刷，毫无疑问，销售《圣经》所得的钱全都归了福斯特。

1468年，约翰·古腾堡死在美因茨，一贫如洗，被人遗忘。他被埋葬在弗兰西斯卡教堂，后来，教堂被拆毁了，在上面修建了另一座教堂，而这座教堂现在也被拆毁了。要消除一个人留下的痕迹是多么容易，尽管这个人曾创造了一种机器，为中世纪脱离愚昧作出了如此多的贡献，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30多年后，他的发明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中被复制。到1500年，仅在威尼斯就有不下151个印书馆；在路德城的威顿堡镇一位名叫路夫的印书商印刷了十万本《圣经》。因为纸张中不含有木质纤维，书页到今天依然是白的，段落首字母上的烫金还没有失去光辉。



英国印书商威廉·卡克斯顿的印刷厂，他正在向参观者出示样张。



### 威廉·卡克斯顿

威廉·卡克斯顿是英格兰第一个出版商。他曾师从伦敦的市长大人罗伯特拉吉。罗伯特拉吉死后，他被派到布鲁日，在那里他负责英格兰—弗兰芒贸易的国外中心市场。后来，他成了勃艮第女公爵玛格丽特的商业顾问。1471年7月，他在科隆学会了印刷技术。当年，他回到英国，“以红尖桩为招牌”，在威斯敏斯特开了一家印书馆。他出版了约一百卷书，印刷了18,000多页，虽然他没有印刷《圣经》，他的印书馆却激发了英国宗教改革者的想象力。一个新的想法在他们心中油然而生：印刷一本英语的《圣经》。

### 伊拉斯谟和希腊语《圣经》

他收集了希腊语《新约》的全部文稿，共有672页。最初的两版印了3300册，这是第一次使原文的《新约》广泛地供人使用。

1466年或1467年，一个孩子来到世上，（像他的哥哥彼得一样）是一位修士的私生子。他的父母后来结婚了，父亲给这个男孩起名为赫拉斯谟。后来，赫拉斯谟决定采用希腊语的名字伊拉斯谟，在这前面是他的拉丁语名字德西德留斯，因为他出生在鹿特丹，他又加上鹿特达马斯。德西德留斯·伊拉斯谟·鹿特达马斯就是世界著名的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运动最敏锐的智者。



8岁时，他进了迪文特的圣勒布因教会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包括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以后在与路德派大辩论时成为教皇。

11岁时，他遭受极大的灾祸，先是他母亲，后是他父亲，都死于瘟疫。虽然他指定了救济监护人，但是其中一人很快死于同一场瘟疫。那时，无助的、未成年的孩子常常被修道士劫持，或被诱使参加各种宗教教派。他的哥哥彼得屈从了修道士的诱惑，但是伊拉斯谟拒绝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感到不能承受严峻的修道士生活。此外，他有崇尚自由的精神，他不想受世上任何人或任何势力的束缚。然而，他却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成为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寄宿生，作为期三个月的试验，这使他有进图书馆，并且无需禁食。

这三个月快结束时，他面临无家可归与身无分文的前景，伊拉斯谟别无选择，只得去当了一名见习修士。此后在1486年又很不情愿地成为一名奥古斯丁会的高级修士。1492年，他被任命为司铎，但是几年以后就离开修道院，当了坎布赖的枢机主教的拉丁文秘书，以此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乐章。

当老校长劝说主教让伊拉斯谟到巴黎大学学习时，伊拉斯谟展开了人生的第二乐章。他所写的诗已经在巴黎流传，他在那里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为了增加他的收入，他开始学习并讲授希腊语。他的一个学生威廉·布朗特，邀请他去英格兰，成为牛津大学的一名希腊语学生。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了理查·查诺克，一个小隐修院的院长。理查又带他去见约翰·科莱特博士，约翰当时正在大学里讲授《罗马书》。一天，科莱特带伊拉斯谟到伦敦市市长大人家中吃饭，在餐桌旁他与坐在他对面一个19岁的男孩争辩，男孩的名字是托马斯·摩尔。他们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摩尔带伊拉斯谟到王室儿童室去见九岁的男孩亨利，这个亨利就是以后的国王亨利八世。每次见面，主人们总是因伊拉斯谟敏锐的头脑与聪明才智而惊奇万分，赞叹不已。

伊拉斯谟的一个朋友帮助他实现他毕生的梦想——去意大利旅行。威尼斯之行是令人激动的经历。在罗马，他受到隆重的接待，十分荣幸地会晤了红衣主教，增进了他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之间已有的友谊。教皇邀请他留下来，撰写有关教皇军事行动的论文。但是，考虑到罗马是另一个诱惑人的囚笼：他在这个囚笼里最终将会像雄鹰被剪去双翼，他拒绝了邀请。在回英格兰的路上，他被授予都林大学的博士学位。

伊拉斯谟深得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他的著作。他15世纪90年代所写的早期

伊拉斯谟的雕像，藏于他出生地的博物馆。







鹿特丹伊拉斯谟的出生地，现在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的诗的地位，被他的《基督精兵手册》所取代。他在这本书中指出，教会中许多教义与礼仪是不恰当的。他的著作哺育了以后的改革运动。生于伊拉斯谟去世那年的威廉·廷德尔，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英语，并印刷发行。

伊拉斯谟于1505年回到英格兰，和托马斯·摩尔爵士住在一起。他写了著名的讽刺作品《愚人颂》，在这个作品中他描写国王、主教、王子、教皇都在受愚蠢的奴役。但是，他最伟大的成就是1516年出版的希腊语《新约》版本。为此，伊拉斯谟收集了整个《新约》的古代希腊语文稿，与拉丁语译本一起编纂印刷，共有672页。为了确保它被人接受，他将它奉献给教皇利奥十世。

这是第一次使原文的《新约》广泛地供人使用——在最初的两版中印了约3300本。其他的希腊语版本仅有约600本，笨重且价格昂贵。伊拉斯谟的版本成为许多欧洲国家本国语言《新约》译本的基础：茨温利和加尔文使用了它，给了他们的人民一本《圣经》。路德为德国，廷德尔为英国，都做了同样的事。1527年的第四版与1536年的第五版，被用于钦定本。伊拉斯谟从未想燃烧起如此的熊熊大火，但在当时他本应该知道自己不仅仅是玩火柴。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生了蛋，路德孵了蛋”。



伊拉斯谟（油画，霍尔贝恩画）



## 回 顾

看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足迹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可能是有益的。

我们已经看见，《新约》的著作是使徒或者认识使徒的人的著作。年轻的教会迅速成长，将这个世界弄了个天翻地覆。逼迫非但远没有消灭教会，反倒使信心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虽然教会常常因争论和异端而痛苦地遭受分裂，但是教义从这些内部的骚动中产生。

新的危险随君士坦丁出现了。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要更为详细地看到的，教会变成了世俗化的，追求物质享受，追求权力，道德败坏。传道人让位于教士，主的圣餐让位于祭台，使徒让位于教皇。逐出教会转变为处死。拉丁语《圣经》只有教士与修道士懂得，甚至只有很少人学习。由于没有《圣经》，离经叛道盛行却无从验证，而灌输给普通人的则是迷信与恐惧。

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中期，经院主义打开了争辩之门。14世纪，在西方已经听到了宗教改革的声音。自从国王的兄弟成了威克里夫的赞助人，所有要平息这位改革者声音的企图都被挫败了。

当人文主义的学识从君士坦丁堡传来时，学者们开始学习伊拉斯谟的希腊语《圣经》。随着印刷技术的发明，各种新的和煽动性的思潮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把人们与《圣经》隔离开的墙，终于开始倒塌了。







## 第四章 宗教改革来到英国

### 概 述

这一部分可以加一个副标题：“地震及其余震”。夸大宗教改革对欧洲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场改革净化了受污染的教会，转变了人们的道德观，重新确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将这本名为《圣经》的书放在冲突舞台的中心。然而，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大陆上的剧变呢？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在欧洲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他并没有使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抵制罗马的统治。虽然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各自仍属独立的运动，彼此都不是对方的起因。各国同时提出改革要求，共同原因就是教会的堕落、道德败坏和衰落。

### 道德状况

从公元12世纪初的圣伯纳德起，到公元1516年建立了牛津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的福克斯主教为止，每个世代都可以听到教会领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从1215年到1512年，召开过九次大的普世教会会议，每次会议都试图讨论教会改革问题。1545年召开特伦特会议时，会议确认了前几次会议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教会中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问题。1397年，在赫里福德主教教区的281个堂区之中，主教就知道有52个司铎和情妇姘居。1450年，圣亚萨的主教向他的教士出售收纳情妇的许可证来获得大笔收入。这种道德上的败坏是使教会遭受灾难和痛苦的根源，也引起人们的不满。

### 教 义

对于高层神职人员道德败坏，教会视而不见，有些人提出应当改革教义。历史

记载，反对教士的运动开始于12世纪初，这个运动以《圣经》的权威为依据，导致产生了韦尔多派。韦尔多派认为他们自己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反对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区分开来。虽然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来镇压他们，但是1200年在法国南部这些持不同观点的信徒在人数上超过了天主教徒。由英诺森三世主持的宗教法庭虽然残忍，仍未能消灭这一教派。

## 政治

公元1054年，由于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在教会领导权上意见不合，教会分裂了。即使在西方，“一个皇帝和一个教会”这一中世纪思想，也受到反教士群体的挑战，但是西方教会以铁腕维护它的权力。人们或是一出生就进教会，或是很小就受洗，任何离开教会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犯罪，应当被烧死。教会机构由强制性的“什一税”和其他税款来支持；而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教皇的权力大于国家的世俗权力。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公元1028-1085年）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声称教皇拥有“捆绑和释放”的权力，世上所有的君主都要屈从于教皇。

公元1309年，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罗马教廷迁至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直到1377年都在那里。那时，法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教皇发现他们自己屈从于法国的君主。而欧洲诸王则操纵教皇来获得权力，后来教皇玩弄意大利的政治权术。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对抗。

## 经济

教会的财产是巨大的。据估计，全部地产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属于教会的。此外，教会声称他们的财产是免税的，这一直是倾轧的根源。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没有缓和这种局面。14世纪初他宣称，教皇可以任命任何人担任教会的任何职务。我们知道，这导致了罗马教廷中圣职的完全买卖，加剧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不和。当教皇需要更多的钱时，他就出售赎罪券。绝对的权力，已经彻底地腐败了。

尽管如此，上述的种种问题引发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导致宗教改革者采取行动的惟一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来自《圣经》的教导。正是马丁·路德关于《罗马书》的教导，正是他关于因信称义的坚定信念，导致他和罗马教廷的决裂。当茨温利被坚持独身的做法、教皇全然不顾人的生活所困扰时，正是



对《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研究开了茨温利的眼睛，认清了他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严重分歧所在。同样，加尔文也受到《圣经》教导的鼓励和鞭策。在荷兰，1477年用本国语言对《旧约》作了整理，并在1526年又根据路德的德语译本翻译了整部《圣经》，正是这些为确定宗教改革的原则奠定了基础。瑞典的宗教改革可以追溯到一个路德派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是由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带到这个国家的。上述事例说明：挣脱枷锁并向传统提出挑战的，正是在教会讲坛上被传讲的、由基督徒传递的、正在传播之中的《圣经》内容。

## 远方的雷声

正如远方的雷声宣告风暴正在临近，在德国因不满属灵状况而发出的呼声，预告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革命的到来。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出生在艾斯勒本的一个村庄。他七岁时被送到一所拉丁语学校，毕业于拉丁语语法专业。他14岁时被送到马格德堡，他的老师都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四年以后，即1501年，

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他进入埃尔福特大学，四年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又过了两年，他22岁时，获得了硕士学位。

## 单凭信心

有一天，狂风暴雨大作，闪电击中森林中的一棵大树时，他正在这棵大树底下避雨。这次死里逃生使他震惊，他从灵里苏醒过来。1505年7月，他刚22岁，就进了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隐修院，一年以后他发愿做了修道士，愿“绝意、绝财、绝色”。1511年，他转入维登堡隐修院，第二年在那里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圣经》文学的教授。

1517年，约翰·台彻尔为了重建罗马圣彼得教堂筹集资金，在维登堡出售教皇赎罪券，从而成为公众所厌恶的人。赎罪券是书面的应许，保证减少炼狱的时间，作为对购买者的回报。换句话说，它们是有价的赎罪形式。路德对这种做法十分愤恨，公开驳斥提倡这种做法的人。当时，他正在讲授《罗马书》。当他讲到保罗在《罗马书》1章17节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突然明白保罗关于称义的教义，他的整个神学观点被动摇了。他那时明白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可以藉着“信”，使神的义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这一认识使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 《九十五条论纲》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路德写出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出售赎罪券，以及教会中其他许多弊端，并于1517年将《论纲》钉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这一举动使得他在反对罗马天主教上不可能有任何的退路，从而打开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闸门。

1518年当局发出了逮捕路德的命令，但是命令没有被执行。1520年6月，教皇利奥十世发布通谕，要路德撤回他的观点，否则要将他逐出教会。

## 沃尔姆斯会议

1521年4月，路德被召来参加沃尔姆斯会议，在那里他受到指控，说他违背了41条教义，限他60天内撤回他的观点。据说，就是在这里，马丁·路德曾作出了他不朽的声明：“我站立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我的良心只降服于神的话。”





腓力·梅兰希顿，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的战友。

1521年12月10日，路德公开焚烧教皇的通谕，同年秋天他又拿起笔，如同挥舞一把利剑，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首先，他写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号召成立一个自由的宗教议会来进行宗教改革，并向各地的基督徒行政官员呼吁，关心教会是他们的职责。两个月以后，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一文中，他对七件圣礼的神学理念提出异议，认为除洗礼和圣餐礼之外，其他都应被否定。一个月以后，他写了专著《论基督徒的自由》。

路德显然需要公众的支持，无论是教会里的还是社会上的。他的写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又有几篇文章相继问世，其中包括他最伟大的神学专著《意志的束缚》，写于1525年，是为回答伟大的伊拉斯谟对他的神学的指责而作的。

1525年，他42岁。这一年是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就在这一年，德国农民起来造反，声称他们获取更大权力的要求得到了福音的支持。路德以为这是对福音真道的背叛，感到非常愤怒。他担心出现无政府状态，又害怕如果改革运动和农民起义有牵连，就会使改革运动蒙上坏名声，于是针对起义写了言辞激烈的谴责文章，题为《反对杀人越货的暴徒》。1525年也是他和凯瑟琳·冯·波拉结婚的一年。他们的婚姻非常美满，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 奥格斯堡会议

1530年查理五世皇帝召开了奥格斯堡会议，会上信奉“因信称义”的新教领袖们可以概括地论述他们的信仰。而路德是一个“不法之徒”，所以不能出席，由腓力·梅兰希顿作为他的代表。在和路德商谈以后，梅兰希顿草拟了一份信仰告白，信仰告白虽然没有被会议接受，但是直到今日仍然是路德派的纲要。

## 普通人的《圣经》

反叛者企图改变过去，而改革者却想改变未来，每一个宗教改革者都知道，除非他为未来提供一本本国语言的《圣经》，否则就不能影响后人。1522年9月，路德的德语《新约》出版了。对路德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年。

1521年5月4日，当路德从沃尔姆斯会议返回时，他在图林根森林被一帮强盗绑架，作为人质被带到瓦尔特堡城堡。到城堡里，他才发现，绑架他的人原来是他的朋友，他们这么做是根据路德的世俗保护人——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命

令。即使对生活在城堡里的人，路德的身份也是保密的，人们只知道他是“乔治骑士”。他根据伊拉斯谟的第二版《新约》（1519年），翻译德语《新约》。按照路德的安排，《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启示录》等均未列入正典，放在该版本的最后。

《新约》出版以后，路德开始翻译希伯来语《旧约》，十年以后方才完成。在路德《圣经》译完后的最初14年中，路德《圣经》包括某些经卷共发行了377版。他不但教导了欧洲如何抵制教皇和皇帝的错误，而且为德国提供了自己语言的《圣经》，从而使这种抵制得以持久。

路德有许多有影响的支持者，再加上他在神学辩论中无懈可击的能力，使他得以从国家或教会掌控中逃脱拷打和死亡。1546年2月18日他在艾斯勒本村寿终正寝：他从这个德国小村庄的一端来到这个世界，又从村庄的另一端离开这个世界。

## 苏黎世的茨温利

1531年10月的一天，茨温利在一场战斗中负重伤，敌方一个士兵发现垂死的他，问他是否需要教士。他没有回答。一名上尉拔出剑，刺死了这位改革者。

瑞士有两种语言：瑞士的北部是说德语的，而南部是说法语的。德语地区的主要城市是古老的中世纪城市苏黎世，该地区是瑞士宗教改革先驱乌尔利希·茨温利的活动中心，茨温利有时被称为“宗教改革的第三位人物”。他生于1484年1月1日，比马丁·路德小52天。另一位伟大的改革者约翰·加尔文在瑞士开始事奉的前五年，茨温利去世。

虽然茨温利祖上是农民，但他的伯父是威尔德豪斯教区的教士，他的父亲是威尔德豪斯的市长。乌尔利希先后在威森、巴塞尔、伯尔尼的好学校里接受教育。16岁时，他去了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后又回到巴塞尔大学，并在那里毕业。以后，他在巴塞尔的圣马丁教会学校教古典文学。

22岁时，他被康士坦茨的主教委任为教士，在格拉鲁斯教区做了十年教士。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受到两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前者教他批评天主教教会的教义；后者是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谟，激发起茨温利对希



乌尔利希·茨温利，苏黎士的宗教改革者，在战斗中被杀。



希腊《新约》特别的兴趣。到1518年他奉召为苏黎世大教堂的教士之时，他已归向基督，并已在传讲福音。

在茨温利到达苏黎世后不久，一场瘟疫席卷这个城市。瘟疫期间他对人们崇高的服事，深深赢得人们的信任。这场瘟疫夺走了城市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他自己也与死亡擦肩而过，这场灾难震惊了茨温利，使他更加专一地献身于福音的事工。

## 改革

1519年1月1日，茨温利开始了关于《马太福音》的系列讲道，接着讲了《使徒行传》，最后是关于“保罗书信”的系列讲道。这些讲道撒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并给他勇气继续讲道，反对禁食、圣物崇拜以及教士守独身。1522年—1526年，他

进行了许多改革，包括通过教会会议进行治理，禁止赎罪券，清除偶像，成立神职人员的学习小组，以及《圣经》翻译。所有这些激怒了罗马的教会，教皇阿德里安六世怂恿苏黎世的市民起来反对茨温利。

茨温利对于人类生命在教皇所鼓动的战争中遭到无端的毁灭，感到十分震惊。在他的教区中，那些在战乱中丧失亲人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使他深感不安。他看见死亡在他的教区中留下了许多孤儿寡母。他曾作为随军牧师，三次访问意大利，这使他看清了教皇统治的属世本质。

当茨温利请求主教允许他和安娜·赖恩哈特结婚时，苏黎世和罗马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深。安娜是一个寡妇，她原来的丈夫是一个士兵，1517年阵亡，留下三个孩子。主教拒绝了他的请求。1522年他们秘密结婚，直到1524年才公开此事。他们后来有了四个孩子。

## 公开的辩论

罗马当局企图把茨温利和苏黎世的市民隔离开来，他要求等事情公开辩论之后再作决定。第一次辩论是在1523年，出席的有市长和市议会。结果，他们判决茨温利可以继续传讲福音。同年12月26日到28日，举行了第二次辩论，尽管他受到来自瑞士其他州的、得到教皇支持的天主教代表们的反对，但他成功地向市议会和大教堂所能容纳的900个市民发表演讲，题目是“真正的牧师是牧人”，他讲到了“启示”、“和好”、“革命”。人们称赞他是永不言败的、“苏黎世的赫拉克勒斯”。

## 路德和茨温利

黑森的大公腓力想巩固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为此有必要在两个伟人——路德和茨温利之间开一个协调会。会议安排在1529年10月的三天里，地点在马尔堡。在《马尔堡信条》中，有14条教义是两人都同意的。但是，著名的第15条教义，即关于主的晚餐的教义，成了他们之间的障碍。茨温利不能接受路德圣体同质的教义，根据这一教义，尽管饼和葡萄酒没有变，但基督确实就在饼和葡萄酒之中。茨温利认为，因为基督的身体已升到天上，就不可能存在于主的晚餐的饼中。茨温利代表了以后传统新教团体所采取的立场，并在这一问题上和路德神学学说分道扬镳。



路德与茨温利在马尔堡辩论，他们在有关主的晚餐的神学上不能达成一致。



### “苏黎世《圣经》”与茨温利之死

公开辩论的最重要结果可能是确立了《圣经》作为所有争辩的惟一和终极的权威。这导致了德文版《圣经》于1529年出版，是茨温利及其助手布林格领导的教士学者团体翻译的，它被称为“苏黎世《圣经》”，是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瑞士德语的译本。这本《圣经》的问世比路德完成他的德语《圣经》早五年。

不幸的是，1531年10月，茨温利在第二次卡培尔战争的一场战斗中受重伤。敌方的一个士兵发现垂死的他，问他是否需要教士。他没有回答。第二次问他时，他还是不作回答，只是双手握在一起，睁大眼睛祷告。一名愤怒的上尉拔出剑，刺死了这位改革者。

一群野蛮的年轻人发现是茨温利，就建议将他的身体切成五块，给五个州的每一个州送一块去。他们设立了一个不义的法庭，法庭裁决将他的身体切成四块并焚





烧。前一天晚上那里刚宰杀过猪，有人将猪的内脏扔进同一堆火里。为了表示对茨温利的轻蔑，刽子手将余烬翻过来，把猪下水和茨温利的骨灰混和在一起。

## 日内瓦强人

为了强制推行改革主张，1542年—1546年间，加尔文下令驱逐76人，处决58人，其中34人是妇女。这些人涉嫌用巫术散布瘟疫而被烧死。

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于1909年开始动工，但是直到1917年才竣工。它由十座雕像组成，最中间的四座是四位宗教改革者。为什么路德和茨温利不在这中心雕



约翰·加尔文，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者，改革后传统的缔造者。



像群之中呢？这是因为诞生在日内瓦的不是路德派，而是长老会。因此，约翰·加尔文，作为牧师会议治理教会制度或长老会的先驱，成为四人中的一人。紧挨他右边的，是纪尧姆·法勒尔，一个比他年长20岁的人，他比加尔文早一年来到日内瓦，为把改革的神学带到日内瓦起了促进作用。从1536年起，他和加尔文一起在日内瓦工作，直到1538年他们二人同被驱逐。

紧挨加尔文左边的是西奥多·贝察，比加尔文年轻十岁，是一位在某些方面超过加尔文的神学家。他是加尔文在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代表。他写了加尔文传，成了加尔文的以利沙（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先知，先知以利亚的继承人。——译者注），加尔文死后贝察作了日内瓦的政府首脑。在加尔文左边较远的是苏格兰大名鼎鼎的约翰·诺克斯，他声称在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中代表加尔文。J·I·培克把加尔文描述成“一个灰黄色皮肤、性格严厉、黑头发、体形瘦弱的法国人，有着一双闪闪发



光的褐色的大眼睛，喜欢凝神沉思……当他年迈体衰时，背脊弯曲，面容憔悴，身体消瘦”。

1509年6月10日，加尔文出生在法国的努瓦营。1521年，父亲送他进入巴黎大学，为获得教士身份作准备。正是这所大学，曾培育了伊拉斯谟，之后又接纳了耶稣会的缔造者伊格纳修·罗耀拉。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属下，新教改革最强大的反对者。

加尔文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后，父亲又送他去奥尔良，在那里他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就在他后一次学生岁月中，他归向了基督，成为新教改革的支持者。他一回到努瓦营，就被当作异教徒投入狱中，但他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最终回到巴黎。他为新教所作的有力的见证使他遭受了疾风暴雨似的迫害。1535年1月29日这个城市发生了献“洁净”礼的惨重事件，六个新教徒被拷打并用火烧死。加尔文看到政府的逼迫将要在整个法国继续下去时，就逃到巴塞尔，在那里安顿下来。1536年3月，当时他只有27岁，他的《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一书出版了。他断定自己不可能在法国为福音工作效力，就决定到德国去工作，但是由于当地有战事，中途不得不绕道经过日内瓦。纪尧姆·法勒尔劝阻了他，让他留在日内瓦，他们在共同的事奉中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1538年5月26日，法勒尔和加尔文被驱逐离开日内瓦，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加尔文和法勒尔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神权政治，宣称市镇的行政官员是教会的仆人。他们编写了一本对所有市民有约束力的《教理问答》，要求公众或者接受，或者被驱逐，但遭到伯尼尔人反对，且反对日渐增长，这两个改革者为了安全被迫逃离。

新的市政府软弱无能，加尔文的支持者们没把它放在眼里。人们强烈要求加尔文返回日内瓦，重建市政和教会的秩序。罗马天主教的主教试图控制局面，但是失败了。1541年9月13日，他在一片喧嚣的欢呼声中回来了，恢复他的神权政治，实行铁腕统治。

加尔文颁布了《日内瓦神权政治》，为了推行改革主张，强迫人们顺从其中的规定，推行奖励告密者制度来防止人们暗中违犯。1542年—1546年间，大约76人被驱逐，58人被处决，其中34人是妇女，她们因为涉嫌用巫术散布瘟疫而被烧死。1553年，迈克尔·塞尔维特因为在“三位一体”上的异端观点而被烧死。

从1549年开始，日内瓦成了来自英格兰、苏格兰、法国的6000名新教徒难民的避难所。约翰·诺克斯将日内瓦称为“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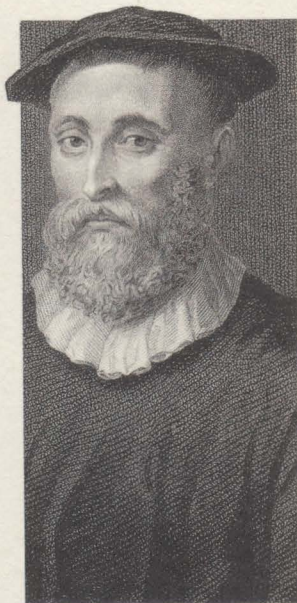


尽管他可能也有软弱,但基督教世界还是对这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者怀着深深的谢意。他的《基本原则》经过修改,篇幅增大到原来的三倍,是惟一的神学手册,是第一本有这样长的篇幅、合乎《圣经》、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他的宗教改革者也写了教义,并列理由证明,但是在深度上都不及加尔文。第二,他建造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成了当时惟一一所培训宗教改革的牧师学校,并使得日内瓦也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都。最后,他支持被称为“1560年日内瓦《圣经》”的翻译工作。

1564年2月16日,加尔文作了最后一次讲道;4月20日,他立下遗嘱;5月2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法勒尔;5月27日,他在一位忠实朋友的怀中进入了永恒。第二天他们把他埋葬了,今天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坟墓。

加尔文事奉的时间神安排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路德迈开了宗教改革的第一步,那么加尔文走的是第二步。如果日内瓦不是作为避难所,并给逃到这里的被放逐者提供培训,英国的宗教改革在16世纪末之前就会消亡。他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诸如约翰·弥尔顿等伟大的诗人,诸如威廉·威尔伯福斯等伟大的改革者,诸如威廉·凯里等伟大的宣教士,诸如乔治·怀特菲尔特和查理·哈登·斯珀吉昂等伟大的布道者,都坦然认同这位改革者。

约翰·诺克斯 (1514-1572),  
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者。



## 给我苏格兰

1560年,诺克斯制定了一个新教的信仰告白,成为以后两个世纪苏格兰惟一的宗教信条,为宗教改革成功奠定基础。

约翰·诺克斯是个矮小结实的人;他有一张强有力的脸,浓密的眉毛下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颊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后来变成灰色。他大约出生在1514年。他的父亲威廉·诺克斯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将他送到大学,在约翰·梅厄的指导下学习。他被任命为教士,并在安德鲁斯的大主教之做“一名神圣祭坛的侍者”,这一点他的署名就能够证明。

在以后的三年中有一段时间,他受改革者乔治·威夏特的影响。当威夏特于1546年12月因异端被逮捕时,诺克斯就属于企图保卫他的人之一。但是,威夏特还是被送到爱丁堡的城堡中,第二个月在安德鲁斯被公开烧死。当时,苏格兰正值多事之秋。在玛丽女王还是婴孩的时候,苏格兰由议会和法国出生的太后统治。诺





克斯辗转各地，逃避迫害。后来安德鲁斯的民众起义，杀死大主教，占据城堡，诺克斯立刻返回并做他们的传道者。1547年的夏天，法国人攻占了城堡，诺克斯被俘，作为战舰上的奴隶度过了19个星期。

在英格兰的新教国王爱德华六世的干预下，诺克斯获得了自由，成为英格兰特许的传道者。1552年，他被任命为王室牧师，但是在爱德华去世并由罗马天主教的玛丽继承王位之后，诺克斯又逃亡到欧洲大陆。他先是想居住在法兰克福，但遭驱逐。后来，他去了日内瓦，在那里从事“日内瓦《圣经》”的翻译工作。1555年他将妻子和母亲从英格兰接来，平平安安地过了几年，潜心学习约翰·加尔文的教导。

1555年8月，诺克斯得到应许，准许他秘密布道六个月，于是就返回南苏格兰。他的国家由太后（苏格兰詹姆士五世的遗孀）统治着，而她的女儿，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正在法国朝廷中接受教导。诺克斯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遵照他的教导，停止参加弥撒。当局因此谴责他，反对者烧掉他的模拟像。

他不得不再次返回欧洲大陆，临行时留下了《一封有益的忠告信》，给苏格兰各家庭的户主。他提醒说，他们是自己家庭中的“主教和国王”。这封信为苏格兰未来的宗教改革播下了种子。1558年，他给贵族写了另一封公开信《称呼》，在信中他反对曾对他所作的死刑宣判。第二年诺克斯又回到苏格兰的中部地区，希望激起人们对他的支持。他非常猛烈地抨击了托体修会的修士，以致狂热的支持者洗劫了佩思的所有修士。

爱丁堡圣·伊莱斯大教堂，约翰·诺克斯在这里的讲坛上作了热烈的讲道。





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宗教改革运动很快扩大到整个苏格兰，太后在爱丁堡被苏格兰新教徒囚禁，她呼吁法国人来解救她。诺克斯试图通过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结盟来对抗这一解救行动。伊丽莎白的地位也同样受到法国人的威胁。不幸的是，诺克斯此前刚刚发表了《怪异的妇人统治》，哀叹在妇人统治之下的苏格兰政府的可悲状况。伊丽莎白十分反感，于是推迟了结盟。就在那个晚上，法国人登陆把支持新教的政府军赶出了爱丁堡。苏格兰士兵败退到斯特林，毫无斗志，但是诺克斯用他的讲道再一次唤起了他们的勇气，这时伊丽莎白女王派英格兰的部队及时赶来支援他们，迫使法国人撤离苏格兰。

就在这一年诺克斯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她未能亲眼看到反对法国人的胜利就去世了。诺克斯又娶了一个17岁的女孩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新的苏格兰立法机构于1560年秋天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有一个新教的信仰告白。诺克斯等人制订了这个信仰告白，它成了以后两个世纪中苏格兰惟一的宗教信条，并成为三个法令的基础：第一是废除教皇在苏格兰的权柄，第二是废除所有具有天主教教义的旧雕像，第三是宣布弥撒的庆典为不合法，违反法令者可以处以死刑。至此，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已经完成。

当1561年太后死于爱丁堡城堡时，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回来统治苏格兰，向诺克斯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自己的宫殿里秘密地参加弥撒，而公众舆论也反对诺克斯在这件事上采取任何措施。在玛丽和诺克斯之间有四次对话。但是，两人都非常坚决，毫不妥协，他们运用自己的才智，彼此攻击。当玛丽和天主教教徒达恩利（1545—156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二个丈夫，英王詹姆斯一世之父，婚后一年半即被谋杀。——译者注]结婚时，新教徒的领袖们逃亡在外，担心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失败，但是诺克斯继续在爱丁堡的圣伊莱斯教堂讲道。当达恩利同意出席圣伊莱斯教堂的礼拜时，诺克斯讲了一篇关于亚哈王和耶洗别的道，猛烈抨击“小孩和妇人”的统治。玛丽非常愤怒，她说服许多领主发布了一项法令：她在爱丁堡期间禁止诺克斯讲道。1566年，诺克斯被迫躲藏起来，保持沉默，直到1567年女王因涉嫌谋杀达恩利，被囚禁在利文湖的城堡里，诺克斯才回到爱丁堡，重新进行宗教改革。玛丽退位，她的孩子，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加冕成了婴儿国王。

1570年诺克斯中风，退休来到圣安德烈，在那里写了遗嘱，出版了他最后的一本书。他在那本书中写道：“正如世界已经对我厌倦了一样，我对世界也厌倦了。”

1572年秋天，他回到爱丁堡，和他的妻子及他们的三个女儿一起住在圣伊莱斯对面的一幢古雅而别致的房子里。他死于1572年11月24日。

## 冬天来了……

罗马教会在英格兰滥用权力，梵蒂冈拿走的钱比国王拿走的多五倍，修道士们在英格兰供养十万个懒散的娼妓，教会在耗尽英格兰的资产……

参加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就是参加一场极大的灵与魂的冒险。15世纪是热血沸腾和革命的年代。它也是地理学上的新纪元。1492年，41岁的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重新发现了美洲。1497年，瓦斯科·德·伽马从葡萄牙起航，开辟了到达印度的海上通道，饱经风雨的船舶停靠过世界各地的码头，晒得黝黑的水手们将遥远地方的奇特见闻和新的习俗带回欧洲。

这也是天文学上的新纪元。151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开始重画天体图。他的发现推翻了以前关于地球和其他行星关系的所有概念。

这也是其他学科革新的年代。我们知道，154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手中，大批希腊人逃到西罗马帝国。他们渗透到西欧所有主要的领域。他们带来了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化，唤起了人们对艺术的兴趣，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引进了新概念。列奥纳多·达·芬奇、贝尔尼尼、米开朗琪罗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最后，这也是神学的新纪元。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和德国、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译者注）、瑞士、苏格兰等地的宗教改革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改革得到不屈不挠的领袖们强有力的领导。英格兰没有这样的领袖。然而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

要了解促进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政治气候，看看下面两件事，是有帮助的。

第一件事是亨利八世所面临的婚姻难题。亨利七世在位的时候，他的长子阿瑟在与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尔之女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六个月后，于1502年去世。这个婚姻是政治联盟的一部分，政治家们所关注的是，联盟不应因阿瑟的突然死亡而破裂。所以他们筹划将阿瑟的弟弟小亨利和凯瑟琳结合。当亨利七世于1509年去世时，小亨利才18岁，就成了亨利八世国王。亨利加冕后不久和凯瑟琳





结婚。凯瑟琳比亨利大6岁，由于对《旧约》律法中有关娶兄弟之妻一事的解释所产生的麻烦（见《利未记》20章21节），这桩婚姻需要教皇的特许。考虑到英格兰和西班牙的重要性，教皇很快给予神圣的准许。

凯瑟琳和亨利有过七个孩子。其中三个一出生就夭折了，只有一个女孩活了下来，她就是以后的“血腥的玛丽”。亨利有一个情妇，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使亨利开始猜疑，凯瑟琳不能给他生一个男继承人，是不是神对她的惩罚？他请求教皇废除他和凯瑟琳的婚姻，准许他娶安妮·博林为妻。但是，教皇曾代表神准许了这桩婚姻，现在就不能容忍这桩婚姻的解除。

宗教改革者充分利用了亨利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使英格兰君王摆脱对梵蒂冈教皇的依赖。托马斯·克兰麦第一个向国王提出：重要的是应该知道《圣经》是怎样教导的，并建议，也许议会或各大学的教职人员比梵蒂冈更加适合来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国王抓住机会，请求他们裁决，并让克兰麦成为下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第二个政治因素是，罗马教会在英格兰滥用权力。1506年，梵蒂冈大教堂奠基，这就需要更多的钱。英格兰的教会已经在耗尽国家的资产：据估计梵蒂冈拿走的钱比国王拿走的多五倍。这被人看作是教会道德的沦丧，特别令人反感。1529年，西门·菲什出版了《为乞丐祈求》，并将它呈交给国王。他提醒国王，这些“圣洁的人”是如此不道德，以至于影响“每一个人的妻子、女儿……女仆”。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而且非常猖獗，蔓延到全国。他写道：“他们（这些修道士）在英格兰供养十万个懒散的娼妓。”

正如一首诗所写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没有当时的这种背景，宗教改革要在英格兰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 臭名昭著的主教

他要仆人们跪着侍候他，要主教们给他系鞋带，洗手的时候要公爵们给他端着脸盆。他住在豪华无比的汉普顿宫，权力几乎大得无边……

英格兰反对宗教改革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来自宗教方面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听命于罗马的教会，来自哲学方面的是学者中的新人文主义运动。



宗教方面的反对力量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这两种神学在每个方面都是针锋相对的。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的最后一位首席主教,托马斯·沃尔西,代表了罗马教廷的意旨。他父亲是伊普斯威奇一家小旅馆老板兼富有的屠夫。1490年,他只有15岁时,就毕业于牛津的玛格达琳学院。九年后,他被授以教士之职。沃尔西具有极大的管理恩赐,表现出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才能。他很快就掌权得势,成为亨利七世王宫教堂的司铎,并受命从事外交工作。当亨利七世去世时,沃尔西立刻成为亨利八世的王室官员。他大大影响了这位年轻的国王。他陪同亨利游戏,建议国王应当纵情享乐人生,政府的那些令人厌烦的管理工作应该留给别人去做。1511年,他成为国王私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从而保证了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1514年,教皇利奥十世任命他为约克郡的大主教,这是英格兰教会中的第二高位。



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他的去世除掉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一大障碍。

他献身于罗马天主教，致力于发展英格兰的教会。他被公认是扑灭异教的十字军运动的领袖，并且把英格兰推入一个恐怖时期，在这期间许多敬虔的人遭受没收财产和监禁之苦，有些人还被活活烧死。他甚至认为他的声望以及他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们，会在利奥十世去世时为他赢得教皇的宝座，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一年多以后，当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去世时，沃尔西又一次努力企图使自己被选为下一任教皇。但是，信件、施压、密谋，所有这些又一次失败了。六年以后，新任教皇在举行弥撒的时候突然死去，沃尔西作了第三次狂热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据报道，他的追求之所以没有实现，固然是因为他极想成为宗教领袖，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强烈的愿望要篡夺王权。

沃尔西以自我为中心，其程度为。惟有国王本人可以与之相比。沃尔西既得到教皇的支持，又得到国王的支持，于是俨然摆出一副帝王的架势。他要仆人们跪着侍候他，要主教们给他系鞋带，洗手的时候要公爵们给他端着脸盆。他滥用职权，穷奢极欲。他穿的是丝绸和鲜血色的天鹅绒，住在奢侈豪华的汉普顿宫中。汉普敦宫有房屋五百间，花园占地面积270亩，比亨利八世本人的皇宫还要壮观。他在道德上也是臭名昭著。据记载，他曾是好几个私生子的父亲。最后，教会内外的人都转而反对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西的权力几乎大得无边，然而他的地位总是危机四伏。他就像在走钢丝，在国王和教皇的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一旦教皇与国王意见相悖，麻烦就来了。最后，沃尔西的权柄只来自教皇。如果当时沃尔西说服教皇答应国王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他就不会失去权力，改革者们就不能接近国王，而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也就不能很快成功。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离婚，然后又和一个新教徒结婚，这就等于在政治上和罗马离婚。沃尔西看出了这种不祥之兆。他无法改变亨利要离婚的决心，也无法阻止国王要和安妮·博林结婚的心愿。他意识到国王接受安妮，自然而然就是拒绝他，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失宠。情况很明显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一千个沃尔西”也抵不上“一个安妮·博林”。

当这位红衣大主教看见自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时，就要求并获得了国王的准许，回到约克郡。虽然16年前他就成了约克郡的大主教，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到那里去。1530年复活节，他按惯常的做法，带着160个随从，浩浩荡荡地动身前往约克郡。此时，他所要的一切就是不要让人打扰他，但是太晚了；他已经得罪和伤害了太多的人，包括普通平民和上层人物。（英格兰）上议院的全体议员列举了44条罪状反对他，并把这44条呈送国王；国王又把它们转给下议院。下议院控告他犯



了叛国罪。

1530年，亨利国王差遣当时伦敦塔的警卫官威廉·金斯顿爵士，带着24名卫兵押送，要将他带到伦敦受审。沃尔西吓坏了。他在卧室里踱步，自言自语，坐下像婴儿那样哭叫。在离开约克郡的路上，他们在莱斯特修道院过夜，恐惧、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痛苦，紧紧抓住了这个红衣主教。他绝望地对金斯顿说：“告诉那个国王，我祈求上帝消灭他这个有害的路德派。”他又说：“如果他容忍异端，神会拿走他的权力。”他说这些话时已经呼吸困难。他说话开始结结巴巴，他的眼睛开始发直。当钟敲八下的时候他死了。罗马在英格兰宗教改革道路上设置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挪开了。

## 短暂的呼喊

人文主义者用善良的愿望、丰富的幻想虚构出美好的社会前景，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一破灭，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反对宗教改革的另一股势力是人文主义，它直接反对宗教改革者们所相信的一切。人文主义是以人性本善的信条为基础，而改革者则宣称人类完全堕落了。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类的努力，而改革者则依赖神的恩典。圣经的核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人类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人文主义提出救赎可以在学院里找到，而改革者相信救赎只能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髑髅地找到。英格兰的两位人文主义领袖是约翰·科利特和托马斯·摩尔爵士，他们二人都得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帮助。

### 约翰·科利特

科利特是亨利·科利特的儿子，亨利曾两次任伦敦市长。约翰在牛津学习，并于1490年在那里获得硕士学位。三年后他去了巴黎。以后去意大利研究教会法典、民法及希腊语，于1496年返回。他在旅途中遇见几位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包括多明我会的托钵修士和讲道人萨沃那洛拉。萨沃那洛拉谴责意大利人的堕落和淫荡。科利特回到英格兰，被委任为牧师，并在牛津大学详细讲解圣保罗的书信。他没有以传统的学究的方式来讲解这个课题，而是通过强调使徒的个性以及保罗生活



科利特主教长，人文主义的圣经学者。

的时代来解释书信的内容。他开创了《圣经》诠释的新趋势，这个趋势大大影响了其他学者。1504年，他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四年后父亲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财富。他重建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学校，在这里对153名学生进行包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内的基督教教育。1514年，在伊拉斯谟的陪伴下，他去坎特伯雷朝圣，第二年在沃尔西就任红衣大主教的典礼上讲道。

他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身体肥胖，贪吃，是举办典雅豪华晚餐聚会的慷慨主人。当时人文主义的领袖都聚集在他的餐桌前。他对于这场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家被认为是英格兰人文主义的诞生地和中心。1519年，他死于萨里郡的希恩。

### 托马斯·摩尔爵士

英格兰人文主义的第二位强有力的人物是托马斯·摩尔爵士。1478年2月7日，他出生在伦敦。他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进入法律界，于是将他送到牛津，他在那里受到约翰·科利特的影响，接受了人文主义。



托马斯·摩尔爵士，人文主义学者，宗教改革的敌人。



托马斯爵士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代表了罗马天主教中的最美好之处。他是一个真挚虔诚的人，他不介入当时的腐败。他每星期五禁食，守夜，鞭打自己。他穿着粗毛衬衣，席地而睡，用一根圆木当枕头，将晚上睡眠的时间限制在五小时以内。当他几乎要表态接受教士的圣职时，与简·考尔的相遇改变了他的决定，他们于1505年结婚。

大伊拉斯谟在伦敦市长家中第一次遇见他，那时摩尔只有19岁，但是已经能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进行交谈。当时他还在学法律，就敢于公开发表演讲，谈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宗教和哲学的领域中，他反对宗教改革，也反对国王离婚，并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的仕途比较顺利，一步步攀上成功的阶梯。他由律师成为法官，1510年由法官成为伦敦的代理治安官，又成为英王室直辖领地兰开斯特的大法官。1529年，当需要人取代沃尔西大法官时，托马斯·摩尔被授予英格兰大法官的职位。他是第一个得到这个职位的平信徒。大法官是英格兰政府中的首席官员，其地位仅次于王室成员及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还是上议院主席，成为朝廷的一分子，不像沃尔西，他执行公务严肃刻板。

虽自诩是为“自由思想”奋斗，竟然不能容忍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这反映出摩

尔的矛盾性格。1531年，一位著名律师詹姆士·贝恩汉姆和一些信徒在巴乌巷的一个仓库里聚会、学习《圣经》时，遭到逮捕，被带到摩尔在切尔西的家中，受到摩尔和伦敦主教斯托克斯里的审问。詹姆士反驳他们的指控，竟被绑在这位大法官花园里的“真理树”上受到凶狠地鞭打。

摩尔的结局就像沃尔西那样。当国会通过提案，宣称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土地上惟一至高的元首”时，摩尔拒绝服从，并因此被逮捕，投入伦敦塔，在那里度过了15个月。女儿每天去看他，恳求他放弃自己的立场。当局希望在他女儿的压力下，他的勇气会消退，他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但是，他始终坚持他的原则。1535年7月1日，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受到审判。五天后，就在伦敦塔外被处死，他的头颅被挂在伦敦桥上。

这样，两个人文主义哲学先驱的雄壮却十分短暂的声音沉寂了下来，但是，宗教改革者对英格兰仍高度关注。

## 优雅的安妮王后

安妮是一个甜美、优雅的贵妇人，她公开支持宗教改革，宽容改革者，特地为她装订的那本《圣经》至今还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里。

在了解第一本英语《圣经》最终是如何写成的之前，我们先停下来，看看那些为《圣经》的问世作了贡献的人。在那些阅读英语《圣经》，相信英语《圣经》并在整个英格兰传播《圣经》的人之中，安妮·博林功不可没。在许多方面，她在亨利八世朝廷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以斯帖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朝廷所起的作用。

安妮是托马斯·博林爵士的女儿，在肯特郡的黑弗堡度过她的童年。她12岁时在法国王室里住了三年，1522年回国，经常出入英格兰宫廷。她有一张椭圆型的脸，明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她的美貌，她那有教养的性情以及优雅的举止，很快引起国王的注意。她歌喉甜美，舞姿端庄。当亨利国王沮丧的时候，她的歌声和笑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亨利常常写信给她，大多是用法语，常常提到“我对你怀着极大的爱”。但是，他已经结了婚，而安妮丝毫没有作他的情妇的意思。这种爱慕已经成为得不到满足的激情，坚定了亨利娶她为妻的决心。随着他和凯瑟琳离



婚日趋明朗化，亨利提出求婚，但是安妮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国王就求助于她的父亲，最后她屈从了。“如果国王不再受到约束，”她说，“我将愿意嫁给他。”

到1528年12月，国王已将她安置在格林尼治的宫中，把凯瑟琳的房间给了她，就在他自己房间的隔壁，而凯瑟琳则被送到汉普顿宫去了。1533年1月25日或其前后，这对夫妇秘密地举行了他们的婚礼。5月23日，大主教克兰麦写了一封确认信，宣称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八个月以后的9月7日，这一结合的产物，即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诞生了。）直到5月28日，安妮才在盛大的庆典中被宣布为英格兰的王后。在这些庆祝活动进行时，亨利和安妮住在伦敦塔中。

安妮是一个甜美、优雅的贵妇人，她公开支持宗教改革运动，并试图影响大臣克伦威尔，宽容一些改革者，这些人因将廷德尔的《新约》偷运进英格兰而被捕。特地为她装订的那本《圣经》，现在还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她是牛津、剑桥、以及出国留学生的慷慨资助人，并任命著名的宗教改革者马太·帕克作为她女儿伊丽莎白白的私人牧师。安妮还常常在国王面前斡旋，提升宗教改革者。从1522年到她

安妮·博林，亨利八世为了与她结婚，断绝了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



去世之前任命的十位主教中，有七人是她所支持的宗教改革者。

但是，曾经在国王心中燃烧的爱情，不到三年就冷淡了。国王的热情转向了简·西摩，这使安妮十分烦恼，以致她早产的儿子夭折。1536年1月的一天，她无意中走进一间房间，发现她的丈夫和简·西摩在做不光彩的事情。从那时起，她就预料会有什么事发生在她身上，但是，是什么事呢？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1536年5月1日，在格林尼治举办盛大的节日。观众兴高采烈地等待马上开始的长矛比赛。王后无意之中把手帕落在地上，一位主要参赛者亨利·诺里斯，拾起手帕擦脸。国王立刻离开座位，返回伦敦，而王后紧随其后，极其痛苦，极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伦敦塔的副官金斯顿来到她的房间。他护送她乘游艇沿泰晤士河到达伦敦塔，把她囚禁在一套房间里。这套房间正是她加冕典礼时她与国王同住的房间。

当克兰麦大主教听说她被逮捕的消息时，惊呆了，他不接受对她的任何指控。三位绅士，包括那位拾起她手帕的年轻人和一位乐师，遭逮捕和审问，被指控和王后通奸。前两人坚决否认指控，但是，当那位乐师被放在肢刑架上时，他很快同意说出拷问者要他说的一切。他们全都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王后。克兰麦对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口是心非的做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国王的命令他签署了对这些人的死刑判决。5月19日上午11时，安妮安详地将她的头放在塔内广场的木板上。今天那个地点仍然被人们纪念。一名熟练的法国刽子手执行了死刑，然后塔内有大炮点放，通知国王安妮已死去。

## 短命的玛丽王朝

她登上王位以后，决心重建英格兰的天主教，乌云开始笼罩在改革者头上……

亨利八世娶过六个妻子，供养若干情妇，还有过许多孩子，这些孩子中有合法婚姻生的，也有私生的，但是，只有三个孩子生下来后得以存活，其中只有一个是男孩。这三个孩子是玛丽、伊丽莎白、爱德华，爱德华自然成为王位的继承人。大主教克兰麦为他施洗，并成为他的教父之一。爱德华深受宗教改革信仰的影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新教徒。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很糟，他的生命也很短暂。他生于1537



年10月，九岁时登上王位，1553年7月，当他15岁时离开了这个世界。男性统治的时代结束了。亨利的女儿玛丽继承了王位，她比爱德华大21岁。

## 玛丽一世女王

玛丽和她的兄弟正好相反，由红衣主教沃尔西施洗，沃尔西成了她的教父。鉴于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和亨利的婚姻被认为是不合法，因此她一直被当作私生子，甚至要求她只能作为一名贵妇人谒见她的异母姐妹伊丽莎白——她母亲取代者的女儿。她母亲去世时她只有20岁，国王甚至不准她在自己母亲身边向母亲送别。在成为女王之前，她的日子是悲惨且紧张的，时刻处在被谋杀的威胁之中。

她成为女王以后，委身于天主教教会，就像她的弟弟曾委身于新教信仰。她坚



玛丽一世女王，在她统治期间有许多新教徒殉道。

持在她的私人礼拜堂里举行弥撒是她的权利，并求助于她的表兄查理五世皇帝。查理以战争相威胁要求保证她的宗教自由。在玛丽的统治初期，她的王位曾受到一个名叫简·格雷的16岁女孩的威胁。简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也懂一些希伯来语。有贵族头衔的父亲将她带到王宫，在那里她吸引了诺森伯兰的注意。诺森伯兰是英格兰政界最有权势的人。他让简嫁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达德利勋爵。在爱德华国王去世时，他劝说领导新教改革的一个派别拥戴简为英格兰女王。当这个年轻的女孩听说这个消息时，惊讶得昏了过去，随后她强烈地反对，但是，最后还是屈服压力，登上王位。

新教徒这种政治力量的展现，吓坏了玛丽，她急忙躲到英格兰东部的诺福克郡寻求保护。然而，国会已经宣布，如果爱德华死后没有儿子，玛丽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简·格雷九天后从王位上被赶了下来，因叛国罪受审，在伦敦塔被处死。

玛丽表明了她要结婚的意图。她的选择是查理皇帝的儿子菲利普，比她小11岁。这个决定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都是不幸的。国会试图说服玛丽取消这一婚姻，但是没有成功。听见这一拟议中的婚姻，全国都爆发了叛乱。由怀亚特领导的反叛力量，一直打到伦敦的城门口，才被镇压下去。就在打败怀亚特以后，玛丽嫁给了菲利普，并且决心重建英格兰的天主教。菲利普的父亲正在欧洲打仗，他的儿子被召到布鲁塞尔作为低地国家政府的元首，以后成为西班牙的元首。菲利普返回伦敦只是为了来参加英格兰的战争，战争一结束，随即去了欧洲大陆，再也没有回来过。

## 大迫害

玛丽统治的初期，表现出温和的倾向和宽恕的精神；但是当她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她的态度就改变了。乌云笼罩在改革者的头上。大主教克兰麦最早交上厄运，这标志着玛丽开始对改革者下毒手。克兰麦曾经为简·格雷加冕，而更糟糕的是，也正是他宣布她的母后和亨利八世的离婚。开始他被关在家里，1553年9月14日他被送到伦敦塔，和休·拉蒂默及伦敦主教尼科拉斯·里得雷关在一起。这些人在怀亚特叛乱前已经被逮捕。1554年3月，他们三人被送到牛津受审。拉蒂默和里得雷于1555年10月16日被处决；托马斯·克兰麦则于1556年3月21日面临熊熊火焰的煎烤。



格洛斯特约翰·胡伯主教，  
为了信仰而殉道。



最先被判处火刑的英格兰新教徒是格洛斯特约翰·胡伯主教和约翰·罗杰斯。胡伯主教对于真理特别热心，因此他于1555年1月29日，被作为异端而受到审判。当约翰·胡伯拒绝放弃信仰时，就对他作出死刑的宣判，他被送交非宗教的权力机关。

在胡伯被处决的前九天，和胡伯一同受审、并被判决的约翰·罗杰斯，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他在18年前化名托马斯·马太编写了“马太《圣经》”。当他于1555年2月4日从臭名昭著的纽盖特监狱走向史密斯菲尔德火刑场时，他的妻子和孩子站在人群中观看，当局者不允许他对妻子和孩子们讲话。

在教堂里读《圣经》，在爱德华六世时曾得到鼓励，现在再次受到拦阻。许多持有改革信仰的人，离开英格兰，去了欧洲的一些“自由”城市。幸好，玛丽的统



治是短命的。在登上王位前后，她的健康状况就很不好。1558年11月17日她去世了，没有王位继承人。在她以后的是伊丽莎白。已经向宗教改革关闭的大门，再一次打开了。

## 史密斯菲尔德的英雄们

在英格兰，绅士一般在塔山上被斩首，普通人在泰伯恩刑场被处绞刑，宗教犯被处火刑，总是在史密斯菲尔德。

应该为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的男女殉道者立一个纪念碑。他们都很英勇，其中一些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从总体上讲，他们受苦受难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对此他们是认同的。他们忍受逼迫，坚守信仰，宁折不弯。也有些人在关键的时刻软弱了，声明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随后又有勇气重新面对威胁。他们中有些人是强壮的男人，有些则是脆弱敏感的妇女，他们全都是英雄。

在中世纪，当时被称为“史密斯菲尔德”的地方，是一块很大的开阔地。一个名叫拉希尔的宫廷小丑从国王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建起了教堂和医院，并将它们奉献给圣巴托罗缪。每年要在这个地方举办圣巴托罗缪节。持续一周的节庆活动有

四个新教徒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殉道。







两个殉道者被绑在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柱上。



三个女子在史密斯菲尔德殉道。

集市贸易、格斗、骑士的马上比武等各种比赛，还在节庆期间处决犯人。172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打算在这废弃的教堂里的印刷所工作；1747年约翰·卫斯理曾在那里讲过道。英格兰最古老的医院——巴特医院，今天还在那里。

绅士一般在塔山上被斩首，普通人则在泰伯恩刑场被处以绞刑。宗教犯被处火刑，也总是在史密斯菲尔德。亨利八世把史密斯菲尔德当作处决宗教犯的地方，然而，他并不仅仅使用火刑。

以下的例子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情况。

1531年罗切斯特的主教厨师试图毒死他的主人，以除掉改革事业的障碍，因为他的主人与宗教改革为敌。东窗事发后，国王命令在史密斯菲尔德把他慢慢地煮死。

1540年，当剑桥一所著名的奥古斯丁会隐修院的院长罗伯特·巴恩斯被烧死时，其他两名改革者和他背对背地被绑在同一根火刑柱上一起烧死。但是，亨利八世也不想被人看作是有偏见的，就让三名天主教徒同时被处决。然而，他们是被绞死的。

另一个例子是罗切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他因为拒绝接受国会有关国王是英格兰教会至高元首的宣言而被斩首。

1531年12月20日约翰·特凯斯伯里被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当火焰吞没他时，他发出最后的呼喊：“惟有基督！”

威廉·廷德尔的助手小约翰·弗里斯有机会逃脱，但是为了以他的死公开见证基督的特别恩典，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大火升起围绕他的时候，他伸出双臂拥抱火焰，仿佛火焰是他的朋友似的。

在这些灰烬中的另一位英雄名叫约翰·尼科尔森，但人们称他为兰伯特。他是一位新教牧师，相信基督就在信徒心里，与信徒同在，而不是在饼和酒中。当他被召去解释这一错误时，他向国王提出上诉，并于1538年11月16日（星期五）在威斯敏斯特，在国王面前受审。四天后，他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当他快死的时候，他向人们举起他燃烧的手臂，并且高呼：“除了基督，没有拯救！除了基督，没有拯救！”

安妮·亚斯克尤是亨利八世在位时最后的一名受害者。她是贵族威廉·亚斯克尤的第二个女儿，来自林肯郡，她的姐姐和一个富有的邻居订了婚。但不幸的姐姐在婚礼前死去，父亲让安妮接替他的姐姐。这桩婚姻完全是个错误。安妮是一个忠实于宗教改革原则的信徒，她的丈夫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最后，他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去了伦敦，应邀参加了在王后房间里举行的读经祷告会。那些极

端的天主教领袖决定从安妮下手，警戒所有其他的他们不敢碰的人。因此，她在25岁时就被投入纽盖特监狱。

1546年6月28日，安妮在史密斯菲尔德被判处火刑。为了强迫她放弃信仰，她的敌人将她放在监狱中的肢刑架上。她昏了过去，但仍然坚定不移，说：“我宁可马上死，也不改变我的信仰。”当他们把她押往史密斯菲尔德时，不得不抬着她去。他们再次要她放弃信仰，但是她回答说：“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否认我的神，否认我的主的。”1546年7月16日的晚上，笼罩伦敦的夜空被火焰照亮，火焰释放了她的灵魂，使之与史密斯菲尔德的其他英雄们到天堂相聚去了。

## 传递接力棒

1517年，也就是马丁·路德把他的《论纲》钉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托马斯·比尔尼买来非法出版的伊拉斯谟《新约圣经》的那一年，约翰·福克斯出生于林肯郡的波士顿。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他对许多殉道者的罹难作了记载，我们为此深深地感谢他。

当约翰年幼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嫁给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在牛津，约翰依靠贷款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539年成为马格德林学院的研究生。虽然他原来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虔诚追随者，但他的研究最终使他怀疑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及其行为。他深受困扰，常常整夜学习，在学院附近的墓地独自散步，默想他的研究成果及其作用。他开始不像以往那样经常参加弥撒，同时避免与他的同事们为伍。他过于正直而不能隐藏自己观点上的改变，他放弃了研究生资格，于1545年回到他在波士顿的家中。

他继父毫不赞同他的观点，引用反异端法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把他赶出家门。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遇见了艾格尼丝·兰德尔，并与她结婚。他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直到玛丽登上王位，迫使他离开英格兰。

福克斯移居斯特拉斯堡，随身带着一些拉丁语的手稿。这些手稿是他所编写的，里面记载了从威克里夫时代直到1500年基督徒所受的逼迫。1554年，这本著作出版于斯特拉斯堡，并成为他的《使徒行传与碑颂》一书中的第一卷。以后，他移居法兰克福，在那里他遇到一群英格兰避难者，其中一些人是圣公会派的，另一些人是加尔文派的。他们的观点无法达成一致，再以后他移居巴塞尔，为乔汉·赫布斯特的印刷品阅读校样。两年后，他发表了给不列颠贵族的请求，请求他们学会



约翰·福克斯，殉道的新教徒  
编年史学家。



宽容。他继续从事殉道史的写作，1559年完成了他的拉丁语版本。

回到英格兰以后，福克斯定居在奥尔德盖特，在那里他和约翰·戴合作。约翰·戴曾经也是个避难者，当时有一个印刷所。1560年，伦敦的主教埃德蒙·格林德尔任命福克斯为教士。现在人们认定当时他是索尔兹伯里大教堂里一个领取俸禄的牧师，也可能是克里普尔盖特的教区长。我们知道，他常常在保罗十字形纪念碑及其

他地方讲道。如果不积极拥护清教徒的原则，他很可能在基督教教会中被提升到显赫的地位。

1563年，他的《危险末日里的使徒行传和碑颂》一书的第一个英语版本在约翰·戴的出版社里出版了。玛丽·都铎统治期间的逼迫在人们头脑里还记忆犹新，而该书却很快成功地出版了。该书生动的描述以及形象的叙述，强化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的反罗马意识。1570年再版，增添了许多新的资料，第二年，教士会议下令要将这本书放在每一个天主教的大教堂里。它成了有关那段历史的主要教科书，并成为私人教育的阅读指南。它是仅次于《圣经》的家喻户晓的书，直到一百年以后班扬的《天路历程》出版为止。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福克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旧记录的搜寻者，当他发现这些记录时，就将它们留下备用。在他完成资料收集，并根据资料写成书以后，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我都看见过，并且手头上还有……许多人非常认真地将他的书和原来的记载及会议记录进行了比较，总是发现他的书是十分忠实于原始记录的。”

福克斯死于1587年4月18日，享年70岁，埋葬在伦敦克里普尔盖特的圣伊莱斯。但是，若不是福克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应该感谢这一大批殉道者，他们的勇气促成了英语《圣经》的自由流传。







## 第五章

# 第一批英语《圣经》

### 献身基督的先驱——托马斯·比尔尼

1531年8月19日早晨，看守把比尔尼带出牢房。当他们走过主教桥时，他向前奔去拥抱火刑柱，感谢神的恩典给他为基督而死的机会。

正如有时很难寻到大河的源头，要找出一场伟大运动的开始，同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德国的宗教改革有路德领导；瑞士的改革有茨温利与加尔文；苏格兰的改革有诺克斯雷鸣般的声音。但是，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中却没有一位伟人的声音。这本未被毁灭的《圣经》就成为这样的声音。但是，当运动向前发展时，一些特殊的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许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英语的人就是这样的特殊人物。他的名字叫托马斯·比尔尼。

比尔尼大约于1495年生于诺福克。1517年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学习教会法典，像比尔尼这样有抱负的教士常常选学这门学科。教会法典开始于罗马法律与教会政策不一致并且必须举行大公教会会议的时候。决议的记录都保存下来了，到公元五世纪这些记录汇编成“教会法典”。以后，各个主教的教令都加了进去，到公元1140



剑桥郡的伊利教堂，伊利的大主教准许托马斯·比尔尼讲道。

年，它们被编纂成格拉提安的《教令集》，该《教令集》成了以后教士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参考书。

比尔尼的宗教生活是毫无效果的。禁食、祈祷守夜、赦罪，昂贵的赦罪的费用使他所剩无几，苦行也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心灵空虚，所有这些都使他内心焦虑不安。

他担心每个世代都有犹大，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现世的犹大，所以，他认定自己也应当下地狱。一天晚上，他去黑市买了一本“伊拉斯谟《新约圣经》”。“伊拉斯谟《新约圣经》”是前一年出版的，尽管被禁止，仍然是剑桥宗教亚文化的一部分。当比尔尼读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十分震惊。当他读到《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中保罗的话时，这些话就像箭一样射到他的心里。他立刻相信这里所说的基督，他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怀疑被确信所取代，敌意变成了和平，兴奋的狂喜占据了整个的心。他立刻想要与别人分享他刚刚找到的信仰。

他挑选了小白房旅店作为撒种的土地。因为在这个“白房子”里，剑桥学者可以聚集在一起谈论课堂里禁止谈论的路德的著作，所以“白房子”有个别名“小德国”。比尔尼把他的《新约》带进了这些讨论会，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巨变。

这个消息传遍了剑桥，并开始吸引了大学里许多著名的讲演者。这些人出于好奇心来到白房子，他们阅读并讨论了比尔尼的《新约》后就改变了信仰。他们中包括圣约翰学院的研究生托马斯·阿瑟，他成了比尔尼的旅行伴侣；还有著名的休·拉蒂默，虽然他是在忏悔室里，而不是在小白房旅店改变信仰的。乔治·斯塔福德是彭布鲁克大学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可能是剑桥最令人钦佩的教授，他信仰的改变震动了整个学术界。斯塔福德试图影响另一个神学博士罗伯特·巴尼斯，他是剑桥一家隐修院的院长。斯塔福德没有做到的，比尔尼做成了，罗伯特·巴尼斯改变了信仰。

这一轰动唤醒了整个英格兰，吸引了许多其他人，如未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马太·帕克，以及下文我们将要提到的，为了印刷英格兰第一本英语《圣经》而殉道的威廉·廷德尔，和18岁的数学系学生，宗教改革的智囊约翰·弗里思。

比尔尼毕业于1519年，获得法律学士学位，被委以圣职。1525年，他得到伊利主教准许，开始在讲坛宣讲福音，公开抨击对圣徒及圣徒遗物的崇拜。1527年，他在伊普斯威奇讲道时被逮捕，被送到伦敦塔关押。他在威斯敏斯特牧师会礼堂受审，法官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红衣主教沃尔西，以及其他几个主教和律师。沃尔西因紧急的事情不得不离开，让伦敦主教滕斯托尔负责审讯。他们与比尔尼玩猫与



托马斯·比尔尼将他的食指放在火焰上。



老鼠的游戏。让他的朋友们与他谈话，劝他“为了整个运动的益处”而妥协。他听从了朋友的劝告。1527年12月7日，他签署放弃信仰的声明。第二个星期日，他剃了头发，光着头，走到圣保罗教堂去听抨击他是异端的讲道，并被迫在一大堆廷德尔《圣经》上点火。这件事震动了他的灵魂，使他几乎发狂。他决心要继续讲道，不惧怕再次被捕，这样他就可以为真理而献身。

1531年，他在诺里奇受到第二次审讯。当局打算当众烧死他以消除他的影响。行刑的前一夜，马太·帕克与一些朋友去探望他时，他正在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想到第二天可怕的酷刑，他们尽力地安慰他，但是比尔尼什么都不说。他吃完晚餐，把凳子一推，将打开的《圣经》放在身边的桌子上，将自己的食指放在蜡烛的火焰上，一直烧到骨头。他看着他惊呆了的朋友，指着《以赛亚书》43章2节说：“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1531年8月19日早晨，看守把比尔尼带出牢房。当他们走过了主教桥时，他向前奔去拥抱火刑柱，感谢神的恩典给他为基督死的第二次机会。他是他同时代人

的高贵榜样。首先，他教导了宗教改革者如何为基督而活，然后，教导了他们如何为基督而死。

## 主教长克兰麦

他当了23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地位仅次于君王。他举起右手，指向人群，谴责自己用右手签署了放弃信仰的声明，并宣告说这只手是他身体中要烧的第一个部分，然后从容走上刑场。

托马斯·克兰麦和大多数宗教改革的英雄们大不相同；事实上，与其说他是个英雄，还不如说他是个懦弱的人。但是，正是他在压力下弯曲的这种能力，使他能够在推动英语《圣经》的出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489年7月2日他出生在诺丁汉郡。以后，他在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时说，他读书时学校的校长非常严厉，他被训练得像驯鹰者和骑手一样老练。

他的父亲死于1501年，他的母亲送他到剑桥，1501年他成为那里的耶稣学院的研究生。当他与海豚旅店老板娘的亲戚“黑琼”结婚时，他不得不丧失了研究生的资格。但是他的妻子因难产死去以后，他就恢复了原来的资格。1523年，他被授以圣职，第二年毕业。他得到了在马格德琳学院教神学的职位，也成为大学的一名督察。

1529年夏，当“汗热病”爆发时，他决定把在他监护之下的两名男孩带回到他们父母所在的埃塞克斯郡家中。当他到达埃塞克斯的沃尔瑟姆镇时，正巧亨利八世也在那里。克兰麦吃饭的时候，认识了随国王旅行的国王秘书加德纳，他们开始交谈。在谈话中，他评论说，如果大学里的神学家们认定国王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压根儿就是不合法的话，任何教会法庭都会准许他离婚的。据说，国王听了这话说：“我想，这个人尽管讲对了，但却无济于事。”

在格林尼治与国王面谈以后，克兰麦受命写下他的观点，引用支持他观点的教父的话、《圣经》经文和历次宗教大会的决议。他因此被提升到执事长的职位，随即就被指定为国王的私人牧师之一。他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为自己的观点辩解，1530年被差遣去罗马为国王的案子辩护。



罗马之行失败以后，克兰麦被差遣去德国，在路德派诸王前宣扬他的观点。而且，重要的是，他被授予政治权力，如果他认为有可能有利于他的使命，他可以撤销贸易禁运。他在那里的时候，与很有才华的牧师奥西安德住在一起，并于1532年与他的侄女秘密结婚。这个婚姻虽然很难保密，可是一旦被揭发也很危险，因此还是成功地保密了许多年。第二年3月30日他被委任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我们知道，宣布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的是克兰麦。给安妮王后加冕的是克兰麦，可是三年不到，签署亨利与安妮离婚文件的还是克兰麦。而更为重要的是负责和指导宗教改革各种事务的仍然是克兰麦。这是他最重要的作用。1538年，亨利国王下令，每个教区的教会都要买一本英语《圣经》，在克兰麦的影响下，1541年又重申了这条命令。他几乎是孤身一人反对亨利1539年的六条法令，这六条法令清楚地表明了英格兰反路德派的立场，支持罗马的圣餐变体及教士守独身的教

托马斯·克兰麦大主教



义。尽管他反对，它们还是被通过了，使新教受挫，然而，六条法令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失败只是暂时的。

亨利死时，克兰麦在他的旁边。亨利八世从来不是真心的新教徒，他留下600英镑，用以支付祷告，据说这样的祷告能缩短他在炼狱里的时间。

克兰麦给爱德华六世加冕时，由于年轻的国王身体虚弱，他缩短了加冕典礼的时间，六年后当爱德华离世进入永恒时，他也在爱德华的旁边。其他人看到将要落在英格兰新教头上的危险，纷纷逃到欧洲大陆，但是在简·格雷在位的九天之中克兰麦一直在她的左右。

我们知道，玛丽从简·格雷手中夺得了王位，于1553年加冕。她发誓要对克兰麦进行报复。克兰麦关于要亨利与她母亲离婚的观点，使玛丽成为私生子。克兰麦也曾促使英格兰转向新教信仰。那年的下半年，他被指控犯了叛国罪，被带到伦敦塔。1555年9月，罗马教皇方面的委员会，对他和里德雷、拉蒂默进行了缺席审判。在1556年2月，他67岁时，罗马派来的特别委员会，剥夺了他的职位。在这个时候，他签署了两个放弃信仰的声明。

因为他的地位仅次于君王，并且已经当了23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所以特别为他安排了一个日子让他公开作放弃信仰的声明。1556年3月21日，在圣玛丽教堂，他使法官惊呆了，他否定了他放弃信仰的声明。他举起他的右手，指向人群，并谴责自己的右手，并宣告说这只手是他身体中要烧的第一个部分。他安详自信地接受命运的安排。那一天，他与里德雷、拉蒂默、比尔尼以及其他的殉道者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天堂相聚了。

## 智者弗里思

1533年7月4日，在史密斯菲尔德，他与22岁的裁缝安德鲁·休伊特背对背地绑在火刑柱上。风将火焰从弗里思身上刮走，他仍然微笑着，因为这虽然会延长他的痛苦，却可以加速朋友的死亡。

1503年，约翰·弗里思生于威斯特汉郡，他的父亲理查·弗里思是一个小旅店的老板。他年轻的时候，被送到剑桥，考进了引人注目的国王学院。在那里，他遇



精心建造的门房，通往剑桥国王学院，约翰·弗里思曾是那里的研究生。



见了廷德尔，廷德尔引导他了解了基督。弗里思是学古典著作的学生，他天生有杰出的头脑和超人的记忆。1525年12月7日，他在剑桥获得学位。

那时，红衣主教沃尔西正在牛津建造红衣主教学院（以后成为基督教会），来剑桥物色有资格成为其创办成员的人。未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是，弗里思与许多其他人接受了。他移居牛津，1526年当学院开学时，成为一名初级教士。

1527年，比尼尔被逮捕了。他在伦敦受审讯时人们发现，托马斯·加勒特已经在黑市出售了350本宗教改革方面的神学书籍。比尔尼在剑桥所有知己的朋友都受到怀疑，并被逮捕。弗里思在牛津的朋友，剑桥学生约翰·克拉克，在卧室里向几个学生读《圣经》时被发现，导致比尔尼在牛津的所有朋友，包括弗里思都被逮捕了。

这群人被关在学院下面储藏咸鱼的洞穴里，他们中三人被折磨死去，其中包

括约翰·克拉克。这时候，沃尔西下令释放其余的人。一些人被迫将柴捆背到牛津的十字路口，焚烧一大堆禁书，但是弗里思设法躲避了这个惩罚。

弗里思逃脱了，他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安特卫普，在那里遇见廷德尔，二人一见如故。廷德尔是沃尔西蓄意谋害的牺牲品之一，弗里思帮助廷德尔增强信心，站稳脚跟。英格兰驻安特卫普的代表斯提芬·沃恩曾企图离间这两个改革者，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知之不多。

从1528年到1532年，弗里思不在英格兰。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书，这些书在安特卫普出版。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对教父们的了解，以及对罗马教义直截了当的抨击而出了名。英格兰的反对派的领袖称他为危险的敌人，并悬赏要他的脑袋。

而弗里思却越过海峡回到了英格兰，像一只羊羔悠悠哉哉地走进了狮子笼里，这究竟是为何，我们无从知道。他计划要去里丁城，那里的隐修院院长是改革者的朋友，私下在他自己的家中进行新教的事奉。但是，弗里思还未走到院长的家，却因流浪罪被逮捕。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于是被戴上手足枷，被当作流氓对待。在几乎要饿死的情况下，他要求见一个名叫科克斯的校长，科克斯设法使他获释了。

弗里思这时发现进入英格兰容易，离开英格兰却难。他在绍森德再次被捕，被认出是改革者，送到伦敦塔。两个秘密的改革者克伦威尔和克兰麦，把他说成是“国王的囚犯”，使他的敌人没有机会发泄对他的愤怒。这反而保证了他在关押期间的安全。

在狱中，五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在这期间，弗里思博得了监狱看守的好感，使自己获得了一些特殊待遇和自由。一些人得到允许到监狱里探访他，他也不止一次得到允许可以离开牢房在外面过上一夜。监狱看守也允许他的朋友将稿纸和文稿偷偷带进或带出牢房。这些礼遇保护了英格兰在宗教改革期间所产生的最丰富的文学遗产。在出版者的帮助下，弗里思能够在监狱里与宗教改革的敌人进行论战，他的对手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大臣托马斯·摩尔爵士。偷偷带出监狱的那些文稿，在欧洲大陆出版，然后在整个英格兰流传。特别是弗里思写给摩尔一封回信，引用了安布鲁斯、克里索斯托、哲罗姆、德尔图良、奥利金、亚大纳西的话——然而，他在监狱中连一本书也没有，竟全靠他的记忆，真是一位记忆力惊人的优秀辩论者。

弗里思关于主的晚餐的著作，很有力量，很清楚，也很有成效。不仅仅能使对手改变信仰，还使其他改革者相信：主的晚餐是一个很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以致他们必须甘愿为他们的信仰而赴死。他的这些论点以后都收集在1552年出版的《公



共祷告书》中。

在拒绝了许多逃跑的机会以后，1533年7月20日，弗里思在圣保罗教堂受审，被宣判有罪，关在纽盖特监狱等候处决。1533年7月4日，他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与一个名叫安德鲁·休伊特的22岁的裁缝背对背地被绑在火刑柱上。风将火焰从弗里思身上刮走，他仍然微笑着，因为他知道，虽然这样会延长他的痛苦，但是可以加速他朋友的死亡。当弗里思的灵魂在史密斯菲尔德离开他的身体时，他刚刚过了30岁。

## 演说家拉蒂默

他们被绑在火刑柱上，柴捆被点燃了，拉蒂默鼓励里德尔说：“里德尔要做大丈夫，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英格兰点燃的这只蜡烛，将永不熄灭。”

约翰·弗里思为《圣经》的教导而辩论，安妮·博林王后鼓励《圣经》的发行，休·拉蒂默则传讲《圣经》的信息。他很可能是于1485年出生在瑟卡斯顿，距约翰·威克里夫曾经事奉过的路特沃思仅12英里，父亲是个小地主，出租农场，“每年至多挣三四英镑”。为了帮助父亲，他照看5只羊，为30头奶牛挤奶。

拉蒂默考进了剑桥的克莱尔学院，1510年获得学士学位，四年后获得硕士学位。从此决定研究神学。他努力学习，并于1524年获得学位。为了毕业，他必须作一次有关宗教课题的演讲，给他选定的题目是谴责梅兰希顿（路德的合作者）。他对德国宗教改革的严厉批评，以及他发言的机灵和技巧，表明他是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的领导恩赐的人。

拉蒂默的杰出智力和他的演讲天才，受到了托马斯·比尔尼的注意。比尔尼作为学院的研究生不得不参加一次演讲会，恰好听到拉蒂默的精彩演讲，就感到，这种天才真应当用在宗教改革上。但是，比尔尼是公认的异教徒。如何能说服拉蒂默呢？当演讲结束，掌声停息，比尔尼走近拉蒂默，问拉蒂默是否愿意听他的告白。比尔尼在告白中引用了许多《圣经》经文，并请他纠正自己对这些经文的理解。拉蒂默听了两个小时，然后承认比尔尼的观点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又一个改革者诞生了。

拉蒂默在白房子旅店里与改革激进分子交往，激怒了反对派。伊利的主教禁止他在剑桥地区讲道；但是，奇怪的是，红衣主教沃尔西却给了他在全英格兰任何地方讲道的自由。1529年12月，他讲了两次道，题目是《论纸牌》，在这两篇讲道中他抨击了在圣诞节庆典时玩纸牌，建议最好使用“基督的纸牌”，即基督的命令。

讲道引起了吵闹与争论，并吸引了国王的注意。拉蒂默于1530年的四旬斋应邀在亨利面前讲道，结果他被任命为王室的牧师。拉蒂默说话直截了当，不像别人对国王说话那样。他提醒亨利，说亨利是个凡人，“在你里面有亚当堕落的本性……”



休·拉蒂默主教，1555年在牛津殉道。





尼古拉斯·里德尔和休·拉蒂默 1555 年在牛津殉难。

同样需要基督的怜悯之恩。”他甚至描绘使徒保罗被迫“背负柴捆”到圣保罗教堂，因为他宣称“你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

伦敦的主教约翰·斯托克斯利传唤拉蒂默接受主教委员会对他的审查。结果他被逐出教会，并且被囚禁。但是，国王进行了干预，支持拉蒂默。《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评述：“然而，正是拉蒂默的讲道，而不是亨利的法令，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他的讲道在类似的讲道中是杰出的。他的讲道生动、鲜明、简洁；感情深沉，劝告人们实践信仰时具有洞察力。对学历史的学生来说，他的讲道可以作为当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镜子，有着巨大的价值。”

1535年，拉蒂默被按例立为温切斯特的主教。五年以后，作为主教他要接受一项不愉快的任务，就是在对约翰·福里斯特实施火刑时讲道。福里斯特拒绝承认国王是教会的元首——这是1539年的六条法令所规定的。拉蒂默拒绝讲道，于是辞去主教的职务，并被限制在奇切斯特主教的宫殿范围之内，失去活动的自由。在以后的七年中，他似乎销声匿迹了。1546年，他被带到格林尼治的枢密院，再次被定罪，囚禁在伦敦塔。这时，亨利八世已经去世，他惟一合法所生的儿子，年轻多病的爱德华六世接替王位，爱德华强烈支持新教信仰。拉蒂默被释放，众议院请他重新担任他的主教职务。1548年1月，他重新开始向群众讲道，听道的人数比以前更多。

1553年，玛丽登上王位，他再次被传唤到威斯敏斯特会议前。虽然他本来能够逃到欧洲大陆去，但是他选择了出庭，路过史密斯菲尔德时，说它在为他“呻吟”。

1554年，他与两个好朋友，伦敦主教里德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住在伦敦塔里的一间牢房里。在受审时，他们被问及关于主的晚餐中有些什么以及弥撒抚慰的效果如何。他们得到最后一次放弃信仰的机会，但里德尔和拉蒂默都表示拒绝。1555年10月16日，他们被带到牛津的“镇渠”，在听了一篇攻击他们的讲道以后，他们被绑在火刑柱上，柴捆被点着了。拉蒂默鼓励里德尔说：“里德尔，要做大丈夫。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英格兰点着的这支蜡烛，将永不熄灭。”

当拉蒂默烧焦的身体从铁链上掉落在灰烬上时，终年70岁。《圣经》改变了他的人生，在痛苦中安慰了他，并且正如他所宣讲的：这本书改变了英格兰。

## 建桥者——托马斯·克伦威尔

他说：“国家这个身体只能有一个头，这个头必须是国王，而教会只能是手臂。”

要讲述与《圣经》有关的故事，不提到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也许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的介入对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成功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他，英语《圣经》的故事将会是完全两样。他是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之间的桥梁。

托马斯·克伦威尔很可能是出生于1485年。他的父亲，普特尼的瓦尔特·克伦威尔，别名史密斯，是一个酗酒的、名声不好的啤酒酿造工、铁匠、漂洗工。托马斯在一次争吵以后，逃离了他父亲的家，看来他当时去了意大利，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军队。1503年12月他18岁时，参加了加里格利奥诺的战争。离开意大利后他去了佛罗伦萨，所有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他得到一个银行家的帮助。我们以后再听到他的时间已是1510年了，那时他在安特卫普。他在安特卫普遇见一群波士顿人，他们正在去罗马的路上。为了在波士顿一个商业协会寻求教皇的特许，他们雇佣了克伦威尔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他同意了，但是在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讲话以前，他设法送上一一些从英格兰带来的糖果，因此得到了成立商业协会的特许。

他后来的一次露面是1513年在伦敦，当时他娶了一个普特尼的富裕的女士。到16世纪20年代初期，他是著名的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属下。1523年，他成了国会议员，1524年他进入伦敦一个合法的社会团体格雷律师学院。他在国会的第一次讲话



托马斯·克伦威尔（汉斯霍尔  
贝因画）



是在1529年11月2日，反对谴责沃尔西的提案。这个提案上院已经通过，沃尔西处于严重的困境，但是克伦威尔在下院出色的辩护挽回了沃尔西的颓势。这篇讲话使得克伦威尔扬名全国。在以后的十年中，克伦威尔是国王在国会的代言人，亨利则通过克伦威尔驾驭国会。

克伦威尔不能决定亨利的政策，他却是亨利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工具。1532年到1539年之间出台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法令是由他起草的。他秘密参与了所有不公开的讨论，非常尽职地将这些讨论的结果报告给国王。克伦威尔的哲学观点是非常清楚的。当国会考虑独立于罗马时，正是他做了这样的陈述：“我们已经深思熟虑地考虑了王国的需要，并且已经得出结论，国家好像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只能有一个头，这个头必须是国王。”形成“一个身体”意味着教会只能是国家的手臂，由国王取代教皇来做国家的头。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分水岭两边的重要人物——如托马斯·摩尔爵士以及罗切斯特的费希尔主教等人——因为拒绝承认这一法令而殉道遇难。这一国会法令，对教会与国家的发展进程，有着空前的影响，而克伦威尔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桥梁。

1533年，克伦威尔成为国王的秘书，1534年成为首席秘书和英国法律界的主事官，1536年成为国王掌玺大臣。是他影响国王作出关闭英格兰所有修道院的决

定，将出售修道院财产所得分给大臣，他对此负有责任。使他做出如此无情之事的并不是僧侣们的道德败坏，而是修道院的僧侣们拒绝听命于国王，仅仅顺服于罗马教廷。他以后得到回报，成为埃塞克斯伯爵，他的两个同事被任命为国王的秘书。克伦威尔也致力于治理国家，使他自己越发显得重要。

但是克伦威尔过于玩弄政治手腕。结果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她的失败。欧洲两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查理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都信奉天主教，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亨利。而克伦威尔策划与德国的施马尔卡尔德联盟结成反对他们的同盟。那时候准备娶安妮公主为妻。她是克利夫斯公爵的女儿，撒克逊选帝侯的小姨。克伦威尔负责安排了这桩婚事。在声势浩大的鼓噪之后，安妮到达英格兰，被护送到格林尼治的国王宫殿。她竟然那样肥胖、笨拙、难看，毫不斯文典雅。亨利极度失望，尽管他知道，为了国家的缘故他必须举行婚礼，但他从来没有与她圆房。

操办婚事上的失败，使克伦威尔失去国王亨利的信任。亨利斥责克伦威尔，冷酷而突然，就像野兽扑向猎物。1540年6月10日，在那桩倒霉的婚姻之后六个月，亨利指控克伦威尔叛国，将他关进伦敦塔。克伦威尔的无情和权力欲使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处决他的提案在国会中顺利通过，没有一个人反对。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或许克兰麦是例外。1540年6月20日在塔山上他的头被斧子砍下。他的死，证明了他忠实可靠的天主教信徒。

后来，每一个英国人通过每一个英格兰教区的教会，都可以得到《圣经》，应该说这要归功于克伦威尔，他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一事实，不能被忽视，教会永远应该感谢他。他还强制实行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登记。并且下令举行某些英格兰国教的宗教仪式时讲英语，而不讲拉丁语，从而改变了教会几百年的传统。

## 英语《圣经》之父

廷德尔认识到：如果普通人的学识不能上升到理解《圣经》的程度，那么《圣经》就必须走下来，变得让常人容易理解。因此，必须把《圣经》译成普通人的语言。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威廉·廷德尔都是“英语《圣经》之父”。诚然，威克里夫《圣经》先于廷德尔《圣经》143年，但是它从来没有印刷出来。此外，由于它



在伦敦堤岸公园里的威廉·廷德尔塑像。



不是译自原文，而是译自拉丁通行本（即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译者注），因此它里面错误颇多。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比“廷德尔《圣经》”早九年，但它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只是学术界里用得着。根据“伊拉斯谟的《新约》”序言，他希望“犁地的人将扶着犁唱经文诗歌。”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除非那犁地的人受的是希腊语教育。正是廷德尔，提供了劳动者所用语言的《圣经》。

15世纪90年代初，威廉·廷德尔出生在威尔斯的边界附近。关于他的父母、他的兄弟约翰和爱德华，我们一无所知。他成为牛津玛格德琳大学的一名学生，于151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离开牛津，去了剑桥，并且可能与比尔尼的白马旅店的团契建立了关系，这个团契是产生大主教、主教、殉道者的团契。正是在剑桥的这个地方，廷德尔见证了神的话吸引人 and 使人重生的力量。

廷德尔认识到：阻碍宗教改革向剑桥之外传播的，惟有文化的障碍，如果普通

人的学识不能上升到理解《圣经》的程度，那么《圣经》就必须走下来，变得让常人容易理解。因此，必须把《圣经》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一极为美好的前景大大地激励了他。这成了他毕生的任务，他为此献出了生命。

1521年，廷德尔离开剑桥，去了布里斯托尔城附近的小绍德伯里庄园，在那里为约翰·沃尔什爵士工作，可能做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用业余时间向邻居中讲道，在小阁楼的房间里开始翻译《圣经》。然而，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早在1408年就通过了一条反对罗拉德派的法律，禁止使用任何非拉丁语的《圣经》。就在廷德尔开始翻译《圣经》的两年前，六位父亲和一位母亲就是因为教他们的孩子背诵英语主祷文，在考文垂被处火刑。廷德尔在沃尔什家里翻译《圣经》，是在拿他们一家人的生命冒险。

廷德尔知道，在家中给他一份工作，许可他翻译《圣经》，是在伦敦主教卡思伯特·滕斯托尔的权限之内。于是，他离开小绍德伯里去伦敦，但是不久就明白了，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全英格兰，他都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许可。廷德尔决心不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将《圣经》翻译成英语，他决定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为一个商人工作，那个商人资助并且进口新教的禁书，以后廷德尔出海去了欧洲大陆，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

廷德尔在路德的家乡维登堡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虽然路德年长廷德尔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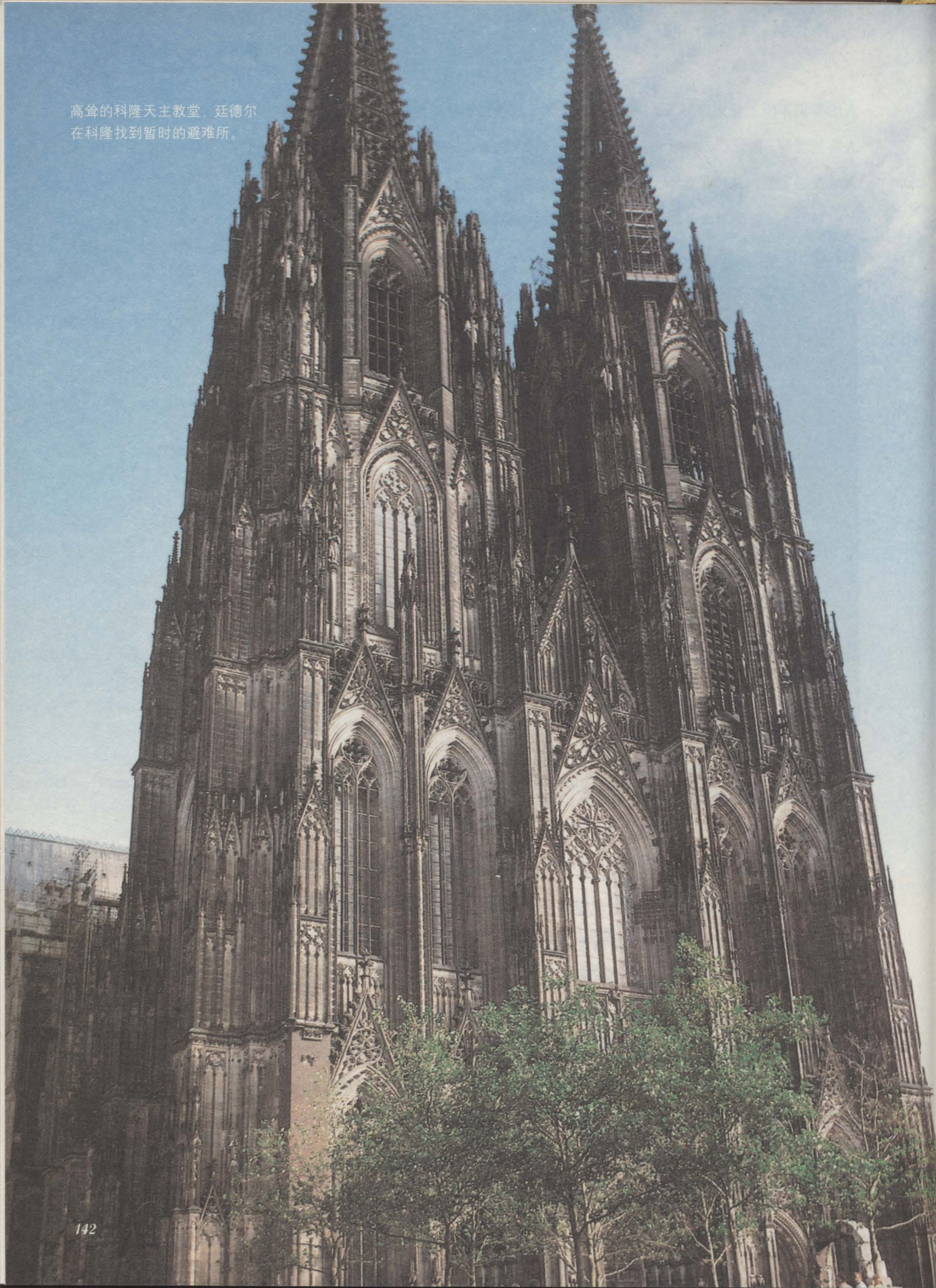
并且在所有《圣经》经文的解释上不一致，但是他们通过座右铭“sola scriptura”——“惟有《圣经》”——紧密地联在一起。廷德尔在维登堡的时候，他以假名字进入大学，并和一位英国老乡威廉·罗伊交上了朋友。罗伊帮助他写，并答应帮助他把手稿出版。

印刷是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他们去了科隆，找到了一位愿意承接这项工作的印刷商，但是英格兰的侦探破坏了这笔业务。当侦探从前门进来时，廷德尔带着已印好的部分从后门逃走了，真是死里逃生。如果被发现，就肯定意味着囚禁和死亡。他们去了沃尔姆斯，在那里找到彼得·舍费尔，一位愿意完成这个任务的印刷商。1525年，《圣经》准备装船，廷德尔与罗伊分手，他们合作的目标已经实现。

1526年春天，《圣经》运到英格兰，引起了全国的骚动。国王谴责这些《圣经》，并要把它们当众烧毁，所有持有或散发《圣经》的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折磨和迫害。据说，滕斯托尔授权一个在安特卫普做生意的商人，买下所有可以得到的《圣经》，把它们带回伦敦烧毁。滕斯托尔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商人是廷德尔的朋友，他用国王的钱以生产每本《圣经》四倍的价格支付给廷德尔。所以，滕斯托尔每烧



高耸的科隆天主教堂，廷德尔  
在科隆找到暂时的避难所。





一本《圣经》，国王就另外付出三倍的钱来增加廷德尔的库存。

后来，当局悬赏廷德尔的脑袋。来自英格兰的许多侦探开始在整个大陆漫游，他们乔装打扮，花钱买消息，搜寻线索，但是没有一人取得成功。他们彼此相遇，却没有遇到廷德尔！没有一个人知道廷德尔的蛛丝马迹。原来，廷德尔秘密移居到马尔堡，乔装打扮，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以便可以翻译《旧约》。掌握了这种语言以后，他移居汉堡，从那里去了安特卫普。在这期间，他影响了约翰·弗里思和迈尔斯·科弗达尔。后来，弗里思被判决，在史密斯菲尔德被处火刑，但是科弗达尔活了下来，以后对英语《圣经》的翻译和出版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以后的几年中，廷德尔一定知道当林间响起围猎的号角声时，一只狐狸的感受是怎样的。他成了一名逃亡者，变换装束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他之所以一直未被发觉，原因在于他精通七种语言，每一种语言说起来都像个当地人一样。

## 墨宝永存

他们焚烧了他的身体，扼杀了他的声音，只有一本廷德尔翻

从欧洲大陆运来的英语圣经，  
根据主教的命令被焚烧。





威廉·廷德尔被烧死在佛兰德的火刑柱上。



译的《圣经》留存下来，但是却影响了后世所有的《圣经》版本。

逃亡生活的艰难不是廷德尔身上惟一的压力。更大的压力是如何把《圣经》翻译得准确。他说：“《圣经》从《圣经》的发出者那里得到权威。”他深知自己正在翻译的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他从来没有偏离过这样的信念。这样的工作需要极度的仔细，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据福克斯报道，廷德尔曾说：“我呼求神纪念，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心灵深处的声音，改动他话语的一笔一划。今天即使世上所有的快乐、荣耀、财富都归给我，我也不会改动神的话语。”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当他翻译完“摩西五经”时，他坐船从安特卫普到汉堡。在旅途中，猛烈的风暴打坏了船，他失去了所有东西，包括他珍贵的手稿和他的钱。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当他最终到达汉堡时，迈尔斯·科弗达尔在那里迎接他。1529年的4月至12月，他们一起工作，再次翻译摩西的五卷书。1530年初，廷德尔的“摩西五经”第一版出版了。到他被捕时，他已翻译到《历代志下》和《约拿书》。他未能完成《旧约》的其余部分，但是，在他的鼓舞下，其他人替他完成了。

人们可能认为像这样一个全身投入的人，将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但是廷德尔写了其他几本讨论宗教改革问题的书。1528年，他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后来成了改革运动的旗帜。第一本是《邪恶玛门的比喻》，第二本是《基督徒的顺服》。这两

他们扼杀了他的声音。他们焚烧了他的双手。他们掠夺毁坏了他的财物，焚烧了他。本书捍卫了两条重要的原则：教会中的权威是《圣经》，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国王。在这两本书出版两年以后，又有一本书出版了，即《高级教士的行为》，这本书强烈地谴责了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亨利八世的离婚。这些书在英格兰是众所周知的，很有影响。一个名叫托克斯伯里的殉道者因为拒绝放弃《邪恶的玛门》一书中的教导，被放到了伦敦塔的肢刑架上。他见证说，是这本书把他领到基督跟前。

1529年，廷德尔进行了他最著名的论战。托马斯·摩尔写了《托马斯·摩尔爵士的对话，谈路德与廷德尔的邪恶宗派》一书。摩尔被认为是罗马教会在英格兰主要的辩护者，廷德尔拿起了笔作回答，两人的辩论涉及所有支持和反对宗教改革的论点，其核心在于教会与《圣经》哪个有更高的权威。C·S·刘易斯把辩论描述为“伟大的柏拉图主义的对话，或许是英格兰有史以来这类最好对话的楷模。”廷德尔一些最强烈的批评者也称赞他的辩论技巧，摩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拉斯谟写信给伦敦主教滕斯托尔，承认“我不能真心庆贺摩尔”。

廷德尔在安特卫普城避难了一段时间，他可能住在托马斯·波因茨的家中，波因茨是小绍德伯里庄园沃尔什太太的亲戚。他在那里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编纂以前的出版物。但是由于他未能留在那里监督《新约》新版本的出版，这个版本于1534年出版时，“充满了印刷错误”。1535年，他返回波因茨的家中，在那里遇见亨利·菲利普，波因茨一家给了菲利普很多的帮助，他也宣称自己是新教的学生。然而正是这个菲利普背叛了宗教改革者。他向廷德尔借了40先令，出去吃饭，向埋伏等候的人指认了廷德尔。1535年5月24日，廷德尔被捕，被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坚固要塞维尔沃德城堡。

廷德尔受审时，他拒绝辩护律师为他辩护。他认为法官是出于偏见和恶毒。结果已经确定，他的辩护律师只是在走过场而已。但是他本人却能够为福音的真理作见证。他无意为自己辩解，只想捍卫《圣经》。他被定犯有亵渎圣物罪，穿着司铎的外袍，被带到主教面前。主教宣判他被逐出教会，叫人把他身上的外袍脱下，让一个理发师把他的头剃光，然后将他带回牢房。

直到1536年9月或10月，刽子手才将他带到外面杀害。他们把他用铁链捆在一根柱子上，在柱子上有两个小孔，他们用一根铁丝穿过小孔，根据对廷德尔的判决，他在被烧死的同时也被勒死。廷德尔丝毫不显得害怕、后悔、犹豫。当刽子用手用铁丝绕住他的喉咙时，他发出了最后一句永垂青史的话。这句话是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



们所能找到的每一本《圣经》。但是，他们想平息他声音的企图失败了。虽然只有一本第一版廷德尔《圣经》在大销毁之后留存下来，但是，廷德尔的献身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他的先见之明指导了改革运动，他的翻译几乎影响了以后所有的《圣经》版本。

## 埃克塞特的主教——科弗达尔

一个牧师同他争论《圣经》一定要用拉丁文写成，他说：“不！”

另一个参加了剑桥白马旅店《圣经》学习小组惟一的年轻人，就是迈尔斯·科弗达尔。1488年他出生在约克郡，1514年在诺里奇被委任为教士，进入剑桥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隐修院，在那里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在那里认识了托马斯·摩尔爵士，在摩尔家中又遇见了未来的英格兰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是罗伯特·巴尼斯，巴尼斯受托马斯·比尔尼讲道的影响改变了信仰。巴尼斯引领科弗达尔研究《圣经》，并最终引导他参与了白马旅店的讨论。巴尼斯被逮捕，并在伦敦受审时，科弗达尔去给他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后来科弗达尔离开修道院，放弃了他要成为一个巡回传教士的誓言。他到处旅行，尤其在欧洲大陆旅行。1529年他到汉堡，在那里帮助廷德尔翻译“摩西五经”，很难知道他做了哪些工作，因为他并不懂希伯来语。同时，他开始了他自己的写作生涯。他的26篇著作中，多数是宗教改革作者作品的英语译文。

雅各·冯·梅特伦，安特卫普的一位商人，雇用他将《圣经》翻译成英语，他于1535年完成了这项任务。当他的一个牧师同事与他争论《圣经》一定要用拉丁文写时，他说：“不，圣灵既是拉丁语《圣经》的作者，也是希伯来语、希腊语、德语、英语《圣经》的作者。”

这种译本的第一版，也就是第一本英语《圣经》，于1535年10月4日问世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完整的《圣经》版本，只有五六本残缺的抄本，只有扉页，没有出版者或出版地点的说明。为了使这个译本在英格兰更加能被人接受，科弗达尔把它献给国王以及他“亲爱的妻子，最纯洁的公主，王后安妮。”但是，当安妮几个月后失宠并被斩首时，他的呈献就对他不利了。

迈尔斯·科弗达尔，英语圣经的翻译者。





“科弗达尔《圣经》”的扉页，  
1535年问世，献给亨利八世  
国王。

# The Byble in

Englyshe, that is to saye the con-  
tente of al the holy scripture, both  
of þ olde, and newe testamēt, with  
a prologe therinto, made by  
the reuerende father in  
God, Thomas  
archbysshop  
of Cantoz.

by  
This is the Byble apoynted  
to the vse of the churches.

Printed by Rychard Grafton:  
Cum privilegio ad imprimendum solum.

M. D. III.

Obsecro igitur primum omnium vester obsecratione et oratione,  
petitione, postulacione, gratiarum actione pro omnibus  
hominibus, pro regibus etc. 1. Timo. 2.

GOD SAVE THE KYNGE





1534年12月，科弗达尔出席了大主教克兰麦召开的教士会议，会议呼吁要翻译一本权威性的英语《圣经》。科弗达尔当时要求赋予他的译本以权威性，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这个版本甚至在学术水平上也不是很高。一些扉页说，它是译自德语拉丁语，但是科弗达尔承认使用了五个译本——两个拉丁语译本，两个德语译本（路德译本与“苏黎世《圣经》”），以及廷德尔的《新约》和“摩西五经”。1537年出了两个新的版本，但是没有一个版本得到官方认可；事实上，1542年科弗达尔的《圣经》已经被列在禁书单上了。

1538年12月科弗达尔在日内瓦，参与“日内瓦《圣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虽然他还没有得到过英语《圣经》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这一机会终于来到了。1539年，托马斯·克伦威尔委托他编辑“马太《圣经》”，出版亨利统治期间英格兰最具权威的本。

科弗达尔除了翻译《圣经》，还以许多方式向宗教改革运动提供支持与帮助。第一，虽然《六条法令》谴责教士结婚，但科弗达尔无视该法律，公开与伊丽莎白·马奇森结婚。第二，1548年10月，当克兰麦在草拟《公共祷告第一书》时，他正在温莎堡，他为这项工作助了一臂之力。第三，他热心于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的改革措施。第四，他经常出席国会会议。（从1551年到1553年他一直担任埃克塞特主教的职务），第五，他是一个积极主动打击重洗派运动的人，这个运动在当时被认为有害于宗教改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是一个特别有恩赐的讲道者。（在四旬斋的第二个星期日，一个重要的场合上，他在圣保罗大教堂讲道，主张正式废除名目繁多的祭坛和弥撒；在他的讲道之后，大祭坛立刻就被推倒了。）

1553年，玛丽登上王位，科弗达尔失去了他的主教职位。他被传讯到枢密院受审，但是由于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三世的求情而免于火刑，准许他“带两名仆人”去欧洲大陆（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当伊丽莎白于1558年即位时他返回英格兰，在伦敦桥地区讲道，每次都吸引了大批的人群。他1568年2月去世，埋葬于圣马格纳斯教堂的墓地。

## 玛丽的第一个受害者——罗杰斯

玛丽继承王位以后，很多宗教改革领袖逃往欧洲大陆，但罗杰斯铁了心要为改革献身。不久，他被逮捕，六天后被行火刑。

爱德华·邦纳主教，英格兰新教徒的逼迫者。



今天，一些人认为“马太”在当时只不过是与《圣经》翻译相关联的一个无恶意的笔名，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使用这个名字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为要欺骗当局，使得书能够在黑市上流传。当廷德尔违法秘密散发《圣经》时，他没有用笔名。人们以后了解到，“马太《圣经》”与约翰·罗杰斯有关。

大约于1500年，罗杰斯出生在伯明翰城附近。他在剑桥的彭布鲁克大学接受教育，于152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在学习期间他显然没有被波及整个大学的振奋人灵魂的事件所影响。1532年，他成为伦敦王后小港圣三一教区的教区长。两年后，他接受了一个职务，做了在安特卫普做生意的英格兰商人的牧师。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与威廉·廷德尔接触。

廷德尔对罗杰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友谊是短暂的。罗杰斯离开天主教，与安特卫普的一个女人结婚，廷德尔如此绝对地相信罗杰斯，以至于把自己所有未出版的译著都交给他妥善保管，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罗杰斯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改变。廷德尔已经将《旧约》翻译到《历代志下》，但是，从“摩西五经”以后一直没有出版。翻译必须完成，必须出版整本《圣经》。

约翰·罗杰斯是否懂得足够多的希伯来语来完成翻译工作，这一点还有疑问。



《旧约》后半部分与“科弗达尔《圣经》”的后半部分相似，似乎表明是科弗达尔负责完成了《旧约》的翻译。看来当时精心编造了一个托词，为了隐藏来源而编纂了

廷德尔译本。翻译好的《圣经》，以托马斯·马太为笔名，仅仅在廷德尔去世后一年，于1537年出版。

译稿交给了理查·格拉夫滕去出版，他是安特卫普的商人，他感到必须去英格兰，将一个抄本呈交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试图得到用英语出版的许可。克兰麦审查了这本书，印象非常好，但是，他感到自己不是请求国王许可的最好人选。于是他请托马斯·克伦威尔将它呈上，让他从亨利八世得到许可。他所请求的许可是短暂的：许可期只是到主教们能够翻译出更好的译本为止——克兰麦暗示：这“不会到世界末日后的一天。”国王拿起书，看了一遍。在《玛拉基书》的结束处，罗杰斯蚀刻了大写字母W.T.，代表“威廉·廷德尔”。字母写得很大，覆盖了整整半页，但是，或者国王的手指翻的时候跳过了这一页，或者他没有很好地看这些大写字母，或者他的思想过于迟钝想不到它们的意思，就他所知，廷德尔的名字与《新约》毫无联系。这本书使国王陛下很开心，亨利认为它对于削弱罗马对英格兰的控制可能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他把书还给克伦威尔，给予准许，只要克伦威尔得到克兰麦的同意！克伦威尔成功了，这一版印了1,500本，作为第一个“钦定”版本在英格兰出售。根据扉页上所写，它的出版“是根据国王的最高恩准”。

这是英语《圣经》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天。“马太《圣经》”存留的时间不长，但它为后来的版本与译本铺平了道路。在获得国王的授权认可上科弗达尔失败了，但是“马太《圣经》”却成功了。

罗杰斯在维登堡任新教徒会众的牧师达几年之久，于1548年返回英格兰。于1550年他事奉于伦敦的两个教会，第二年成为圣保罗教堂的受俸牧师。在对他的才能进行了简短的审查以后，他成为神学的讲演者。

当玛丽成为君主时，许多宗教改革的领袖逃到欧洲大陆，但罗杰斯很倔强、铁了心要做一个完全献身的改革者。1553年7月27日，他在圣保罗教堂讲道，题目为“在爱德华国王的日子所教导的真正教义”，并且告诫他的会众绝不可倒退到“可恶的罗马天主教教义”上去。十天后，他被逮捕，关在地下室。

1554年1月，伦敦的新主教邦纳将罗杰斯送到纽盖特监狱，和约翰·胡伯以及约翰·布拉德福德一起关在那里。他在纽盖特监狱监禁了12个月。1555年1月22日他被带到臭名昭著的宗教改革迫害狂加德纳的家中。六天以后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由

红衣主教波尔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会上加德纳因为他否认罗马教会的基督性质，以及拒绝接受主的晚餐上饼与葡萄酒转变成了基督真正的身体与血，于是判处他死刑。六天以后，1555年2月4日他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行火刑，成了玛丽统治期间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他的同监难友布拉德福德说：“他勇敢地打破了坚冰。”

## 带锁链的《圣经》

新《圣经》体积很大，为了方便更多的人阅读，只得把它用锁链锁在阅读台上。

“马太《圣经》”越来越普及，但它的注释有很多强烈反天主教的内容。因为这个版本是官方许可的，这些脚注使得克伦威尔在处理涉及天主教国家的微妙的外交事务时，感到窘迫。因此克伦威尔认定，必须有另一本《圣经》来代替“马太《圣经》”。

在得到国王准许以后，克伦威尔委托科弗达尔和出版商理查·格拉夫滕，修改“马太《圣经》”的版本，删除脚注。为了加快工作的速度并提高印刷质量，克伦威尔安排在巴黎印刷，在巴黎有更好的纸张和更先进的印刷机器。法国的查理一世同意了，因为这批《圣经》用的是一种他的人民所不懂的语言，并且将立刻装船运出法国。在1538年春末，科弗达尔与他的助手到达巴黎，选定弗朗西斯科·雷格诺尔特为印刷商。

12月13日，科弗达尔和格拉夫滕因为担心宗教法庭再生枝节，说服了英格兰大使邦纳将大部分印好的书页带给克伦威尔。或许是因为宗教法庭的干预，或许是查理一世改变了主意，工作停了下来，修订者为了活命不得不出逃。他们遗留下的书页被宣告为非法，在莫尔伯特广场焚烧。然而，一名英格兰服饰商，借口他需要纸张填充他的帽子，买下了一些书页。另一些代理人夜间用离奇惊险的方式偷走了印刷机、所有的铅字，甚至字模，并全都运到伦敦。1539年4月，整本《圣经》完成了，编辑们加上了这样的话：“成就归于主。”

因为工作是在国王的赞助下进行的，就没有举行奉献典礼。9×15英寸的页面，没有脚注。扉页是由霍尔拜因创作的艺术木刻，生动地讲述了王权至高的故事。《圣经》不是由教会，而是由国王给予公众，通过教士散发给人们。



扉页上写着：“本英语《圣经》，要讲述包括《旧约》与《新约》在内的全部《圣经》的内容，是根据希伯来文本与希腊文本真实地翻译出来的，供汝等杰出、有学识、精通本国语言之人勤勉研读。由理查·格拉夫滕与爱德华·惠秋奇印刷……1539年。”

在两年之中，出售了20000本（包括另一旧版本的“马太《圣经》”，其脚注经修改已不那么尖锐，1539年由牛津学者塔弗纳出版）。克兰麦裁定该《圣经》“不含有任何异端”，国王也发布公告命令全国每一个教区教会买一本这样的《圣经》，放在阅读台上让公众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阅读。那些自己不能阅读《圣经》的人，必须安排别的人读给他们听。阅读《圣经》曾经被禁止，尔后悄悄地得到宽容，然后是得到允许，现在是得到命令，这要归功于托马斯·克伦威尔。



马太·帕克大主教 (1504-1575)

由于新的《圣经》体积很大，所以被称为“大《圣经》”。它有时也被称为带锁链的《圣经》，因为它们被锁链锁在阅读台上，方便更多的人阅读；或者被称为克兰麦《圣经》，因为克兰麦在1540年的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精心撰写的序言。到1541年底，已经再版了不止七次。

虽然这本《圣经》是以“马太《圣经》”为基础的，但“马太《圣经》”又是以“廷德尔《圣经》”为基础的，所以它是廷德尔的纪念碑。“大《圣经》”作为英语《圣经》使用了20年。廷德尔在外国的土地上被烧成灰烬，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大《圣经》”都是他劳动的成果和他人生的纪念碑。

## 三个重要版本

在英语《圣经》的标题上必须有日内瓦这个词，看来是件奇怪的事，然而这是事实。在它的后面有一个故事。1543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发展真正宗教”的法令，撤销了除“大《圣经》”以外的其他版本《圣经》的使用许可。这个法令特别规定廷德尔的著作为非法，以后的法令又增加规定了威克里夫与科弗达尔的著作为非法。“廷德尔《圣经》”“被完全彻底废除，严禁保存或使用”。但是亨利八世于1547年1月28日去世，年轻的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加冕礼上，在把象征国家统治权利的三把剑授予他时，他问道，第四把剑在哪里。他手下的贵族们问他什么意思。“《圣经》”，他回答说，“圣灵的宝剑，比其他的剑更加重要。”在爱德华统治期间，至少出版了13版《新旧约全书》和35版《新约》。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引进了《公共祈祷书》，并出现了英国国教的《四十二条》教规，以后减少为《三十九条》。

但是，我们知道，1553年7月，“血腥的玛丽”登上王位，她的丈夫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是宗教法庭狂热的拥护者。当玛丽禁止公开使用《圣经》时，开始出现向欧洲大陆移民，特别是移民到加尔文所在的城市。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教长们和主教们，包括迈尔斯·科弗达尔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使日内瓦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伦敦。

“惠廷汉《新约》”



1557年，英语《新约》的新译本在日内瓦出现了。这是一个名叫威廉·惠廷汉的人翻译的，他是加尔文的连襟，1559年他接替诺克斯任日内瓦英国公会牧师职位。他的《新约》是廷德尔的修订版，上面有加尔文所写的引言，是给那些“一部分已经在羊栏里，一部分因无知还在外游荡的糊涂的小羊们”读的。它目的是要使用日常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而不是使用从拉丁语衍生出来的文学词语。于是，比喻是“biword”，重生是“gainbirth”，钉十字架成了“crossed”。

惠廷汉的《新约》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在英语《圣经》中第一次划分小节。1551年在巴黎与里昂之间旅行时，印刷商罗伯·特埃蒂斯安在他的一个希腊《圣经》版本中仓促地分了小节。有些划分是有问题的。一位《圣经》历史学家说：“我想如果他当时关上房门，跪下来，那这项工作说不定会做得更好。”然而，虽然这些划分受到批评，但全世界一直都在使用它们。

惠廷汉的第二个革新是使用不同的字体来表明有些词在原文中是不存在的，是在翻译中加进去的。这个做法被1611年的钦定本所沿用。惠廷汉的解析与注释非常广博，以至于这个版本一直被称为“第一个评论性的英语《圣经》版本。”

当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者在等待国内政治局势改变的时候，他们“除了将《圣经》翻译成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之外，想不出更能让神接受，令神的教会感到欣慰的事”。他们翻译出版的《圣经》被称为“日内瓦《圣经》”，于1560年印刷出版。

### “日内瓦《圣经》”

翻译出版“日内瓦《圣经》”的人员包括约翰·诺克斯、迈尔斯·科弗达尔、威廉·惠廷汉，以及其他不太著名的权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非常虔诚和有学识的人”。他们需要学者帮助时，约翰·加尔文与狄奥多尔·贝泽便呼之即来，这些人还接触到其他好几种外语的译本。说实在的，他们的资料比以前任何翻译人员所能得到的资料都要多。他们认真地研究经文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要在所有的参与者中达成一致，因而得到了非常忠于原文的译本。他们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译本在当时十分完美，以至于不再需要修改；翻译的方法也很好，以后翻译钦定本的委员会也采用这种方法。

这本《圣经》由于它把“创世纪3章7节中的“裙子”译成了“马裤”，而被称为“马裤《圣经》”；译文中该节经文说亚当与夏娃把无果树叶子编成“马裤”。译文也包括页边注解。虽然有些注解倾向于加尔文的神学，有些注解有强烈的反教

皇的倾向，但是大多数注解只是解释性的注解。该《圣经》是为个人使用而设计的，不是为在教堂里朗读，因此，它采用了适中的四开本，这样使得它便于携带。

虽然“日内瓦《圣经》”不曾被批准在英格兰公开使用，但它大小合宜、方便，因而很快就成为家庭版《圣经》。当1644年的版本出现在英格兰时，也就是钦定本出版33年以后，它已经出了140多版。它尤其是清教徒的《圣经》，所以也成为了英联邦军队的《圣经》。士兵们不携带全本的《圣经》，但是他们有一本袖珍读物，摘自“日内瓦《圣经》”。这是清教徒前辈移民专门使用的《圣经》。“日内瓦《圣经》”也被用来作为在苏格兰印刷的第一部《圣经》，印刷后被称为“巴森达恩《圣经》”（1679）。国会要求每一个有一定收入的户主要备有一本《圣经》。1580年6月，一个叫做约翰·威廉逊的人被委派去访问调查每一户人家，“要看一看他们是否有《圣经》与诗篇书，如果他们有，就要在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要写上名字就使得人们不可能从邻居那里借一本来应付应付！

## “主教《圣经》”

在伊丽莎白加冕典礼的队列蜿蜒行进在伦敦的街道时，有一个人拿着一把长柄镰刀，身着翅膀，象征时间老人，他带着他的女儿，象征着真理。女儿捧着一本英语《圣经》，上面有着题词“真理的话语”。她把《圣经》献给女王陛下。伊丽莎白女王很高兴接过来，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并保证她会“常常阅读这本书”。

1559年，伊丽莎白颁布了一条法令，就如同爱德华六世以前所做的，法令要求每个教区里必须备有“一本篇幅最大的英语《新旧约圣经》”。她这一做法大大取悦了她的臣民。第二年，她允许将一本印刷的英语“日内瓦《圣经》”献给她。

1586年，又出现了一本宗教改革的《圣经》。这本《圣经》有时被称为廷德尔译本的第四次修订版。它的出现是因马太·帕克的极力主张。他曾是安妮·博林的私人牧师，1544年由于亨利八世的推荐，他被选为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的院长。当安妮·博林被处决时，她把她年轻的女儿伊丽莎白交给他照管；1559年8月1日，当时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帕克认为，由于“日内瓦《圣经》”的成功不仅破坏了英格兰官方《圣经》——大《圣经》的威望，而且削弱了主教的权柄，所以需要有一本新的《圣经》。1564年，他组织了一个大约八九个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在他看来，这些人在神职人员中是最有资格的。委员会决定另出版一个“大《圣经》”的修订版，重新树立它的威



望。他们的修订版被称为“主教《圣经》”。

帕克把“整本《圣经》分成几个部分”，让他的翻译人员去“仔细阅读并校对”。他说他们必须“仿效教会使用的普通英语译本，不要改动，但明显不同于希伯来原文或希腊原文的地方要修改”。他们不得“在文本上做任何尖刻的注释”，也不允许他们“在有争论的地方作出任何结论”。

有关历史的部分，主教版本仿效“大《圣经》”，然而其他地方它却表现出明显地受了“日内瓦《圣经》”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翻译人员有意地限制他们仿效“日内瓦《圣经》”的篇幅——毕竟他们不能从那个版本得到太多的好处。有的人说，这样做降低了它的准确性。1574年的版本对注释文字加以特殊标明，这样读者在公众面前读的时候可以选择避开它们。

为了提高印本的质量，使用了最厚的纸张，以及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印刷设备。这部《圣经》包括了许多木刻画，对圣地的描述，以及圣保罗的旅行图。封面上有一个简单的标题“圣经”，标题下面是拉丁语的《罗马书》1章16节经文。扉页上有伊丽莎白的雕刻画像。在《约书亚记》与《诗篇》的开头有莱斯特伯爵与塞西尔伯爵的肖像。

大量的木刻，使得这部《圣经》价格昂贵，也很笨重。此外，学者们对这个译本并不满意。各个部分由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翻译，因而形成不同的风格，但是译完后，没有人把整个译本协调一下，使之和谐起来。



### 英语《圣经》年代表：

#### 手抄本《圣经》

1384年 威克里夫译本（译自拉丁语《圣经》）

1396年 珀维修订版

#### 印刷本《圣经》

1525年 廷德尔《新约》

1530年 廷德尔《旧约》

1534年 廷德尔《新约》（修订版）

1535年 科弗达尔《圣经》（译自拉丁语《圣经》、路德《圣经》、  
茨温利《圣经》）

1537年 马太《圣经》（以廷德尔《圣经》为基础）

1539年 塔弗纳修订版（以马太《圣经》为基础）

1539年 大《圣经》（以马太《圣经》为基础）

1557年 惠廷汉《新约》

1560年 日内瓦《圣经》

1568年 主教《圣经》

1582年 兰斯《新约》（以拉丁语《圣经》为基础）

1610年 杜埃《圣经》（《旧约》部分以拉丁语《圣经》为基础）

1611年 钦定本

1881年 《新约》修订版

1885年 《旧约》修订版

1901年 美国修订版（以前的“修订版”为基础）

帕克认为，他会因他的努力得到女王的欢心。1568年10月5日，一个译本的抄本已经完成，抄本准备由国务秘书威廉·塞西尔爵士呈交女王。帕克写信给他，要求得到女王的准许，让它作为惟一在教堂中公开朗读的版本。然而，尽管帕克在女王面前很得宠，但是她一直没有同意他的请求。1571年的法规这样规定：“每一个大主教与主教的家里都应该有一本最近在伦敦印刷的、篇幅最大的《圣经》。”但是，这里所指的《圣经》是“大《圣经》”。在教会中必须公开朗读“主教《圣经》”的1573年教令，是帕克自己颁布的，没有王室的认可。

“主教《圣经》”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虽然它存在了40年之久，并且出版了20次，最后一次出版是在1606年，但是它被认为是宗教改革期间翻译的《圣经》中最差的版本。





## 第六章 英国的圣经和美国的圣经

### 伊丽莎白双刃剑

伊丽莎白登基后，一方面剥夺了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甚至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对宗教改革的要求也置若罔闻……

伊丽莎白登上王位，前任玛丽女王所用的天主教治理方针就突然终止了。伊丽莎白在政权稳固之前，面临着两个从国外来的威胁。这两股势力都与信仰有关，而且又是极端对立的。

一个是天主教的威胁。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教皇都希望看到天主教在英国复辟，许多有影响的王室也希望英国另立一位信天主教的君主。然而，想要推翻她的威胁反而增加了公众对她的支持。

另一个威胁来自为躲避玛丽女王的逼迫而逃亡欧洲大陆的英国宗教改革者。如今他们回国，倡导更加严谨的道德观，主张改革神学，呼吁实行新的教会管理体制。这运动的特点，首先是出于日内瓦的影响，这些回国的流亡者深受马丁·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革者的影响，不满英国教会在洗礼和圣餐礼上的做法。他们还提倡加尔文的教会管理思想，其基础是教会权力在国家之上，实行长老制集体管理而不是主教专权。人们尽一切所能，希望调和主教权力制和长老制，但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可整合的。伊丽莎白认为，任何对主教权力的攻击，哪怕是来自国会的，都是对君权的威胁。她认为，如果平信徒可以控制主教，他们不久就要控制她了。

这种强硬的新教观点很快主导了学术领域。大量的宗教改革神学著作出版，地下出版物在剑桥随处可见。当时加尔文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基督教要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剑桥培养新一代神职人员的教科书。到伊丽莎白统治的中期，在牛津也是同样的状况。由于所有的神学家和讲道者都是在牛津或者剑桥接受教育，所以新教的思想很快就支配了英国的讲坛。

新教的思想也渗透到家庭之中。如我们所知，官方赞同使用的“大《圣经》”（以及后来的“主教《圣经》”），目的是用于教会，也是为了借着教会支持国家。但





是“日内瓦《圣经》”体积小而且便宜，成了人们家中的《圣经》。它的注解和评述直接将加尔文神学的影响带给了百姓。绕过了（国家的）讲坛，从而削弱了女王对臣民的思想控制。

改革运动在英国教会取得了进展，却威胁到伊丽莎白对教会的控制。运动的追随者，被称为“清教徒”，他们对任何带有罗马天主教色彩的东西都感到气愤，如穿着祭袍（其实，是指任何神职人员所穿的特别衣着）、跪领圣餐、婚礼上戴戒指的仪式、施洗时划十字等。对于清教徒提出废除这些东西的要求，伊丽莎白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

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发布敕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废黜她的王位，并要求法国和西班牙执行他的敕令。这等于向女王宣战，敕令还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徒抵制她的权柄。从1574到1581年，大批天主教宣教士从法国涌入英国。耶稣会教士卷入了冲突。他们策划暗杀伊丽莎白，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推上王位。为此就需要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所有自称为天主教徒的，所有被怀疑对天主教不忠心的人，都被逼宣誓效忠玛丽女王，任何否认玛丽女王有权登上王位的人都被判叛国罪。局势因此逆转反而对教皇不利，迫使他的臣民冒生命危险起来反对他的权势。1571到1606年，通过一连串的法令，教庭剥夺了天主教徒的信教自由，甚至剥夺了天主教徒普通的公民权利。大约有200名天主教徒，包括神职人员、平信徒、妇女被处死。这样一来加强了伊丽莎白对教会的控制，反过来也使清教徒的抱负受挫。

不满现有教会的清教徒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企盼英国国教改革进一步发展，另一派是独立派或分离派，他们看出英国教会不可能令他们满意，因此就在他们自己建立的独立的教会中寻求敬拜的自由。

16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些小册子具假名“马丁·马普里雷特”面世，引发对国教权威新的敌视局面。这些小册子称主教为“属肉体的魔鬼”，称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坎特伯雷别西卜”或“坎特伯雷该亚法”。这些极端的清教徒由托马斯·卡特赖特（公元1535 - 1603年）领导，小册子是从他们那里流传出来的。他们当中有些人拒绝宣誓效忠（玛丽女王），宁愿入狱。因为要求宣誓效忠本来是针对天主教徒制定的。



## 天主教徒的回应与“杜埃《圣经》”

英国的天主教徒需要有他们自己的英语译本来回应新教徒，而不是阅读带有新教解释的《圣经》。

即使对欧洲的教皇忠心的天主教徒也清楚地认识到，天主教有必要革新。作为革新运动的一个部分，特兰托大公会议在意大利的特兰托召开，这个大会后来被称为反宗教改革会议。1545年至1563年间，大会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解决教会的合一问题（在皇帝查理五世等人看来，教会的合一与政治的合一是不可分的。），并且制定信条。

会议在平信徒使用《圣经》的问题上态度强硬：“《圣经》虽然被真实地、普世性地翻译成各种普通百姓的语言，但不可以不加区别地让所有的人都读。教徒必须先从规定的教区主教那里得到特别许可，并由该教区助理神职人员和告解神甫（听忏悔的神甫）做见证，证明是谦卑、端庄、有奉献心志的人，而且是愿意多多行善，不愿行恶的人才可以读《圣经》，否则不准许阅读。”换句话说，买《圣经》需要教士的许可，读《圣经》需要到忏悔室认罪。

但是新教徒已经渐渐熟悉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所写的《圣经》，并引用《圣经》来捍卫教义。天主教徒需要装备自己来回应新教徒。英国的天主教徒需要他们自己的英语译本，而不是阅读带有新教解释的《圣经》。

当年玛丽·都铎登上王位时，很多宗教改革者移民离开英国，到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之时也有许多天主教徒移民。负责翻译天主教《圣经》的三个人就是从牛津出走的避难者。他们当中最重要的是威廉·艾伦，一位出色的神甫，曾在玛丽统治期间任约克郡大教堂的教士。人们相信，如果当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了英国的话，威廉·艾伦就会被任命为全英国的大主教。

1568年，艾伦去了法国的杜埃，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几年前在那里建了一所大学。艾伦决意在杜埃建立一所学院来培训英国的天主教徒，那里已经有了爱尔兰学院和苏格兰学院，旨在储备教士，以后一旦有机会就立即接管英国的教会。艾伦鼓励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乔治·马丁从事翻译工作。马丁又介绍了罗伯特·布列斯托参与，页边注解与脚注主要是布列斯托做的。

1578年，由于政治上的动荡，艾伦把学院从杜埃迁到了兰斯。1593年，出于同样的原因，学院再度迁回杜埃。《新约》和《旧约》的出版相隔近28年。1582年，《新约》完成，在兰斯出版。《旧约》由于“缺少好的方法”，而修订者又“在流放



中处境艰难”，直到1609—1610年间才完成。因为最后是在杜埃出版的，所以全本《圣经》被称为“杜埃《圣经》”。

“杜埃《圣经》”是译自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该版本曾受到圣奥古斯丁的称赞，并在特兰托会议上被宣布为可信的版本。我们已经了解，罗马教会认为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是原文《圣经》的最纯正的译本。翻译者认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文稿已经被犹太人和初期教会讹误。这个译本的翻译参照了一些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本文，但是在译本中甚少能够看到原文的痕迹。据翻译者自己承认，它是“根据权威性的拉丁文的文本翻译过来的，并仔细参考了希伯来文、希腊文，以及其他不同语言的版本。”使用原文版本，是为了“发现以后翻译的不同版本的错误。”“杜埃《圣经》”与其说是原文文本的译本，不如说是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的修订本。

“杜埃《旧约圣经》”有50卷书，包括11卷次经。《诗篇》的译文更加偏离了希伯来文的原文，因为哲罗姆是根据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翻译的。因此，《诗篇》最初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以后又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现在又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杜埃《圣经》”用注释来强化天主教的解释和信条，抵挡“加尔文及其追随者虚假的光彩”，马丁·路德甚至说这英文的《圣经》“实际上不是神的书，神的话，不是《圣经》，而是魔鬼的话”。然而除了脚注与宗教改革者的脚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外，译文的内容同新教的版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它的文字更加刻板，语文学趋于拉丁化，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不大容易理解，但是它对钦定本的翻译者有一定的影响。

## 王冠上的宝石——牛津版和剑桥版《圣经》

1762年钦定本的剑桥修订版和1769年牛津《圣经》，这两个版本被认为在设计和制作上都臻于完善。

伊丽莎白女王没有子嗣，随着她的去世，都铎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成为英国的下一任国王。他与母亲不同，从小就在强烈的新教信念中成长。清教徒运动的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苏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约翰·诺克斯领导的，完全实行长老制。詹姆士还没有去伦敦即位，就有





THE  
HOLY  
BIBLE,  
Conteyning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Newly Translated out of the Originall  
tongues: & with the former Translations  
diligently compared and reuised, by his  
Maiesties speciall Comandement.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  
Imprinted at London by Robert  
Barker, Printer to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iestic.  
ANNO DOM. 1611.*





一个代表团来见他，向他呈上《万民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有800多位清教徒神职人员签名，要求废除坚信礼，终止施洗时作十字架的记号，免去婚姻中戴戒指，并删除国教祷告书中“僧侣”、“赦罪”等词语。请愿者向国王保证，他们并不想结束这个国家性的基督教会，只是要求实行改革。

请愿活动促使1604年举行汉普顿宫会议。会议由詹姆士六世亲自召集，处理“在教会中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第一次会议于1604年1月14日召开，但是公认为清教徒领袖的约翰·雷诺博士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雷诺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人们形容他是“英国的第三所大学”。但他1月16日还是同与会者见了面，他从“主教《圣经》”未能完成任务为话题，重申伊丽莎白时代的主教们认为，没有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适合大众阅读（“日内瓦《圣经》”除外，但它的注释值得怀疑）。“大《圣经》”过于笨重，“日内瓦《圣经》”被加尔文派的注释搞糟了，“主教《圣经》”的质量太差。因此他的推论无可逃避：若不尊“日内瓦《圣经》”为英国钦订的权威版本，必须着手翻译更好的译本。

后一个建议迎合了国王的虚荣心。1604年7月22日，詹姆士六世宣布，他已经指派了一个54人的班子，在理查·班克罗夫特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圣经》的新译本。班克罗夫特是伦敦主教，即将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是一位高层的国教神职人员，对清教徒的目标没有好感。这项工作拖了将近三年才认真地开始。此时仅有47位翻译人员被提名，但是这些人却代表了英国知识界的精英。

汉普顿王宫，1604年会议在此召开，钦定本圣经诞生于此。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他的名字因“詹姆斯国王版本”（钦定本另一英文名称）而流芳百世。



他们订立了14条原则作为工作指导。翻译将根据“主教《圣经》”为蓝本，与希腊文原文和希伯来文原文保持一致的地方尽量不作改动；其他的英文译本，只有是更加准确的地方才可以参照；章节不在绝对必要时不作改动；先前的教会用语保留不变（如“教会”优先于“会众”）；一律不用页边注释，除非用来解释那些译文不足以表达清楚的希伯来和希腊词语（有趣的是，这些页边注释在先前的版本中有9000多条，但是后来增加到60000条以上）。

修订者中有精通希伯来文的学者和精通希腊文的学者。他们分为六个委员会，两个在牛津，两个在剑桥，两个在威斯敏斯特。每个委员会负责翻译《圣经》中的一个部分，翻译好的各个部分送交一个由1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审阅，这委员会是由上述六个委员会各自选出两位代表组成的。最后的定稿由托马斯·比尔逊和迈尔斯·史密斯二人把关。然后将手稿送到国王印刷所的罗伯特·巴克手中。

《旧约》是根据马索拉（希伯来文）的版本翻译的，该文本是以多种语言对照本的形式于1514—1517年印刷的。这个版本集合了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版本，并排排版。翻译人员还参照了一个较新的、1572年印于阿姆斯特丹的多种语言对照本，以及其他近期学者的一些拉丁文版本。《新约》的翻译，是根据从1550年以来由埃迪安纳和贝泽在日内瓦出版的、较关键的希腊文的文本。

这个《圣经》版本之所以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译本，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它不是一个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可以避免一个人的不足和盲点，它是六个委员会的集体劳动结晶，这些委员会是由当代最有学识的学者组成的。第二，从前一次的翻译到那时的40年中，人们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方面的知识有极大地增进。第三，当时是莎士比亚、斯宾塞、马洛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所呈现出的诗词与戏剧的繁荣，产生了这个版本的《圣经》，它成为了英国文学的杰作。

遗憾的是，第一版出现了印刷上的错误。事实上有两个1611年的版本，两版本之间却有成百上千的差异，而1613年的版本与1611年的版本比较，又有多达400处的不同，所以这些需要大量的修订，因此约翰·赖特福特博士提请下议院考虑“对这本《圣经》再做仔细地校订和勘定”。据报道，英国与外国圣经公会的一个委员会审查了六个版本的钦定本，发现在正文和标点中有近24,000处的不同。1762年钦定本的剑桥修订版在正文及页边注释中引入了383处修正；1769年“牛津《圣经》”在度量衡及钱币上引进了76项修正。这两个版本被认为在设计和制作上都臻于完善。

威廉·布雷德福德，庚斯博罗分离主义教会的成员。



## 布鲁斯特的英雄故事

为逃避迫害，得到敬拜的自由，威廉·布鲁斯特率领追随者走上逃亡之路，他们被称为“美国清教徒之父”。

从伦敦到爱丁堡的路上，距伦敦以北146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斯克鲁比的村子。根据英格兰土地勘查纪录书，村中主要庄园曾一度属于约克郡主教的产业。当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这所庄园成为旅客歇脚的地方，并设有皇家邮政局的邮站。

1570年邮站的站长是布鲁斯特先生。他的儿子威廉·布鲁斯特于1580年12月3日考入剑桥大学。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学什么，但我们知道他改信了清教徒的教义。





波士顿法院，关押那些朝圣者的地方。

1583年正当威廉·布鲁斯特在家时，威廉·戴维森为了女皇的公事到了庄园。他在往爱丁堡的路上停了一晚，他的任务是要破坏法国特使尝试在法国与苏格兰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布鲁斯特当时只有16岁，但被他们的对话深深地吸引了，他说服了戴维森收他为助手。工作让他有出国的机会，又让他认识一些重要的人物。戴维森于1585年在法兰西斯·韦星翰爵士手下出任外交部长。

若非遇到一件意外，布鲁斯特很可能爬上了政治舞台。1587年伊丽莎白女王的桌子上有一张已拟定好捕捉苏格兰玛丽王后的命令，正等着她签署。她犹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当戴维森在场时她很快就签了名，亲手交给他，由他主持拘捕工作。后来，但当她知道玛丽皇后被处死后，她却下令捉拿戴维森，说他“越过”了她的指令。陪审团罚他6666英镑（后来也免了），他坐了18个月的牢。他的倒台使威廉·布鲁斯特失业了，他只好回到斯克鲁比村去。

1590年的夏天，威廉23岁，他的父亲死了，经过一段波折威廉被指定顶替他父亲的职责。

同年，3里外有一个孩子诞生了，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威廉·布雷德福德。后来布鲁斯特与威廉·布雷德福德建立了终身的友谊。1602年他们开始走12里路到庚斯博罗去参加北方第一所分离分子的教会作礼拜。他们在旧大厅聚会。这所教会刚请了在剑桥受教育的约翰·史密斯做牧师。

另外罗伯特·布朗在定居诺里奇之前也曾在剑桥受教育。他强烈地批判国教的命令，他相信各地教会应当分别独立，只向本地的会众负责。他是公理教会的创办人。史密斯与布朗之间并没有联系，在庚斯博罗的会众后来被称为“布朗主义者”而受逼迫。到了1606年史密斯和几位会众被逼迫放逐逃亡。他们逃到阿姆斯特丹，史密斯当了一位医师。他们离开之后，布鲁斯特邀请余下的会众到他的主屋继续聚会。因没有牧者，布鲁斯特成为他们灵性上的导师。

约翰·罗宾逊是这新会众之一。他曾在诺里奇当过牧者，诺里奇是布朗主义的发源地，他为了个人的安全才逃出来。他的出现使新会众受更多的猜疑和逼迫。很多会众失去房地产，缴纳大笔罚款，并接受严峻的监禁处罚。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或会审的机会”。他们很快看出，要保持敬拜的自由，他们必须逃亡

移民非常困难，因为自从理查二世开始，移民必须得到批准，因此出国只能秘密安排并且价格昂贵。更糟的是1607年9月15日政府发传票捉拿布鲁斯特。官兵正到处搜捕他。

这群逃亡者与一位荷兰的船长商议好在波士顿城外靠近费希托夫特的沼泽地带



会合。他们搬好行李，连家人都上了船，只待潮水上涨即可启程了。不料被一群法警包围，这些官员本来只负责收税的，却将男士洗劫一空，又粗野地搜女士的身，然后把他们带到波士顿的市政厅。七位领袖被囚在两个牢房中，有记录说威廉·布鲁斯特“身为领袖人物，遭受的损失也最大”。

因为部分记录已散失了，我们不知他们坐了几年的牢，何时重获自由。1608年初夏，他们再度尝试移民。这一次一位荷兰的船长同意在波士顿以北60英里的亨伯河的河口相会。妇女和儿童坐小船去，男人走陆路。男人先到并上了船等候，不料官兵又来了。船长大惊，马上开船到大海，撇下妇女和儿童不顾。

官员大失所望又非常困窘，并且怕社会批评。因此放了妇孺，那年的冬天各家人在阿姆斯特丹得以团聚。这只是抓捕清教徒的第一幕，他们被称为（美国）清教徒之父。

## 看哪，陆地！

11月9日，在海中漂泊了九周之后，他们看见陆地了！

清教徒单单为了敬拜的自由而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和正常的生活，并忍受了生命的威胁。到了阿姆斯特丹他们加入一批比他们更早的移民群体之中，这时人数将达

荷兰莱登的运河。在迁移到美洲新大陆以前，布鲁斯特带领那群英格兰分离主义者来到这里。





百人。自由战士在阿姆斯特丹找到避难所，但生活却陷入困境。他们都来自农耕的生活，现在要在商贸交易的世界竞争谋生。这些朴实的土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完全诚实，努力工作并对罪恶十分敏感。此外，他们生活上的适应还包括了学习外语。

布鲁斯特等人在约翰·罗宾逊属灵的领导下在阿姆斯特丹过了一年，然后迁居到南方35英里外的莱登。在那里他们过着模范生活共七年之久。他们的人数增至300人，与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人数相仿。牧师被尊为大学名誉会员之一，他们的产品很受欢迎，并有其他商家来定货，教会中任何人若有需要，都可向银行贷款。几位英国流动商人如爱德华·温斯洛，托马斯·布鲁厄，约翰·卡弗和迈勒斯·斯坦迪什都投身加入他们的行列，甚至与他们横渡大西洋到新大陆。

到了1620年，情况表明他们必须再次迁移了。首先，有些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第二，他们的孩子有些被荷兰军队征兵，有些却被城市的诱惑征服。第三，很难避免融合进荷兰的社区。第四，他们的安全受到与西班牙战争的威胁。还有，他们再度受到逼迫的恐吓。布鲁斯特和托马斯·布鲁厄的著作传回英国，招致詹姆士一世想方设法引渡他们回国审判。

他们考虑移民到弗吉尼亚，因为弗吉尼亚公司的首席商家与布鲁斯特的交情好，但后来放弃了这种选择，因为公司的宪章要求绝对依从英国国教。例如，三次缺席每天举行的礼拜可以被判在船上划桨六个月，而三次缺席礼拜天的崇拜则可判死刑。若有任何违规之处，扣除工资及鞭笞是常见的刑罚。

后来清教徒接受了伦敦70位商家的建议向普利茅斯公司买下一块土地，让移居者有权组织政府自治。这家小公司的股份以10英镑出售。清教徒七年后要将他们所得的利润分给小公司的股东。在英国也有一小组人参加莱登的队伍，他们准备了两只船横渡大西洋——一只60吨的小快船，“捷安号”和由托马斯·琼斯统领的180吨的“五月花号”。“捷安号”先到荷兰接了清教徒再到南安普敦。

往美洲新大陆的旅程于1620年8月5日启程。在“捷安号”上有30名乘客，“五月花号”上有90名。与大逆风搏斗了三天之后“捷安号”开始漏水，只好泊进达特默思港修理。彻底大修之后，再度出发。这一次越过地角约300英里“捷安号”又漏了，两条船回到最近的港口普利茅斯。有18名乘客受惊过度决定留下，其余102名乘客挤上了“五月花号”冒险前进。

当年跨越大西洋的旅程非常惊险。例如，1619年3月自阿姆斯特丹教会出发，去往弗吉尼亚的180人中只有50人存活下来。过度拥挤及传染病夺去多数人的性

纪念“五月花”之航的纪念碑，立于英格兰波士顿。







命，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清教徒的首段旅程比较平静，但不久，强劲的风暴开始打击船身。船上一根主梁被扭歪了，幸好一位乘客有强力镙栓，用它固定了主梁。接连的风暴只威胁了一个人的性命。那是约翰·霍兰德，他冒险上了甲板，马上被大浪打入海里。他奇迹般地抓住了水中拖着一捆拉主帆的绳索，水手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拖回船上。在旅途中，塞缪尔·富勒的一个仆人去逝了，但有一个婴孩出生。所以，到达的人数和从英国出发的人数正好相等。

11月9日，在海上漂泊了九周之后，他们看见陆地了，但发现这并非普利茅斯公司管辖的区域。他们不知所措，因为这里并没有人主管。他们假设自己享有自由权，男士们聚合议定了“五月花协约”。有41位男士用布鲁斯特的皮箱当桌子签了合约。“五月花协约”规定签名者必须脱离原先的五月花团，自找留居的土地。

在起航离开荷兰代尔夫特之前，朝圣移民在祈祷。

## 绝处逢生

3月底的一个清晨，奇迹发生了。

“五月花号”在海港之外停泊了两周，驳运的小船被风浪击打不能再用。林木



茂盛的海岸就在清教徒面前，但风浪太大，他们无法靠岸。终于迈勒斯·斯坦迪什在11月21日带领第一个探测队上岸。迈勒斯是一位职业军人，驻扎在荷兰，并受普利茅斯公司聘请保卫公司财物。他受那些宁静和平的人吸引，但没有加入教会为会员，他一直保持了天主教徒的身份。他们在科德角上岸，这地方现称普洛文斯镇。他们回到“五月花”上报告说，除了与印第安人简短的接触以外，他们很乐观。

第二次探测在11月27日出发，由克里斯托弗·琼斯带领，他们发现了一只法国渔船的残骸。原来有法国人住在北面500哩的新斯科夏半岛，是他们最近的邻居。他们没有找到淡水，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海港。

第三次探测在12月27日出发，并测量了海湾的深度。他们在岸上找到了玉米林和一条小溪。当探测队回到“五月花”上的时候，威廉·布雷德听到恶讯，他的妻子竟失足堕海身亡。所幸的是“五月花”号可以驶进港口，他们漫长的旅途终于在到达新大陆后27天就算是结束了。

12月28日，星期一，他们决定了定居的地点，当日下午，20名男丁开始建立防卫墙。当晚受到突来的暴风袭击，风力极大，“五月花”将所有的三只锚都投入海中才稳住没有漂走。狂风过后，男丁开始伐木搬运木材。他们首先的工作是建造一座20英尺方形的公用大屋。然后，将团员分配在19个家庭中，单身汉分别编入各家庭中居住，以减少建房的数目。他们首先划定一条街与小溪平行（这街自1823

朝圣移民前辈在美国登陆：首先上岸的是约翰·奥尔登和玛丽·吉顿。







年起被称为莱登街)，然后分配各家的园地。

由于“捷安号”的迟延，加上大西洋的暴风，清教徒没有好好准备过严冬。他们不得不将第一幢房子改为医院，疾病迅速蔓延，以致没有足够的健康者来照顾病人。很多人死亡，有时一天有两三个，大多数妇女葬在扣尔斯山上。到二月底他们埋葬了31个会员。最初的两个月中几乎有一半人死亡。

到了3月中旬，中午的太阳开始变得温暖，鸟儿也开始歌唱。严冬终于过去了。狼在晚上仍然嚎叫，在白日四处觅食，但他们担忧的不是狼，而是不时出现的印第安人。迈勒斯·斯坦迪什受命组织武装队，他将“五月花号”上的五尊大炮搬来，布署在俯视村庄要道的福特山的高台上。3月底的一个早晨，奇迹发生了。

居留者正准备在公用大屋开会，居然有一个印第安人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热诚地大声用英语高喊“欢迎”！他们不清楚来人是谁，阻止他进入公屋。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萨莫塞特，他带来了好消息。他答应星期四要带一位叫斯昆土的印第安人来与他们见面，果然星期四两个人都来了。斯昆土能操流利的英语。他是1614年被名叫托马斯·亨特的海盗绑架的24个印地安人之一，被卖到西班牙做奴隶。斯昆土逃脱了，并辗转到了英国，后来为纽芬兰公司的财政长官工作。当他回到故乡时，才发现他是全族惟一的幸存者。

斯昆土介绍清教徒认识印第安人的酋长马萨伊特，酋长带着60位勇士而来。斯坦迪什和奥尔特顿也带了6位配着毛瑟长枪的人，遵照隆重的仪式，严肃地来到预约的地点会见马萨伊特和他的勇士。这印第安酋长的脸涂满深红色的颜料，勇士的脸有红、有黑、有黄，还有白的。会议非常友善亲切，他们商议了和平共处的合

1620年，朝圣移民前辈在登陆后感恩。





普利茅斯岩石，麻萨诸塞普利茅斯。

约，并持守了这个合约50年之久。

1621年4月5日，“五月花”号再次扬帆驶向大海，离开这里，从此清教徒与英国的联系断绝了。这些勇敢的清教徒成了一个新国家的种子。他们牺牲了大量的财物，忍受无数的艰辛，单纯为了寻找能够顺从自己良心敬拜神的自由。他们将自由的价值放在生命之上，并战胜一切困难去争取。

为了向一个伟大国家的先父致敬，我们也必须公认他们得到启示的源头，他们悲伤时的安慰，和那磁力一般不断吸引着他们，使他们冲破3,000英里冷酷汹涌的大西洋的浪涛，来到文明边缘以外的地方。那是一本他们认为在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书——《圣经》。

## 纠正先贤

这一版本被称为“英语修订版”，据说它有36191处改动。1881年5月17日上市销售，一年内在英国和美国卖掉300万册。

下一个巨大的圣经翻译工作是在钦定本出版后275年开始的。英国语言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个别的学者如约翰·卫斯理在1755年和诺亚·韦伯斯特在1832年分别写出全部或部分圣经的修订译本，反映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对原文的知识也有进展。新的译稿如西奈手稿，梵蒂冈手稿和亚力山大手稿等相继被发现，原文的校勘也成了一门学问。1870年2月，威尔伯福斯特主教向英国国教议会建议，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要重新修订“钦定本《圣经》”。约克郡的议会拒绝参与，他们承认钦定本有瑕疵，但反对“修订任何文句”。坎特伯雷议会却决定承担这项工作。

一个65人的委员会成立了，成员中有36位属国教，其他有各宗派的，包括一神教的信徒。后来有14位相继死亡或辞职。枢机主教纽曼也受到邀请，但他拒绝了。威尔伯福斯特希望美国学者也参加，故要求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腓力·夏夫组织一个美国委员会。夏夫应邀组成了一个34人的委员会，使委员总数达99位。

1870年6月22日，这项工作在西敏斯特修道院的耶路撒冷会议厅开始。1872年10月4日，美国委员会在纽约城的《圣经》协会开始工作。《圣经》中一小部分的暂定修改稿在英格兰完成了，并送到美国去审议。英国人根据美国人的意见修改



了草稿，并把新的草稿送回美国。然后英国人再一次修改，以便使风格更为一致。第一次的修改在委员会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以后的修改需要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这意味着，至少需要修改五次，有时需要修改七次。

虽然已经定意对“钦定本”翻译人员所使用的希腊语文本不做任何的改动，但是当资深的学者认为有必要作改动时，那就例外了。因此，被称为“修改者文本”的新希腊语文本问世了。这一《圣经》修订本出版后的五天内，威斯特考特和豪特两人的希腊语文本出版了，两个文本都被修订委员会采用。但是，修改者文本大约有200处不同于威斯特考特与豪特的希腊语文本，有5,788处不同于钦定本翻译人员所使用的文本。

这一版本被称为“英语修订版”，据说它有36,191处改动。如果有人问它是否价值，回答无疑是肯定的。首先，古老的词语和晦涩难懂的词语被取代了。例如，“let”这个词在1611年版本里的意思是“hinder”（妨碍），但是，今天它的意思是“permit”（允许）。“prevent”这个词来自拉丁语“pre venio”，意为“在……的前面走”或“超过”，并没有今天的“阻止”的意思。

其次，修订者们始终致力于译文的一致性。他们想要每一个希腊语词语或希伯来语词语在它每一次出现时被翻译成同样的英语词语。例如，希腊语词语“meno”在希腊语文本中出现了117次，但是在钦定本中被翻译成十个不同的英语词语。希腊语词语“dunamis”的意思是“power”（能力），但是在钦定本中被翻译成13个不同的英语词语。另一方面，在“钦定本”中同一个英语单词“power”用来翻译《旧约》中17个不同的希伯来语词语和《新约》中六个希腊语词语。

第三，旧的章节划分都置于页边的空白处，而内容则划分成段落。前者帮助你找到所要寻找的资料，而后者则帮助你找到信息。

第四，在希腊语语法不同于英语语法的地方，修订者尽力得出准确的希腊语译文。（例如，希腊语中的时态比英语少，而且没有不定冠词。）不过这样一来，修订版就出现了过分拘泥于字面意思的弊病。

修订版的《新约》于1881年5月17日刚上市马上轰动一时。牛津和剑桥的印刷厂各接到100万本的预定单。5月20日货运到了美国，本来准备次日在店里开始展销，但当天在纽约和费城的街头便已热销。第一日纽约就出售了365,000本，而费城则销售了110,000本。芝加哥距海港978英里，《先驱论坛报》和《时代》两家报社迫不及待《新约》运到。他们聘用了92个排字工人和5位校对者，并用电报将《马太福音》到《罗马书》，一共118,000字，传到芝城。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

约翰·卫斯理 (1703-1791)





封电报。这项任务在12小时内完成了，经文在1881年5月22日的报张出现。据估计，该书出版的第一年内，在英国和美国一共销售了300万册。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与这个版本的《圣经》相比。

## 过犹不及——英美版本之争

美国人对修订版抱着稍带消极的态度。所有翻译上的抉择都由英方定夺，所以有些美国人的想法被英国委员会拒绝。为了讨好美国人，英方建议在首版的14年内将美方的建议收集在一附录中，随着每本修正本出版。当时有美国人希望学者和大众采纳美国委员会的建议。但这项协议使美国公司同意不接受牛津和剑桥出版社以外的修订版。这一来，从1885到1899年，美国委员会的手被紧紧地捆住了。

英国委员会翻译工作完成后就解散了，出版商表示他们无意出版美国的建议。但美国委员会没有解散。在大众的压力下，有些出版商印发了未经批准的《新约》版本，将美方建议列在附录中，而牛津剑桥于1898年则印行了整本《圣经》的“美国修订版 American Revised Version”。但美国委员会却希望将他们所有的建议都加进去，不单是那些被选入附录的项目。14年以后，出版协议失效，美国委员会不再受英国委员会和出版商的限制，他们编制自己的版本，并于1901年出版，这就是美国标准修订版“American Standard Revised Version”。

美国和英国版本的差异似乎不大，但很多学者认为有肯定的进步。例如，美国版用较短的分段，在主要的分段中，特别是书信中插入空白。节数也插入在本文内，不再放在页边。

译文中也有改变。例如，用“Holly Spirit”代替所有的“Holly Ghost”。不再用复数的“devils”，因为只有一个“devil”（魔鬼），但有很多“demons”（魔鬼的下属）。“covenant”一词一致代替了“testament”。

他们又致力删除一些古字和拼法，如用“helped”代替“holpen”，“drag away”代替“hale”，用“know”代“wot”或“wist”。美语的词也取代了英语。例如，用“grain”而不用“corn”，因为在英语中“corn”一词虽包涵“五谷”的意思，但在美国它意味印第安人的玉米。用“platter”一词而不用“charger”，因为它在美国是指马而言。

出版的后果可想而知 美国标准版“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ASV)占据

了美国市场，而修订版 Revised Version 独霸英国市场。但一般认为美国标准版更准确，所以有些讲台和神学院开始单用美国标准版。

1979年纳尔逊出版社发行了新钦定本《圣经》，于是钦定本有了一个新的后代。这项努力尝试“保留(1611年版本)在音韵上的品质”和“形态上的高雅”。修正者虽然感到有必要出新的版本，但他们努力保存“1611年的词句”。他们将代名词现代化了，除去古字的字尾，并在文法上稍加修改。

纳尔逊并引进了新的特色。每分段都加上分题，让读者容易识别内容。诗章体裁部分也用现代诗的形式排印，表现原文的优美。引用《旧约》经文之处用斜体表示，并在脚注中指明出处。在钦定本中有些斜体的字，是表明原文没有的字，但加入译文中使原意更明白，在新钦定本中不用斜体了。

新版与其他现代译本主要的分别在于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的版本。1611年钦定版的基础是传统的希腊文本，而新版却用了威斯特考特与豪特的“中性文本 neutral text”。根据这新文本，很多钦定本用的词、短句和经节都被删掉了。有关的问题如今还在激烈地辩论。但新的钦定本的编译者们认为，“19世纪的文本有过分修改之弊端，而传统的希腊语文本比人们原先以为的更加准确可靠。”

## 版本众多

我们知道，《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希腊语写成的。教皇达马苏斯一世和他的继任人为了不让其他的民族接近《圣经》，让人把《圣经》翻译成拉丁语。人们要读《圣经》就必须学拉丁语——即使是这样，《圣经》的发行常常严格限制在教士之中。

宗教改革来到英格兰，是因为学者们开始学习《新约》的语言——希腊语。他们知道，《圣经》对任何一个能够读《圣经》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将《圣经》翻译成英语。他们是对的：宗教改革震撼了英格兰。

### 几项统计

甚至在威克里夫以前，就有40种古英语与中古英语的译本，无疑都只是《圣



经》的某些部分，大多是诗篇。从“威克里夫《圣经》”，即1380年左右译成中古英语的手抄本，一直到下一个重要的《圣经》译本，即1525年的“廷德尔《圣经》”，这期间另有26种《圣经》译本，包括“威克里夫《圣经》”及其修订本。从1525年到1611年钦定本的出版，这期间共有212种整本《圣经》或部分《圣经》的译本。人们为了将《圣经》翻译成英语做了许多艰难尝试，版本达277次之多。

从1611年钦定本出版到1901年美国标准版出版之间，翻译人员、修订人员、编辑人员作的尝试不下522次，他们试图弄清《圣经》原文的真正意思，并用当代英语准确地将它表达出来。这种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传达《圣经》信息的尝试，约有800次。

1985年以后的统计数字无从得到，但是，从1901年到1985年之间，有记载的尝试不下440次。从英语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到1985年，《圣经》的译本、改进的版本或单独的释义本，总数达到1240种。

## 罗马天主教译本

19世纪中叶，教皇庇护九世对不按他们的解释，不在他们指导下散发《圣经》，提出严厉的警告。当时，罗马天主教圣经公会已经存在了50多年。这个圣经公会出版了“兰斯—杜埃《圣经》”，这个版本没有注解，让读者自己作出解释。它也出版了几种其他的英语《圣经》译本。1811年到1816年，他们出版了五个版本的《圣经》和两个版本的《新约》。20世纪还有几个天主教的译本，最著名的是1966年的“耶路撒冷《圣经》”，这本《圣经》是直接 from 希伯来语、希腊语或亚兰语翻译过来的。1985年，这个版本作了重大的修改，成了“新耶路撒冷《圣经》”。

## 犹太人的译本

我们切不可忘记犹太人翻译的英语《圣经》。对于犹太人来说，中世纪对于《圣经》翻译所需的学识是很不利的，但是到了1400年，犹太人《圣经》的译本开始以各种不同语言出现了。1789年，即法国革命的那一年，“摩西五经”的版本出现了，声称是出自钦定本。1853年，希伯来语的《圣经》问世了，成了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会堂最喜欢用的《圣经》。犹太出版公会决定修改这本《圣经》，并于1917年出版了新的版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几个不同的版本也问世了。1985年美国犹太教组织的三个最大的分支机构，出版了不朽的学术巨作，书名为《塔纳克》，





即基督徒称为《旧约》的新译本。

## 一本属于全世界的书

由于我们是在考虑一本书对整个个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局限在一种语言上是不恰当的。希伯来语被翻译成了希腊语，后者又被翻译成了拉丁语，从这些译本又产生出许多其他的译本。第一本印刷的德语《圣经》可以追溯到1466年；在路德将他的《圣经》献给德国人以前，已经有18个其他版本的《圣经》印刷出来了。约翰·加尔文一直到1551年才修改他的第一本法语《圣经》。荷兰人有几个版本，有天主教的，也有新教的；1537年他们又有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根据原文翻译的，这个版本迟至1897年才修订。意大利人也有几个版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在西班牙宗教教庭的第一批禁书目录中，西班牙人禁止本国语言的《圣经》，1553年一个犹太人的机构给了他们书面的译本。

在欧洲，捷克语、丹麦语、匈牙利语、冰岛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瑞典语和其他语言的完整的或是部分的《圣经》相继问世。在威廉·凯里于1793年到达印度以后，至1834年期间，已经有34种远东语言的《圣经》译本。事实上，“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已经列出了1400年至20世纪初的628种语言的10000个版本。

几百年来，许多国家的人们表现出了翻译《圣经》的热忱。为了打破人们与这本书之间的语言障碍，他们愿意付出代价，甚至有时候这个代价意味着献出他们的生命。

## 印刷者的墨迹

如果把这些《圣经》一本一本本地摞起来，可以五倍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当《圣经》首次在英格兰出版时，政策规定只能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皇家印刷所印刷。（因为在亨利七世去世以前就已经有官方的“皇家印刷所”。）但后来《圣经》的翻译以及把《圣经》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就不受那么严格的限制了。当然，我们从廷德尔和科弗达尔的经历知道，出版商总是印刷未经授权的《圣经》。

## 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

将近200年以前，一个名叫托马斯·查理的新教徒牧师，在威尔士的巴拉讲道。讲的时候，他请一个年轻的女子重复他上星期讲道的经文。她哭了，并解释说因为天气太坏她不能够去查看威尔士《圣经》。查理了解清楚了，离她家最近的威尔士《圣经》也在七英里以外。这件事给他很深刻的印象，结果他去了伦敦请求帮助，这导致1804年建立了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到1928年止，该圣经公会已经发行了608种语言、各种版本的《圣经》3.85亿本。他们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5142个附属机构，在国外有5000个附属机构，他们雇佣了900位代理商挨家挨户地出售《圣经》，因为免费发行是违反他们的政策的。

仅在1930年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就出版了共643种语言的《圣经》1200万本。它们分装在4583个箱子里，重达490吨，被运送到世界每个角落。这仅仅是一个国家里的一个圣经公会，在一年之中所做的。

著名的法国无神论者伏尔泰曾经预言，不出100年基督教将从地球上消灭，《圣经》也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以后买下他在巴黎的住所，作为发行《圣经》的库房。

## 联合圣经公会

像不列颠三一圣经公会等圣经公会都是独立运行的，全世界有110个全国性的圣经公会，如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以及美国圣经公会，它们都是在联合圣经公会的名义下运作的。1990年，美国圣经公会仅在美国发行的《圣经》、《新约》和《圣经》单行本或合订本（单行本或合订本通常意味着至少是《圣经》66卷书中的一卷），就超过了600万本；在海外还发行了1440万本，总共发行了2040万本。他们使用了6万名志愿者，在1300多个中心工作。

联合圣经公会提供的《圣经》，是全世界范围内，以普通、日常语言写成的《圣经》，他们把《圣经》送到全世界不可能得到《圣经》的数百万人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消除语言障碍，向凡是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提供他们语言的译本。东亚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有报道说，在一些地区9万人共用25本《圣经》时，联合圣经公会就在中国向他们提供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这一套印刷设备使东亚人每年多得到25万本《圣经》与50万本《新约》。联合圣经公会也提供了纸张，用来印刷30万本“福音书”的新中文译本。



威斯敏斯特宫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雕像，他一手拿着剑，另一手拿着圣经。



## 《圣经》的出版发行

1932年三个主要的《圣经》出版者是不列颠与国外圣经公会、美国圣经公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他们以多种不同的语言，一共出版了22626867本《新旧约全书》、《新约》、以及《圣经》单行本或合订本。如果把这些《圣经》一本一本地摞起来，可以高达28英里——五倍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根据“威克里夫《圣经》”的翻译人员统计，今天世界上有6170种不同的语言，其中的1978种语言至少有一种《圣经》译本。这些《圣经》中有些是从左至右印的，有些是从右至左印的，还有一些则是从上至下印的。有些部落不阅读任何印刷品，只读手写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圣经》先是用手写下来，然后拍照，再在印刷机上复印。“布莱叶盲文版《圣经》”，只有39卷。有些语言和字母与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向我们最熟练的语言学家提出了挑战。俄语有36个字母，泰米尔语有400个字母，毛利语只有14个字母。但是，这些障碍没有一个能给翻译人员与印刷人员的热情泼冷水。

许多机构致力于免费发行《圣经》；其中最大的机构可能是基甸社。据估计，1992年他们散发了3500万本。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从事发放《圣经》的工作，所以1990年他们能把第5亿本《圣经》送给乔治·布什总统。这项工作的显著特征是，每一本《圣经》都是赠送在个人手中的。全部的工作都是通过一支人数略多于183000人的志愿者队伍来完成的，他们仅由54个拿薪水的雇员来组织。

据估计，每年出售的《圣经》超出4400万本，另有3500万本《圣经》免费发送。每年总共将近8000万本。《圣经》的普及程度，没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书可以与之相比。

## 内在生命力

《圣经》改变了西方世界。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圣经》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基础。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看《圣经》对西方人民以及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 《圣经》为主宰

几乎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和人类努力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主宰,这个主宰服从这本书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伟大的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死的时候跪在非洲中部的一个小屋里。他刚刚读完他的《圣经》。

拿破仑·波拿巴曾向三个在他房间里的将军说:“那本在桌子上的《圣经》,是一本给你们的书;它向我说话;他就像是一个人一样。”

当苏格兰伟大的文学巨匠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临终时,请他的朋友洛克哈特读那本书给他听。司各特有一个藏书20000册的图书馆,所以洛克哈特问他:“你想要哪一本书?”司各特回答:“那还要问吗?只有一本书。”

布里斯托尔一家孤儿院的创建者乔治·慕勒曾说:“《圣经》我通读了一百遍,每次都能发现新的、鼓舞人心的东西。”

英格兰国王乔治五世,像他答应过他母亲的那样,每天都读《圣经》。

威廉·格莱斯顿曾四次出任大不列颠首相,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毫不动摇的磐石——〈圣经〉》。他声称自己认识他那个时代的世界上95个伟人,其中的87人“是《圣经》的信徒”。

公开宣称忠诚于《圣经》并且当过美国总统的人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每一个法庭上都有《圣经》。每一所医院都是《圣经》道德影响的纪念碑。

我们反过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如果把《圣经》从文学中拿走,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丁尼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圣经》中的300多处经文。有人曾经计算过,莎士比亚有500多个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查尔斯·狄更斯曾说:“《圣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它对音乐界的贡献。如果从巴赫、亨德尔、莫扎特拿走《圣经》,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如果亨德尔不是为《圣经》而创作,我们会听到他的名字吗?我们再看看艺术界。如果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多那太罗、伦勃朗、拉斐尔不是被《圣经》中的教导所激励,谁知道他们的名字?

如果回顾许多大学的过去,你就可以发现它们都分别与教会相关联。当年哈佛、耶鲁、威廉、玛丽、达特默思等大学之创建,都是出于培养教牧人员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曾经担任美国第三所最老的大学,即耶鲁大学校长的威廉·莱尔普斯博士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有《圣经》的知识而无大学里的书本知识,比有



苏格兰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死于非洲，他去世时刚刚读完圣经。



大学里的书本知识而无《圣经》的知识，更有价值。”

## 巨大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约翰·亚当斯，他是“邦迪号”船上哗变的船员之一。当皮特克恩岛上的哗变者死于梅毒，留下亚当斯与所有的女儿儿童时，他在破损的船的残骸中找到一本旧的《圣经》，他从《圣经》中得到安慰和引导。到美国船“黄宝石号”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监狱是空的。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教会都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这种改过自新与《圣经》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巧合吗？

约翰·吉福德是保王党人的一支小分队的成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队把小分队逼得走投无路，并命令他们“投降，否则决不宽恕”。只有吉福德被活捉，其余人都被杀死。正当他在等候处决时，他的姐姐转移了看守的注意力，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逃脱。他逃亡并藏在贝德福德，在那里他的放荡与纵酒狂欢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最后，有人把《圣经》介绍给他。在他身上发生了彻底地改变，他成了同一个镇上的圣约翰教堂的牧师。事实上，他是班扬的《天路历程》中“解释者”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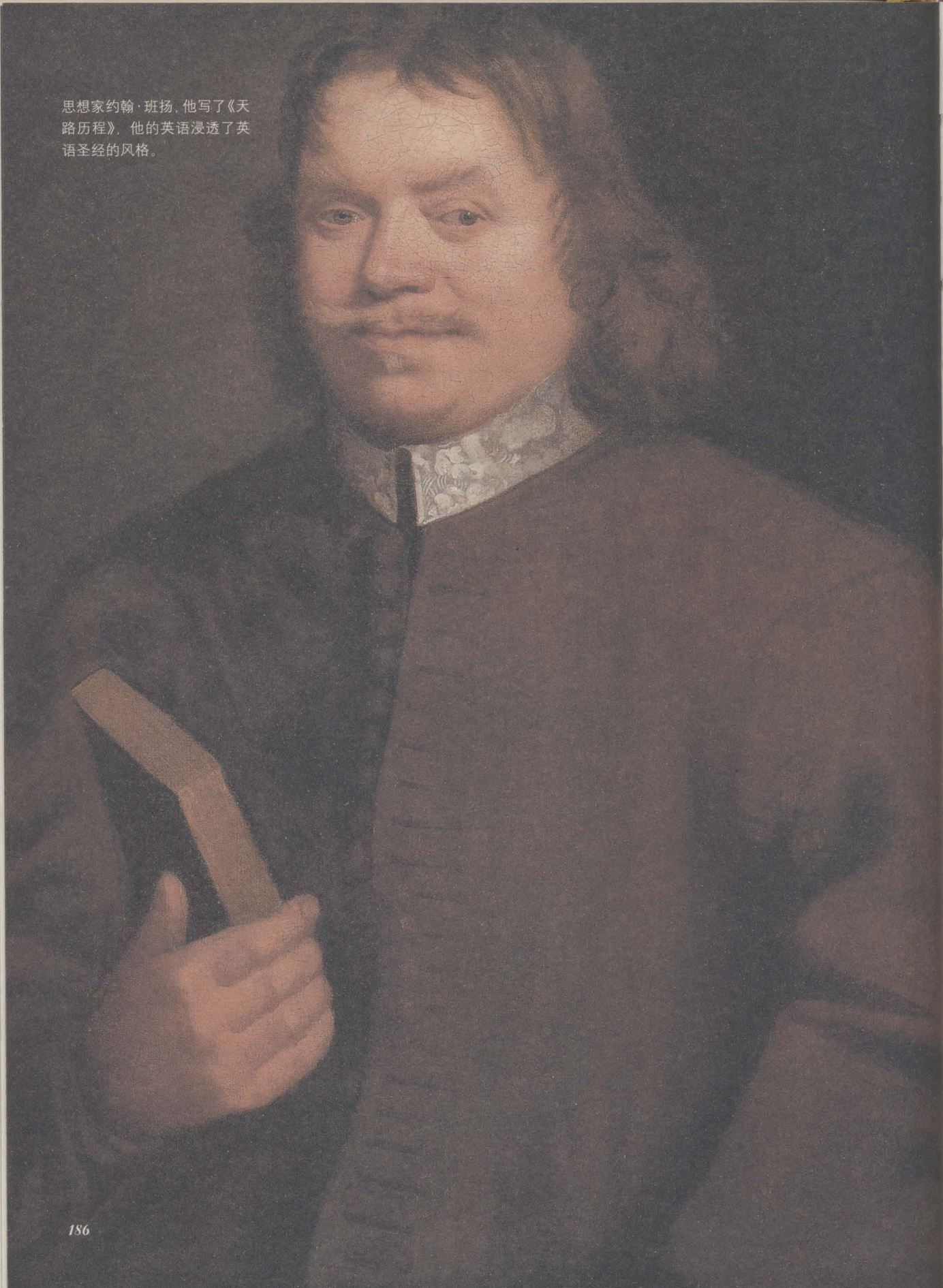
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当时一种新奇的方式使英国人与美国人面对《圣经》：他从教堂里把《圣经》拿出来，在乡村的露天里传道，讲解《圣经》。多达30,000到60,000的人聚集在露天里听他讲道。数千人在听了他讲的《圣经》信息以后，发生了转变。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赞赏怀特菲尔德和他的工作。

正是《圣经》，影响了约翰·霍华德和伊莉莎白·弗赖。他们顺从《圣经》的教导，造成了公众压力，迫使国会改造监狱系统。正是《圣经》，带领威廉·威尔伯福斯为了奴隶的解放而投身改革。也正是《圣经》，激励威廉·布斯创建了基督教救世军，帮助穷困缺乏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还是《圣经》，在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南极探险的孤独和危险的经历中，给他安慰。《圣经》还影响了詹姆士·扬·辛普森，当他发现制作麻醉剂的氯仿时，他使外科手术不再是野蛮残忍的。辛普森告诉人说，《圣经》是他最大的发现。

《圣经》改变了西方世界，这是无可争议的。



思想家约翰·班扬，他写了《天路历程》，他的英语浸透了英语圣经的风格。



## 回 顾

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是一个关于一本书的非凡故事。这本书开始只是讲一个人，这个人在照看着一个在旷野里漂泊的小小民族。他想给他们提供一部道德法典，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生活。历史学家和祭司接过这个故事继续讲，而智者、诗人和先知完成了这个信息。他们的著作被收集起来，成为22卷书——我们的《旧约》。公元100年，在詹尼亚召开了拉比会议，平息了犹太民族的争议，宣布这些书是“妥拉”，即神给人类的启示。

在400年中听不到先知的声音以后，一个被称作“基督”（意思是“受膏者”或弥赛亚）的人，拣选了12个本不配的人做他的门徒。作为一个团队他们是大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相同，在他们之中还有一个叛徒和内奸。他们看来也更加不可能为这本神圣的书撰写手稿，因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和无知的人”（使徒行传4:13）。然而，由于他们的话，又有27卷书加添了进去。公元397年，这些书卷得到正式认可，成为完整的《圣经》正经。

犹太民族不接受这最后的27卷书，所以基督教教会成为这套独一无二的书卷的看管人。因此对教会的迫害浪潮一个接着一个，使得教会血流成河，却未被征服，事实上，教会每受到一次冲击，它的力量就反而增长。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下令毁掉每一幢用作聚会的建筑物，毁掉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圣经》。但是，50年以后，继任的皇帝下令用政府的经费复制了50本《圣经》。教会复兴了，高唱得胜的凯歌。

迫害让位给了物质主义。君士坦丁皇帝加入了信徒的行列。他的行政政策成了教会的政策；他的生活标准成了教会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他对宗教仪式的依赖成了教会中的热情。慢慢地教会变质了，直到传统的权势取代了《圣经》。情欲、贪婪、腐败、现世主义，泛滥成灾；《圣经》被藏了起来，隐藏在深奥的拉丁语之中。

但是，在漆黑的夜空中出现了一道亮光，即“宗教改革的晨星”。约翰·威克里夫是一个头脑敏锐、心地善良、铁骨铮铮的人。他向他那个时代的堕落发出了挑战，并且在必要时，公然反抗教皇和教皇的教会，蔑视国王和他的男爵，以及英格兰所有的大学教授。他给了一支小小的传道者队伍以如火燃烧的热情，他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鼓励人们粉碎禁锢《圣经》的拉丁语外壳，将它从修道院里解放出来，让神的信息借助中古英语传遍整个国家。大约135年以后，宗教改革者们冲跨了整



个欧洲所有的拦阻。

当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可以理解的希腊语《新约》时，希腊学者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由此，人们看到了《圣经》对本国语言所产生的影响。德语、法语、英语的《圣经》开始问世。在德国，是宗教改革产生了《圣经》；而在英国，是《圣经》产生了宗教改革。不同的英语《圣经》译本与廷德尔、科弗达尔、罗杰斯等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接着各种委员会又出版了“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最后又产生了这些成果的精华——詹姆士国王一世的钦定本。

当已经改革的英格兰教会还保持着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架构时，清教徒被冷落，退到了教会的边缘，有些人最终出走了。这一小部分人成了新教徒派别的种子；逼迫导致他们迁移到能够宽容宗教自由的国家。于是，威廉·布鲁斯特那群人来到普利茅斯岩石（在马萨诸塞州，相传为首批英格兰清教徒1620年乘“五月花号”船到达北美的登陆处。——译者注）。他们之对于这个国家，就等于“日内瓦《圣经》”之对于他们。《圣经》是极为重要的，在信仰与生活的每一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和权威性的作用。清教徒前辈移民们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像种子一样种植在他们后裔的心灵里。《圣经》为那个早期的社会奠定了道德基础。敬拜聚会优先于商业事务，违犯安息日就是犯罪，要受到惩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宣称，他发现美洲的航行诞生于他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独立钟”（指美国费城独立厅的大钟，1776年7月4日鸣此钟宣布美国独立；1835年破损——译者注）上刻的铭文引自《利未记》25章10节。美国50个州，各自的宪章都是用引自《圣经》的词语或概念写成的。

美国十个最早的大学中，有九个是教会创建的，另一所学院是由福音传道人乔治·怀特菲尔德创建的。

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圣经公会每天为战争的双方印刷7000本《圣经》。1864年，孟斐斯圣经公会运了一船棉花到纽约，换回50000本《圣经》单行本。

今天，在每一位总统的就职典礼上都放着《圣经》，在法庭上每一位证人宣誓时也都要按着《圣经》。自从1966年以来，《圣经》的销售量增加了一倍。1991年，出售了4400万本《圣经》。为什么？在《旧约》中《圣经》被称作是“神的话”，达3808次。

